



Education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 丛书英文版主编\弗兰克·帕金
- 丛书中文版主编\周殿富 韩冬雪
- 丛书中文版执行主编\曹海军

民粹主义

[英]保罗·塔格特 著
袁明旭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Populism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高等教育最权威的社会科学教材之一
中国10余所最高学府知名学者联合推荐

策划编辑: 崔文辉

责任编辑: 贺 萍

装帧设计: 陈 东

Populism

作者简介: 保罗·塔格特是苏塞克斯大学
苏塞克斯欧洲研究院当代欧洲研究的简·
莫内讲师, 也是社会科学学院的政治学讲
师。他还是《新民粹主义与新政治学》一
书的作者。

ISBN 7-206-04686-X



9 787206 046865 >

ISBN 7-206-04686-X

定价: 14.00元

民粹主义

[英]保罗·塔格特 著
袁明旭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粹主义/(英)塔格特著;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5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书名原文:Populism

ISBN 7-206-04686-X

I.民… II.①塔… ②袁… III.民粹派—研究
IV.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358 号

Paul Taggart

Populism

(Original ISBN:0-335-20046-X)

Copyright © Paul Taggart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Co. and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5-1367

民粹主义

著 者:保罗·塔格特 译 者:袁明旭

责任编辑:贺 萍 封面设计:陈 东 责任校对:陆 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6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 字 数:1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686-X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总序暨出版说明

自 19 世纪中后期西学东渐以来，在西方思想和相关书籍引入方面的成就可谓蔚为大观，但总的来说，大都强调系统理论的引进和评介。自 20 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介绍和翻译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著作成为了“文化热”的先导，其中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等丛书曾经滋养和影响了数代学人的学术生命。

本套丛书立足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虽名曰基本知识，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学术普及，每本小册子的著者皆是该研究领域的专业权威人士。以往这类书籍的引进通常表现为编纂学科史的教材形式，将知识的引介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上。故此，作为单纯的基本概念的追本探源式的梳理工作略显不足，这也就使得研究者对各家各派的观点难以获得系统的了解。而从可读性和理论的深入性上来说，本套丛书既适合于初次涉猎该领域的非专业人士、本科生，成为他们的领航性的参考文献，也能够满足于对此领域具有相当知识积累且有一定专深研究的研究者的专业化要求，因此能够将系统性理论的引入与基本概念的拓展齐头并进，可谓一举两得。

需要指出的是，该套丛书以社会科学自诩，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反映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文化内涵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并不具有自然科学本身拥有的客观性和普世性。毫无疑问，这套丛书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以西方特有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为基点，看待西方世界和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反映。对此，我们应该确立批判与扬弃、借鉴与建构并举的思想立场。毋庸置疑，在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并吸收西方有益的社会科学文明的普遍性成果，借鉴和利用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经验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食洋不化的崇洋心态和西化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观，在坚持学术自主性的“洋为中用”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规范化、科学化。

编者

出版导言

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现代现象，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国际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在世界各地先后都出现过民粹主义的运动或思潮。在当代社会，民粹主义也常常改头换面地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世界各地，出现在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言论之中。可以说民粹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的现象和思潮，但令人尴尬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对民粹主义仍然说不清道不明，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共识。其实，按照塔格特先生的观点，民粹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明确内涵的概念，其特点就是多变性、易变性，要寻求它的明晰的含义往往会令人失望，无功而返。

民粹主义具有极其复杂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政治心态、一种政治思潮，又是一种社会运动，同时还是一种政治策略。作为一种政治心态，它是一种非

常复杂而又反复无常、变异多端的政治心理。作为一种复杂的政治思潮，它既没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也缺乏一般理论的系统性，它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在同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时期其表现形式都有所差异，而且它由于没有自身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又常常依附于其他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之上。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它往往主张依靠民众自下而上地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同时，在社会运动中它常常又把民众作为达成目标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赞扬民众的力量和智慧，运动的领导者常常把它作为实现其目的的一种策略。

塔格特从历史的角度，认真分析了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典型的民粹主义运动，探索它们的共同点，洞察它们的相异处。通过历史事实的表述和理论的厘析，认为民粹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性的悖论，它自身就处于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它高扬人民的大旗，但结果往往陷入个人崇拜之中，宣称要依靠人民，但另一方面又往往把完全的希望寄托在卡里斯玛式的超凡魅力型的个人领导者身上；一方面它反对现行的主流的政治形式，反对精英，反对代议制民主、反对制度化、反对政党等，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在代

议制政治环境中诞生的，它要产生影响，进行动员，又不得不借助于现行的政治制度，借助政党的形式开展活动。一方面，它在理论上常常抨击政党、权力斗争，而在实践中，它又常常陷入权力之争。因此民粹主义由于其自身所固有的这种矛盾性，在结果上它常常成了自己所反对的东西，成了自己的对立面，陷入了自身所设置的不可超越的困境之中。因此民粹主义具有其内在的难以克服的矛盾性。通过这本小册子的阐述，虽然我们仍然无法全面透彻地对民粹主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至少使我们认识到民粹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任何简单化、单一化的解释都是片面的。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必须结合具体的情境，才可能有相对客观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这部作品中的部分文字反映的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其理论的局限性是必然的，我们在阅读时需要认真客观地对待，保持批评态度，取舍得当。

编者

2005年4月20日

序 言

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尽力满足我母亲凯瑟（Keith）和父亲帕特·塔格特（Pat Taggart）的一个简单的要求：解释我上次写的那本书的题目中的一个概念——民粹主义的涵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要求，但答案却并不像问题那样简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仔细研读民粹主义，并逐渐意识到研究民粹主义要忍受篇章分裂的痛苦，民粹主义的每一个案例看似是有联系的，但通常却是孤立的，因此我尝试着写一本书试图把这些零散的东西联在一起。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民粹主义就需要进行调查，我希望这本书的简洁描述能让读者减少一些繁重的调查任务。

在此我向给以我支持的苏塞克斯郡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的同事表示感谢，特别要感谢苏塞克斯欧洲学院（Sussex European Institute）、国际政治关系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的同事，以及“开放大学”出版社（Open University Press）的耐心和贝福纳·斯佩特（Bhavna Spat）不厌其烦的鼎力相助。我欠布鲁

民粹主义

斯·格拉哈姆（Bruce Graham）很多，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不仅给我建议，而且他的谈话和评论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贯穿于本书的始终（第八章的那些术语就是例证），虽然他未参与本书的写作，但我对他的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并感谢在与他讨论这本书时所带给我的快乐。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编委会名单

主 编：周殿富 韩冬雪

学术咨议(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马德普	马敬仁	丛日云	孙晓春
李 强	任剑涛	应 奇	何怀宏	林尚立
姚大志	胡维革	施雪华	贺照田	高 建
袁柏顺	徐湘林	夏可君	顾 肃	梁治平
曹德本	葛 荃	谭君久	薄贵利	

编 委：孙荣飞 朱海英 刘训练 彭 斌 叶兴艺
赵多方 陆 彬 王 冰 王 新

第一期执行编委：孙荣飞 朱海英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关于民粹主义的定义 13

第一部分：民粹主义实例

第三章 美国的政治运动和民粹主义政治 33

第四章 到人民中去！俄国民粹主义的教训 61

第五章 拉丁美洲民粹主义政治中的领导 78

第六章 宣扬民粹主义：加拿大的“社会信用党” (Social Credit) 89

第七章 新民粹主义 98

第二部分：民粹主义的特征

第八章 民粹主义，人民和中心地区 123

第九章	民粹主义的制度困境	134
第十章	民粹主义和代议制政治	146
第十一章	结论	155
参考书目		160
译者后记		172

第一章 导 论

民粹主义是一个独特的概念。任何事物，只要认真细致地观察一段时日，就会发现它与众不同的地方。而对于民粹主义甚至只需稍一过目，便知道它与众不同。民粹主义具有许多思想意识的特征，但并非全部。有时它一呼万应，有时则遭受冷遇。民粹主义有一个基本的特性：即概念上的尴尬的不确定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的认为它极具价值，有的则视之为毫无意义，空洞无比。精英人物认为它是极富魅力而又令人厌恶、危险的现象。民粹主义时而依赖于领导阶层，时而依附于人民大众而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当民粹主义依赖于领袖时，它要求这样的领袖必须具备非凡的才能以领导普通的民众。当社会矛盾丛生、危机四伏时，民粹主义表现出革命性，因而备受群众拥护。然而在实践中，它却还是人们所司空见惯的改革者，无力进行彻底的根本性的变革。民粹主义是间歇性出现的小插曲，常常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政治上的剧变。但它却总是昙花一现，不久便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了。然而民粹主义也并非毫无效果，在高潮时总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治的内容与基

民粹主义

调。哪里有代表民意的政治运动，哪里就有一种作为潜在的政治运动或者政治观点的民粹主义，它无所不在。

简言之，观察者和参与者称之为民粹主义的现象不同于组建政党、制定规划、制定政策以及领导相对稳定的有序化的政治生活。民粹主义运动有其自成一体的信条，并且具有分散性，即它自身所固有的难以控制性与组织性；它缺乏一致性，在活动周期上具有飘忽性。民粹主义是一个棘手的难以捉摸的概念，缺乏使之更为具体明确的特征，其本性上的特点便是易变性。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无论作为一种观念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很难对其进行归纳性描述，更不用说给它下一个面面俱到的普遍的定义了。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灰姑娘情结”，由此我们找到了民粹主义之易变性的完美代名词，即在众多的“脚”中寻找鞋的真正主人（灰姑娘），然而在寻找的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脚”，这为我们理解民粹主义提供了许多典型的案例（引自阿尔科克 Allcock 1971，385）。这也给我们提供一种警示：在寻求对民粹主义有一个完美恰当的解释的过程中充满着种种的错觉和许多不尽人意的东西，其结果并非总是令人满意的。

欧内斯托·拉康（Ernesto Laclau）同样也告诫我们说，如果对民粹主义研究得太过于严密则会使其失去原有的意义。他把民粹主义描述为一个过程，由此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一假设对民粹主义进行界定，寻找例证，进行研究，完善民粹主义的定义，使其与所研究的例证相符合。在对民粹主义下一个普遍定

义时，我们往往诉诸于对民粹主义运动的细节进行比较，但由于这些细节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由此到最后往往只好放弃对民粹主义进行界定（拉康 Laclau 1977, 145）。这种循环肯定是一个危险，我没有把握我们能完全避免它。

在以下篇幅中，通过探讨民粹主义的六个核心主题，我提出以下问题：

- 民粹主义者敌视代议制政治；
- 民粹主义者把他们所偏爱的群体作为理想化的中心地区并以此作为辨识自身的依据；
-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意识缺乏核心价值；
- 民粹主义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
- 民粹主义因自身的矛盾性而具有自我局限性；
- 民粹主义作为像变色龙一样的东西，能够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这六个主题既相互独立又在不同的方面相互作用，相互交织。因此情势很重要，但却不应使我们对普遍化的可能性视而不见。普遍化的可能性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韦伯理想模式的精髓（韦伯 Weber 1968, 19 - 22）。由这六个主题构成的理想模式从未在真正意义上符合任何一种情况。但它有助于我们通过所谈到的一般性而对特定事例有一定的认识。这两个方面对我们是有用的：一是指导我们看清特定事例的枝节细末，二是帮助我们对民粹主义有一个一般性的了解。

在根本上，民粹主义作为一套思想体系在与政治尤其是与代议制政治有着根本性的矛盾。民粹主义认为政治是混乱和腐

民粹主义

化堕落的，因此，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涉足。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致力于避免习以为常的政治，因而它是勉强意义上的政治。如果忽略了这一勉强性，民粹主义者在省察社会中的种种危机时，便会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民粹主义者的政治性同时也说明了其矛盾性，为了回避代议制政治的复杂性，民粹主义者倡导政治上的简洁性和直接性。对民粹主义者来说，代议制政治的机构设施包括政党和议会，但它们常常是过分涣散和不必要的复杂化。如果以敌对的态度去对待代议制政治，民粹主义者就会陷入极度的窘境之中。只有在政治这一形式中，民粹主义才能形成系统化的表述并使之作为一股政治动员的力量成为可能。

民粹主义一方面是对代议制政治的消极反应，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更为积极的一面。民粹主义常常倾向于用其所选择的民众的理想化的观点来确定自身，并把它们置于相似的理想化的背景之中。通过这种方式，民粹主义排斥了那些异族的、腐败的或低级的因素，这样便显示出其既有生气又无生气的特性，显示出我所称之为中心地区又为边缘地带的特性。因此，民粹主义是一个对中心地区的含蓄性表达的概念，它通过对内对外的观察来构建自己：这个世界是由具有智慧的人民以共同的方式、通常参照过去的事物（即使是理想化的）所创造的。因此民粹主义之中有一个暗示性的中心地区的构想，人民位居于中心地区，民粹主义者赋予了人民以创造性和依靠性的作用。有些人认为献身于“人民”就是民粹主义。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因为不同的民粹主义者对“人民”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的认

识（卡农范 Canovan 1984）。而更富有成效的观点是认为献身于人民是从中心地区的意识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

民粹主义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者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这种适应性源于民粹主义的“空心化”：民粹主义缺乏一种能为之献身的价值。较之与其他思想意识，含蓄的也好，明了的也罢，在一定程度上都关注于一个或更多的价值，如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然而民粹主义却没有这样的核心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民粹主义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又可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的原因。民粹主义的本来位置是作为一个形容词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之上，以此来填充自身的空洞无物。现代的许多“伟大”的思想——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女权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似乎都需要一些修饰成分来依附于它们，使之成为社会自由主义或者激进女权主义。因此，民粹主义更可能依附于自身而不是被其他思想意识所依附。

危机的出现使民粹主义者放弃他们的不情愿而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积极维护他们的中心地区。困难的是危机也许是民粹主义者想像出来的，或者是对政治和经济危机世界的真实感受（换言之，亦即一种形势不可能持久的）。我不想对危机是真实的还是想像出来的作出结论，因为这是很容易的。也许比较准确的认识是，民粹主义来源于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至少在一个社会团体中所形成的危机意识。

民粹主义对政治的矛盾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经常会发生这种阵发性现象。为了回避代议制政治制度、结构和模式的问题

民粹主义

题，民粹主义试图故意地将普通人的简单明了转化为简单直接的结构。依靠领导者或者避开与政党凑在一起，虽然如此，但它自身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同时，这些做法意味着民粹主义是一种始终不变的短暂现象。它对制度的态度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

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多变的，它总是随环境颜色的变化而改变，这不是作为一种伪装或者保护色，因为民粹主义部分地总是由环境的某些方面所构成的，在这种环境中它可以找到自我。表达这种观点的另一种方式是说民粹主义有基本的特征和第二特征，基本特征是它自身具有的。而第二特征近似于一种过程，与事情的各种情况相关联。所有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如此，但是民粹主义采用叙述的、神话的和象征性的手法，因为它们必须在根本上与中心地区相共鸣，并从根本上利用周围的环境。

在概述性的主题中，人们可能会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反对代议制政治的观念、制度和实践的反应，是对中心地区所产生的危机意识的含蓄或明了的赞扬的一种反应。然而，由于缺乏普遍性的核心价值，民粹主义总像变色龙似的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插曲。民粹主义是一种阵发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

民粹主义不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出现，而且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作为一个表述性的术语，民粹主义适用于运动、领导者、政体、观念和风格。但作为一个术语的使用，它的普及性最终是不成比例的，至少在这些方面是不成比例的。说以“民

粹主义者”的方式做一件事并非是告诉我们民粹主义的政治活动。如果他们以民粹主义者的方式做事，那是因为他们想体现民粹主义思想体系的一种更深层次的理念，因此我们应该聚焦于民粹主义的思想观念（参照理查兹 cf. Richards 1981）。通常民粹主义的风格会与简单地追求流行以吸引更多人的风格相混淆。这不仅仅因为这个术语的不完善，还因为它的使用不准确。

民粹主义运动和政党、政客、政体和观点是本书的焦点，因为理解了这些就找到了开启民粹主义政治的钥匙。^①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民粹主义贯穿于整个社会，它赞美普通人的美德，并以浪漫的眼光来看待生活方式和风景，但在这里我所关注的是民粹主义一旦被动员起来，它就是一种政治现象。在这种意义上，民粹主义运动和政党（无论是产生于底层或者来自于上层的领导者）构成了其他所有各种表现的根本原因。民粹主义的领导者发起运动，组建政党并使之合法化。民粹主义者的思想只是在政治性的运动和政党的范围内才被接受。政体依靠领导者转而依靠政党和运动来使之合法化。

民粹主义所能展示的东西仅仅是运动、领导者、政体或者思想观念。通常它是一个复合体，但明显的它从没有能够同时证明过这些。以美国 19 世纪末期的平民运动为例，它是一场

^① 对那些研究文化和沟通的人来说，“民粹主义”这个术语已被广泛使用，并已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中心领域。在这种意义上，它的使用很特殊，与很多的政治术语的运用很少有共同点。文化民粹主义描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般文化是被普通民众所消费的，而“高级”文化的消费是精英们的特权。

民粹主义

真正的用一套先进而复杂的民粹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运动。但我们发现：也有一种运动，它从来没有改变政府，也从未建立一个政权。我们也还发现：有一些民粹主义运动，它没有和任何一个特定的领导者相联系。相比之下，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经历就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在它的运动中包含着政权的特定人物（例如阿根廷的胡安·庇隆 Juan Peron），他的领导艺术比一套民粹主义者所创立的思想体系或者运动更为重要。以19世纪末期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Russian narodniki）为例，它试图通过受过教育的领导者传播一套思想观念和希望开展民众运动，但由于没有抓住权力的缰绳又一次失败了。而在美国的政治活动中，则有政治领导人而没有运动，如亚拉巴马州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休伊·朗（Huey Long），我们有民粹主义思想的领导者但却没有运动。在这两个案例中，这些人尽其所能实现民粹主义者的政策，这种探讨民粹主义与政权的相关性是有效的。在民粹主义中，不仅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而且在所发生的民粹主义运动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看看民粹主义在历史上的事例你可能会灰心丧气。如果我们追求用民粹主义解释任何一种政治现象，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由于民粹主义这一尴尬形式的概念而以失败告终。通常地，根据专家和特定的知识，提出一个概念，经过稍加重塑、再造和修饰，使它的涵义能够更好地反映我们所掌握的特定事例。从而使概念能够更好地反映上下文的内容，但却较少能够忠实于普遍性的民粹主义观念。在民粹主义新近形成的样式中，它甚至能够成为我们解释特定背景中的政治现象的完整方

式中的一部分。但只要我们一检验它曾经被相似地重塑、再造来解释其他地方的政治现象时，这种相似性就受到了限制。

民粹主义的每一个案例都倾向于强调民粹主义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因素上，并把这个因素作为民粹主义的特点。看一看俄国的事例，它把诱人的农民阶级和浪漫的乡村生活作为民粹主义的重点。但是再看看美国 19 世纪的民粹主义，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了农民的激进主义上，和俄国农民的浪漫情怀几乎没有共同点。向南移，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运动先在乡村后又转变为城市工人阶级的运动。加拿大的民粹主义则吸引了大量的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来到欧洲，新的极右翼民粹主义便完全城市化和排外化。看看全球，透过历史近观民粹主义的本质，它没有能够改变我们。

如果我们尝试着采用一种更为全面的方式和使用一系列的事例来阐明民粹主义，就面临着另一个令人烦恼的事实。没有一个例子能够面面俱到地阐明民粹主义，虽然一些例子更为详尽一些（美国 19 世纪著名的民粹主义者事例）。但没有一个事例能在所有的方面说明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经验性的现象，是一个令人不舒服的历史和当代事例的综合体。这导致了一些学者拒绝研究它的本质，而是自我满足的把它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卡农范 Canovan 便是其中之一，1981，1982）。在以下的篇章中，我将通过检验特定的民粹主义者运动、政党、观念和政权来表明一种理想形式的民粹主义是值得研究的。

在第一章中我概述了历史上在不同情况下出现的各种民粹主义。这一部分提供了一些经验性的素材，围绕这些材料作概

念性的讨论，为本书的其余部分奠定基础。案例的选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还有许多别的例子能够刻画出民粹主义的特征，但我却没有把它们包括在书里。但我在本书的前面部分尝试为那些缺乏历史背景知识的人尽力提供了一些民粹主义的典型例子。我在5个章节里描述了不同类别的民粹主义，其目的是提供一个简洁的介绍。我们不可能对民粹主义有一个完全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提出了民粹主义的一些基本要素。

在第二章里，我概述了目前所存在的民粹主义的各种不同定义，同时认为我们应该区分以三种途径解释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之间的不同。首先，最普遍地是根据上下文的背景，根据一个特殊事例来定义民粹主义。第二，提倡多样化的解释，否认民粹主义有一个普遍性的本质，寻求建立不同的民粹主义的分类学。第三，正如我在书中所建议的，努力建构一种对民粹主义的真正地普遍性的理解。

那些想要在我所关注的案例中寻找对民粹主义的全面理解的读者是找不到答案的。而那些寻求特殊的被排除在外的例子的读者则能找到答案。^① 我把主要的重点是放在北美、俄国、拉丁美洲和西欧。选择这些地区有很多原因：首先，所提供的这些事例接近民粹主义的“标准”，换句话说，当我们谈论民粹主义时，这些事例经常被使用。第二，这些例子既分别强调了民粹主义的突出特点，又集中构成了理解民粹主义的小小的充分的整体。在北美的事例中，列举了民粹主义的一个民众运

^① 对全面的概述，没有谁能比卡农范（Canovan）做得更好。

动。俄国的例子则展示了一个浪漫的田园风光的王国。拉丁美洲的例子则向我们展示了民粹主义者领导艺术和政权的重要性的问题所在。最后，西欧的例子则显示了强烈的反制度性特征的民粹主义。

选择这些事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与之相关的许多个人要么直言称自己为民粹主义者，要么不反对别人强加于他们的描述。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深嵌于民粹主义之中的对精英和知识分子深深的敌意，意味着用一个术语描述自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对精英和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耻辱，至少直觉上是这样。作为一个民粹主义者不把这种标签看做是消极的是很有必要的。

在分析民粹主义时这样做是出于一种特定的需要，许多历史表明这些知识让我们受益。对民粹主义缺乏共同的认识意味着在历史事件的研究中缺乏对必要的背景条件的认识，这样研究就会缺乏一致性。民粹主义是一段插曲而并非无处不在，这个事实意味着仅在心理上处理这些重要事件而不从其他方面，就会容易一些。概述民粹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具有较少的实用性，而具有更多的宗教性。民粹主义的多变性不仅允许我们用它来描述背景，并在不同的背景中发现它的特性，而且这也意味着要从更广的意义上理解民粹主义，就需要我们意识到它所处的环境和它的真正本质特征。

作为一个概念和一种被研究的客体，民粹主义自身的命运是反映历史的一面镜子。民粹主义的研究也具有阵发性，它曾经掀起过一段来势凶猛的浪潮。毫无疑问，这归功于知识分子

民粹主义

的追赶时尚，但有趣的是这股浪潮没有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持续高涨。争论也是散乱的。把这些事件的碎片组合在一起肯定是一个令人不舒服的过程，因为不同的事件是彼此分割的，发生于明显不同的环境之中。如果我们想理解代议制政治和政治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准备融入到这个过程中，这是很关键的。我们只有对民粹主义有一些理解，才可能对代议制政治有全面的理解。

第二章 关于民粹主义的定义

民粹主义为众多男女主人服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民粹主义一直是变革的力量、反对变革的力量，是左翼进步政治的创造物，是对现状进行慎重辩护的庇护所，是极右派的同伙人。民粹主义者一直都被描述为易受愚弄的民主主义者和恶魔。虽然民粹主义这个术语被广泛应用，但所给的定义常常较为狭窄。民粹主义常常拒绝某些太普遍或者对某类人（不可避免地是有问题的一类）来说太受欢迎的建议。人们试图确认民粹主义的核心——贯穿在于其中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东西——这些尝试给一些作家留下了明确的意识，即对其没有明确的认识（如穆泽利斯 Mouzelis 1985，344；塔格夫 Taguieff 1995，17，25）。

对于如此常用的术语来说，令人惊奇的是民粹主义没有成为被人们所接受的一个概念，并且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民粹主义已经受到有系统地对待，但作为一个概念却很难在周围的人们中得到认同。就像民粹主义运动本身出现的那样，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纷纷出现各种尝试，试图抓住民粹

民粹主义

主义的本质，但要看到始终一致的模式却十分困难。大多数人把民粹主义被看成是与他们所关注的背景相关的具体内容。更加雄心勃勃的人试图用普遍化的术语来界定民粹主义。而另一些人则将其描述为多变的事物，即没有本质却形式多样化。

人们往往从背景的、普遍性的和多样化的角度来对民粹主义进行界定，出现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民粹主义进行研究的方法有所不同。从定义上讲，对民粹主义的特定表现的历史研究是背景性的。许多对民粹主义的背景性定义，包括农民激进主义、庇隆主义、社会信用运动的观点以及俄国民粹派，都来自于对其特定背景的详细研究。正是这种详细而单一的历史研究本质，才使得更加广义的含义可能变得含蓄。如果对定义进行明确的尝试，即使是背景性的解释，那么就有可能对其进行概括，即这些含义是否解释明确，应用是否系统化。试图把一种背景性定义用于另一种背景，我们总能增加对这种观念的理解。如果是这样，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很多背景性定义行不通，因此，民粹主义观念（与其特定表现相反）只能按照太过于具体的方式进行构架。另一方面，有些民粹主义研究来源于背景，它并不打算让其具有普遍性，但已经形成的民粹主义概念已经被广为接受。

我在本章中所进行的这些研究，要么是明显地试图对民粹主义进行概括（普遍性和多样性），要么是明显的背景性的但具有含蓄的概括，目的是给民粹主义学者提供一个“最新研究动态”（state of the art）的概览。

民粹主义的最新 研究动态 (The state of the art)

20 世纪 50 年代，当爱德华·希尔斯 (Edward Shils) 写信直接回应美国麦卡锡主义时，对民粹主义作了背景性的解释。希尔斯 (Shils) 把民粹主义看成是多面性的，它渗透于德国的纳粹专制以及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之中，他认为“对于长期形成的等级统治阶级，这些阶级垄断着权力、财产、教养以及文化，在他们所实施的统治过程中，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存在着民粹主义” (希尔斯 Shils 1956, 100-1)。对于希尔斯 (Shils) 而言，理解民粹主义的关键在于了解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从对待现存机构——国家、大学、官僚和金融机构的态度方面来看，民粹主义被描述为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因此，毫不奇怪，民粹主义基本上不信任那些充斥于这些机构中的人，认为他们不仅腐败，而且缺乏智慧。智慧属于人民，政治机构只有认同于——而不是代表——人民的意愿，政治才被看成是合法的 (希尔斯 Shils 1956, 101-3)。

20 世纪 50 年代出现的麦卡锡主义现象，对美国的民粹主义学术争论有着重大的影响，它警示很多人，极端主义具有导致危险的可能性。希尔斯 (Shils)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作的。继麦卡锡之后，在美国又进行了一些研究，力图探索和解释右翼极端主义的爆发的原因 (李普塞特 Lipset 1963; 比尔 Bell 1963; 罗金 Rogin 1967; 李普塞特 Lipset 和拉布 Raab 1971)。有

民粹主义

两个方向指导着这些研究和写作。第一个方向可以追溯到那一个时代和麦卡锡主义时期的人民党和民粹主义运动思想之间的关系。因此，以前的民粹主义完全被说成是盲从和落后的极端主义。这些研究的第二个方向是期望建立支持极端主义的社会基础，弄清这些转向这种极端主义的这类人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希尔斯（Shils）后来将他对民粹主义的分析扩大到解释非洲和亚洲的民粹主义。他以一种明确地比较的方式来进行研究，认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出现了全球化的知识团体，因此，“大都会与兴起的倾向于世界范围的地方性知识团体之间出现了紧张现象”（希尔斯 Shils 1962，214）。根据民粹主义的历史，他认为，其根源在于德国历史之中，因为国家、大学和宗教当局的统治遭到了摒弃和批判。在德国，在“平民”或人民中存在着信仰。通过对美国和俄罗斯的民粹主义的比较，在描述了非洲和亚洲知识精英的民粹主义后，希尔斯（Shils）认为民粹主义的特点是相对主义（敌对主义）？。

康豪泽（Konhauser）在他自己的大众社会分析中，采用了希尔斯（Shils）的民粹主义定义。他认为，由于民粹主义在面对社会差异时否定多元性，主张同一性，所以民粹主义在大众社会中既是起因，又是结果（康豪泽 Konhauser 1959，103）。因此，大众社会导致民粹主义民主的产生，他认为与之对应的是自由民主。作为规避代表制机构和社团的方式，民粹主义民主需要人民直接参与，而且还要取消个人自由，因为人民是整体，有优先权（康豪泽 Konhauser 1959，131 - 2）。

希尔斯（Shils）强调这种世界性知识团体的新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特定国家背景中的精英阶层与（特定）社会部门之间的关系的冲击性影响。这反映出很多民粹主义的定义中有着根本的一致性，这也是对现代性或者现代世界的特点的反应。尽管希尔斯（Shils）当初关心的是美国，重点放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上，但综合考虑日趋全球化背景下的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对那些研究世界的人就会有一种自然的回应，这些人也处于经济的边缘。

托丘尔多·迪·特拉（Di Torcuato）仔细考察了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但其考察显然只是相对的，特别是与欧洲的经历比较。在其早期的民粹主义著作中，托丘尔多·迪·特拉（Torcuato Di Tella）试图提出发生在拉丁美洲的不同类型的民粹主义，目的是想说明拉丁美洲的发展与欧洲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托丘尔多·迪·特拉 Torcuato Di Tella 1965）。随着 1989 年的东欧剧变，托丘尔多·迪·特拉（Torcuato Di Tella）开始把拉丁美洲与东欧的经历进行比较（托丘尔多·迪·特拉 Torcuato Di Tella 1997）。托丘尔多·迪·特拉（Torcuato Di Tella）强调说，民粹主义出现的时机是中产阶级中的精英人物产生反抗现状的动机，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精英和大众中产生了共同的激情时，不断上升的期望造就了大批的可以动员的市民群体（托丘尔多·迪·特拉 Torcuato Di Tella 1965, 53）。他将民粹主义定义为“是基于动员起来但还未成为独立组织的平民群体的政治运动，这些民众由扎根于社会中层和上层的精英领导，在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由具有超凡魅力和个人化的领导连接在一起”（托

民粹主义

丘尔多·迪·特拉 Torcuato Di Tella 1997, 196)。他认为民粹主义会在这些条件下出现，即社会民主党派在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出现（托丘尔多·迪·特拉 Torcuato Di Tella 1965, 1997)。因此，对托丘尔多·迪·特拉 (Di Tella) 来说，民粹主义随社会向现代性推进而发生变化。

显然，迪·特拉 (Di Tella) 所着重强调的民粹主义是以穷人和上层精英中的部分人之间存在的差异感以及支持联合的人的社会特性为特征的。这种差异感极为重要，但如果试图通过民粹主义运动的社会整合来论述民粹主义的特点，势必限制了民粹主义的范围，因为民粹主义在其各种表现中已经有了一些不同的社会基础。

迪·特拉 (Di Tella) 强调指出，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也会产生差异感，即经济欠发展国家的精英阶层之间，因为他们把自己与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的精英阶层相比较。另外一种情况是社会团体之间，因为他们对现状有不满情绪。这些社会团体包括那些受过教育，但感觉无法施展其才华的人，以及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社会地位低下而且生活条件差的人，他们也会形成一种不满情绪 (迪·特拉 Di Tella 1965, 52)。

迪·特拉 (Di Tella) 论述民粹主义的难点在于，把社会本身设想为在一个固定的发展连续体上或沿着这个连续体的自身运动，他对现代化发展的单一目标的假设是含糊不清的。这就等于忽略了发生于发展本身以及社会目标中的根本变化。第二个问题是，民粹主义发生于经济和社会都肯定非常现代的社会。可以看出，美国几乎就是一个民粹主义的典型国家 (卡津

Kazin 1995)。民粹主义在欧洲政治中具有复发性的特点。然而，正是那些具有这种复发性特点的人，如第三世界或者拉丁美洲中的迪·特拉（Di Tella）这样的人从一定的利益出发提出了民粹主义的概念，迪·特拉（Di Tella）把这一点看做是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征（参见例证：马洛伊 Malloy 1977；杰默尼 Germani 1978）。

许多作者围绕拉丁美洲的经历提出了很多主题，这些主题思想在那些研究非洲和第三世界政治的基本情况的学者中产生了共鸣。加文·基钦（Gavin Kitching）把民粹主义作为他分析思考发展问题的中心。他认为民粹主义是对工业化的回应，其特点是小规模生产占优势，反对集中化大规模生产（加文·基钦 Gavin Kitching 1989，19—22）。因此，这是一个带有浓厚色彩的经济学分析方式，并且特别关注农民的意识形态，为此，他高度重视俄罗斯的民粹主义，并把它作为这种思想的典型范例。

加文·基钦（Kitching）论述民粹主义的难点在于过分具体化。民粹主义的概念是在探索对政治经济思考的论点的连续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加文·基钦（Kitching）的问题不在于论述不精确，而在于他从民粹主义的形成过程推导出民粹主义，而不是从引起这种思想形成的推动力方面入手。民粹主义实质上是对规则的反应。在农业农民社会的背景下，如果用政治表述，这种反应将会形成一套思想观念。然而，我们正是在这种反应中，而不是在这种反应的形成中发现民粹主义的本质的。回顾庇隆（Peron）的民粹主义，可以看出，他所提出的观点

民粹主义

和思想在根本上具有比较灵活的特性，这一点可以从产生这些观点和思想的推动力上得到证实。加文·基钦（Kitching）优先考虑的是民粹主义的第二特征。所有的民粹主义都会产生附加的思想，但这些并不是使其成为民粹主义的思想。

吉塔·艾尼斯丘（Ghita Ionescu）和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于1967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组织召开学术会议，试图把不同观点的民粹主义专家召集起来，以便得出一个更加一般化的理论。当时有43人参加了会议，到会的人来自于世界各地，因此，潜在地避免了其他可能企图对民粹主义理论化的具体做法。

在会议最终所形成的民粹主义的论文集（艾尼斯丘 Ionescu 和盖尔纳 Gellner 1969a）的这本书的序言中，编者说这是“试图澄清这个概念的主要方面，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这个概念对政治思想的形成比普遍公认的还要重要得多”（艾尼斯丘 Ionescu 和盖尔纳 Gellner 1969b: 5）。如果把民粹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现象来认识，他们就必须明确地处理那些需要回答的问题。他们追问民粹主义能否被认为是一种思想，一种由相似条件产生的、反复发生的心理、一种政治心理、一种相反的现象（反资本主义、反城市化、反闪米特人），一种亲人民的现象，或者一种被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农民主义所接受的心态（艾尼斯丘 Ionescu 和盖尔纳 Gellner 1969b: 3 - 4）。尽管他们希望这样，但论文集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民粹主义的共同的核心思想，虽然从论文集上讲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研究，而且也的确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个别贡献。

在论文集中，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在他所撰写的章节中，明确地概述了美国、俄罗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但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共同的方面才具有很强的普遍性（言外之意是用途有限），因此，民粹主义“最好被认为是一个重点，一个普遍性的政治文化的维度，而决不是一种特定的总体性意识形态体系或者组织类型”（沃斯利 Worsley 1969, 245）。他又回到了希尔斯（Shils）关于民粹主义的定义，即强调人民主权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直接接触的重要性，这可以作为最接近他的概述所达到的共同的核心（沃斯利 Worsley 1969, 243 - 6）。

由于把自己限定于“第三世界”（Third World）民粹主义的变体，沃斯利（Worsley）的概括性更差，他认为民粹主义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同质的，在他们之中只有非对抗性的差异。这意味着政治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且本土社会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第二，真正的冲突来源于社会或国家与外部世界之间，尤其是殖民主义强国之间的冲突。第三，共同体是通过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政党来表达综合了的社区、社会 and 国家的意愿。第四，政党成为思想解放的代理人和经济发展的—种力量（沃斯利 Worsley 1969, 229 - 30, 1967, 165 - 7）。

彼得·沃斯利（Peter Wiles）由于“缺乏专家知识”而胆量过大，他把民粹主义的 24 个特征概述为一种综合症（Wiles 1969）。民粹主义具有说教性；具有某种表象性的风格；依赖于非凡领导人；是一种不受约束的运动，在其自我界定中缺乏

民粹主义

很强的自我意识；反知识分子；反对现行社会制度；倾向于无效和急促的暴力；有阶级意识，但具有调和性，以避免阶级对抗；易受成功的影响而腐化和资产阶级化；会妥协并进行有限的合作；能够得到财富有限的人的支持；强烈反对金融家；对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资本家可能更不苛刻；对城市（也包括农村）可能苛刻；赞成政府干预行为；反对其极力反对的由现行社会体制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在外交政策上对现行军事体制持特别的怀疑态度，但在本源上却是孤立主义者；赞成宗教，但却反对现行宗教体制；蔑视科学和技术；具有怀旧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温和的种族主义；多元性（跨越前工业社会的、农民反工业主义的、农场主容忍工业的）；并且不认为这些是坏事（怀尔斯 Wiles 1969, 167 - 71）。

在集会上，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试图对讨论的总体意义进行概括，他提出，对用于解释不同变体的民粹主义的六个特征应该有一个总体性的一致意见。第一个特征是承认礼俗社会（近似于社区），这可导致完整而协调的社会的思想的形成。第二个特征是民粹主义不关心政治，即对政治体制不感兴趣，因为民粹主义首先信仰社会，其次才信仰国家。民粹主义关心的是使人们在经受某种精神崩溃之前，回到人类本来就具有的自然和自发状态。第四个要素是民粹主义留恋过去，试图把古代的价值观带进当代社会。伯林（Berlin）“试探性地”把这点收罗进来，即民粹主义虽然指的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但总是设法以大多数人的名义说话。最后，他认为民粹主义发生于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现代化过程的不同社会之中（伯林

Berlin 等 1968, 173 - 8)。

欧内斯特·拉康 (Ernesto Laclau 1977) 提出了一种民粹主义理论，它有力地表明了民粹主义的明显的矛盾性和令人困惑的特点，而且也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的认可。他认为试图通过搞清楚被描述为民粹主义的一系列运动有什么共同特点来对民粹主义进行概括，这是一种循环。把焦点集中在民粹主义运动上，意味着已经知道了民粹主义是什，其结果是对本质上不同的一系列运动进行概括 (拉康 Laclau 1977, 145)。拉康 (Laclau) 分析民粹主义的出发点是，民粹主义根本上是一个难懂的概念，而且明显是相互矛盾的。拉康 (Laclau) 以比较复杂的方式来对其进行论述。他认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即那些代表统治或支配阶级的思想，作为占支配地位的表达方式，总是通过以允许其表达但只能以一种方式、突出其不同但不是本质上敌对的方式来吸收其他思想，并对其作中性化处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可以看做是精英阶层的思想意识。因为当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企图建立霸权地位但又做不到时，就会直接求助于广大民众 (拉康 Laclau 1977, 173)。

对拉康 (Laclau) 来说，要了解社会就必须了解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社会力量部分地反映出了生产过程中的矛盾。简单地说，各种社会都表现出一定的阶级对抗性。然而，他还看到，有时还存在着不是在特定阶级之间发生的更为广泛的冲突——一个社会的普遍传统将会反映出更为广泛的普通民众的事物，而这些普通民众不是支配阶级，而是被统治

民粹主义

的对象。这就是“人民”与“权力集团”之间的冲突。从这一方面来看，那些要求统治阶级的思想就可以称之为大众的民主思想。当特定阶级之间的对抗性以大众民主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就发生了民粹主义。但是，根据拉康（Laclau）的观点，这种民粹主义的产生必须有两种形式，即阶级的和大众民主的形式。更简单地说，民粹主义同时为一个阶级和为“人民”说话，即使两者不是同一事物。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民粹主义是如此令人困惑，因为“人民”与“权势集团”之间的冲突非常具有普遍性，但其表现形式却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部分地源于动员反对“权力集团”的阶级的不同特性，这还说明了为什么民粹主义在历史上一直属于此类阶级的范围。

玛格丽特·卡农范 Margaret Canovan（1981）雄心勃勃地试图抓住民粹主义的本质。她提出用多样化的方法来对农民民粹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进行区分，其范围涉及到整个世界的民粹主义运动历史。她详细地把农民民粹主义分解为农场主民粹主义、农民民粹主义和知识分子民粹主义。在对美国人民党的农民激进主义、加拿大 20 世纪 30 年代的“社会信用运动”以及德国 19 世纪 90 年代农民运动进行比较之后，她摒弃诱惑，反对把这些运动说成是独特现象，而是把它们看做是具有相关性的统一体。她认为，这些相关性就是农场主要求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卡农范 Canovan 1981，104）。

通过研究俄国民粹派的农村激进主义，并将其与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和玻利维亚的农民社会主义形式进行比较，卡农范（Canovan）指出这些民粹主义形式具有共同的倾向，即在

农民的理想化顺从性与为这个理想化团体提供领导的需要性之间来回摆动（卡农范 Canovan 1981, 109）。在这种情况下，她认为，在努力促进和动员农村人口的过程中，精英人物的角色意味着这种农民民粹主义的形式实际上与知识分子民粹主义的作用是相同的。卡农范（Canovan）所描述的各种农民民粹主义的不同形式无可争议地占据了中心舞台。卡农范（Canovan）所看到的农民民粹主义的农民的变体，正是源于出现于 20 世纪早期并发展成“绿色暴动”（Green Uprising）的东欧农民党。这种运动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目的是在农民中发展和推行自愿合作的思想，强调民主、家庭财产和与城市的对抗性。卡农范（Canovan）认为，在这些不同的农民民粹主义类型中有过多交叉的部分来“使一个单独术语的应用明白易懂”，而不是“用一个单一的观点、计划或者社会经济基础把所有这些运动看成是一个孤立的政治现象”（卡农范 Canovan 1981, 133）。

如果把焦点专门集中在农民民粹主义上，就会有很多的缺失。正如卡农范（Canovan）（1981, 136）所认为的那样，因此，非常重要的是要考虑民粹主义中的“政治”部分。她认为，需要综合考虑民粹主义者的专制、民粹主义者的民主、保守的民粹主义以及政治家的民粹主义。只要我们考虑到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范例，就可清楚地看到，不能把民粹主义看成是专门的农民运动，当时的城市运动领导人强劲有力，打着改良主义计划的旗帜，号召更加广泛的“人民”（实际上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移居美国北方后，卡农范（Canovan）

民粹主义

的观点与休伊·朗（Huey Long）的政治见解相吻合。休伊·朗（Huey Long）在 1928 年至 1932 年间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32 年至 1935 年为美国参议员。朗（Long）的政治吸引力在于谴责华尔街的财富过于集中，提出路易斯安那州的社会改善规划，但他却通过欺骗式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和暴力政治来实现它。就像庇隆（Peron）那样，朗（Long）是一位强有力的穷人的领袖，但其政治观点中并不一定就有农民的因素。

卡农范（Canovan）使用“政治民粹主义”概念的第二个意义是，描述那一套与实施直接民主相关的公共机构。20 世纪早期的进步运动的根源是美国 19 世纪的民粹主义运动。与民粹主义运动和人民党不同，这一运动主要是由上层阶级的思想来驱动的，而不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就像民粹主义运动那样，它不信任代议制政治的公共机构，而是寻求引进那些能够避开代议制功能的机制，比如公民立法提案权、公民复决投票权以及罢免权。这些建立在由 19 世纪民粹主义所奠定的基础之上的在西方国家中运行良好的机制增加了美国的民主模式（卡农范 Canovan 1981, 177）。需要采用这些机制来补充美国的民主模式所隐含的假设是代议制民主能够更多地代表某些特定的利益，其公共机构可以成为强大的利益集团的俘虏，这样就使良性的代议制机构转化为非常强大的权力手段。卡农范（Canovan）比较了瑞士的情况，那里的直接民主机构并没有太多额外的机构特征，而只是政府结构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瑞士的情况说明，民粹主义者的民主形式会产生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强调权力下放，广泛采用公民复决的方式来解决高度分化

和分割的人口问题，这种系统还会在困难的环境下产生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主形式，为我们提供一种评估“民粹主义民主的优点优势和缺陷”的模式（卡农范 Canovan 1981, 202）。

卡农范（Canovan）提出的第三种政治民粹主义的形式是保守的民粹主义。卡农范（Canovan）比较了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和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的情况。1968年，基于其抗议种族隔离的经历，华莱士（Wallace）作为第三党派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而就在这一年，鲍威尔（Powell）发表演讲，警告人们注意移民对英国文化带来的危险。两人共同呼吁，强调精英的价值观与人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认为“在基层的保守派、专制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或者沙文主义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冲突，精英阶层具有进步、自由和宽容的世界主义特征”（卡农范 Canovan 1981, 229）。另外还使两位政治家联手的是，他们都反对表面上的进步的浪潮。卡农范（Canovan）提出一个观点是，进步与民粹主义之间的这种冲突主要取决于背景情况，即如何看待“进步”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反对主流统治思想的民粹主义可以说既有反应性，又有合理性。根据卡农范（Canovan）的说法，所谓“臭名远扬”的东西也能被看做是对贫困的真实情况所作出反应的民众观点的一部分。（卡农范 Canovan 1981, 257-8）。

卡农范（Canovan）的最后一种政治民粹主义形式是政治家的民粹主义。这种政治就是玩弄谁是“人民”的模糊性。通过对非洲民粹主义经历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政治家

民粹主义

作出声明，他们代表一个超国家地域的全体人民。这就为一党专制统治的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政治家也试图通过创建超阶级或者“包罗万象”的联合政府来构建一个统一的人民。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成功运作，其原因就是运用了外来者的民粹主义者意象，即一个诚实的农场主在追求权力，而与此同时，却在全体选民中故意唤起自由和保守的本能反应（卡农范 Canovan 1981, 269 - 73）。

卡农范（Canovan）在描述她的七个范畴时，明确指出，不可能找到民粹主义的核心价值，但可以区分出许多不同的症状。通过分析概括七个范畴的相同性就可以表明，关于“小人物的民粹主义”、专制主义者民粹主义和革命的民粹主义之间都有很多相同性（卡农范 Canovan 1981, 291 - 2）。她也认为，民粹主义的特定历史表现既可使这些范畴相互结合又相互分离（卡农范 Canovan 1981, 293）。七个范畴中惟一共同的主题就是依靠对人民的感召力，不信任精英人士（卡农范 Canovan 1981, 264）并且充其量只是对这种作用的限制（卡农范 Canovan 1981, 298）。她的结论是民粹主义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术语，因此，对其进行某种澄清非常重要，但是民粹主义又包含着没有共同核心的范围极其广泛的现象，因此，她所尝试着提供的分类学是处理这种复杂性的惟一方法。

最近，美国批判社会理论的激进（经常刊登反对崇拜偶像的内容）杂志——《终极》试图从理论上把民粹主义阐述为一种概念。尽管撰稿人的立场各异，但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都力图把民粹主义阐述为一种概念，使其成为一种工具，发展与杂

志有关的各种批判理论。《终极》杂志的立场的核心是民粹主义为批判和替代自由主义的霸权提供了最大的希望。作为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典范的“新政”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危机加强了这种替代的必要性，并且由于驾驭新的管理型国家需要通过专家来进行管理而形成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化的、官僚化的精英的“新阶层”与传统的支持“新政”政治的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之间的断裂也加强了这种替代的必要性。《终极》杂志的立场与我强调民粹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应相同（在我的案例中主要是针对自由民主政治的机构而言）。我特别关注代议制政治中的精英人士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格格不入的现象。《终极》杂志认为，需要重新唤起地方政治以及有责任感的个体参与政治活动的活力，因此，可以把民粹主义看成是一种潜在的自由政治的规划。

《终极》杂志把意大利出现的地区性联盟（如 Lega Nord）看做是他们的理论得到广泛应用的标志，该杂志试图将民粹主义发展成为针对自由主义评论的批判理论的新途径，并使其与激进民主立场相结合。尽管《终极》杂志已经看到，民粹主义有可能蜕化为种族主义和新的排斥性理论，但还是认为在民粹主义方面，这只是一种潜在危险，既不是本质性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已经努力考察了欧洲出现民粹主义者的可能性，但很清楚，《终极》杂志的民粹主义概念虽然已经理论化，但却还真实地体现在美国政治生活的背景中。美国政治机构中的自由主义（“新政自由主义” ‘New Deal Liberalism’）的具体格局的重要性，正如清晰明确的美国民主的创建理念一样重要

民粹主义

(参见皮科恩 Piccone 1995), 这说明《终极》杂志的民粹主义概念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对后里根时代 (post - Reagan era) 的美国的反映。

通过对民粹主义概念化研究的最新动态的考察, 可以看出关于民粹主义研究的四个明确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把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概念来处理的资料相对较少。考虑到该术语的广泛普遍的使用, 这着实令人非常惊奇。第二个特征是, 那些试图在观念上进行大胆地或者明确地比较的概念化东西, 几乎总是带有其原来形成的背景性的痕迹, 因此, 定义太窄, 不能帮助我们形成一种更加普遍化的概念。第三个特征是, 非常明确地期望通过收集全球范围的案例进行总体研究 (艾尼斯丘 Ionescu 和盖尔纳 Gellner 1969a) 而得到一种概念化的东西, 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一种明确的范围广泛的学识和专业技能方面的综合性的东西。最后一个特征是, 根据卡农范 (Canovan) (1981) 的研究, 那种在概念化方面进行广泛而大胆的尝试将会得出的结论是, 民粹主义实质上是一个破碎断裂的概念。

[有关《终极》杂志立场的各种文章和论文集请参见安德森 Anderson 等, 1991, 《终极》1991, 1991 - 92, 1995a, 1995b; 皮科恩 Piccone 1991。也可参见拉希 Lasch 1991]

第一部分：
民粹主义实例

第三章 美国的 政治运动和民粹主义政治

没有民粹主义的一些常识，便很难理解美国的政治，同样，没有对美国民粹主义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把握民粹主义。正如在宪法中所明示的那样，美国的政治体系和许多具有美国特色的东西都是围绕代议制民主的原则而建构起来的。因此，作为代议制政治的反应和产物，民粹主义就像装饰的图案一样贯穿于美国的政治生活之中。

19 世纪晚期，在人民党和民粹主义的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民粹主义的重要人物。这种现象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并不突出。追溯历史，民粹主义政党作为一支独立的新生力量，在试图突破美国政党体系时的失败便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有趣但却微不足道的要实现从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两个持续存在并处于相互对立竞争的两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民粹主义者常常会面临被 19 世纪 60 年代内战的创伤和 20 世纪 30 年代罗斯福新政之重塑所挤压的危

民粹主义

险。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人民党和民粹主义运动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他们明确地体现、表达和动员了深刻地贯穿于美国政治生活并深置于民粹主义者心中的目的和动机。

纵观美国的政治，人民党的历史为民粹主义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动员提供了一个最为生动的案例。19 世纪美国民粹主义的本质不是作为那些特别有号召力的领导者（像庇隆案例中的那样），或者一些深谋远虑的精英团体及一些致力于理论发展和实践的复杂而又抽象的意识形态体系的理论家的功能之用的（以俄国为例）。人民党为这场深得人心并曾经孕育了自身的群众运动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在人民党的历史上，而不仅仅在其他任何形式的我们正在深思的有关民粹主义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群众运动的政治的诞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的社会现象。以“人民”的名义也就表明了这场运动在南部和西部农民中真正受到欢迎的特点。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和人民党表明了一个进步的民粹主义产生的可能性：它推崇激进变革，却缺乏革命热情。

美国的民粹主义不是从人民党开始，也不是以人民党而告终。就像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1995 年）所认为的那样，民粹主义是美国政治所必需的。卡津（Kazin）认为民粹主义的根源在于反精英主义和来源于 19 世纪新教改革运动及启蒙运动的一些理念的结合。尤其是宗教信仰和理性主义，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主义”。卡津（Kazin）观点的核心是认为民粹主义看似永久却易变的政治形式能从进步的、支持改革的左派意识形态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也确曾

第三章 美国的政治运动和民粹主义政治

发生过这样的转变。在所有这些外表下，民粹主义能够宣称这种激情而狂热的改革运动没有转变成革命倾向。在卡津看来，民粹主义使美国政治体制受到了明显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威胁到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基础的意识形态结构。

卡津（Kazin）描绘出了始于人民党，而贯穿于 20 世纪早期劳工运动的民粹主义的发展谱系，同时表达了他对集权国家及全体财富集中制的反感。在禁酒时期取得成功的一些运动中，卡津（Kazin）注意到了民粹主义宣称富有阶级应当照顾那些贫穷的醉汉和无能力的抗议者。从政治学之父弗兰克·库格林（Frank Coughlin）的政治理论以及他试图建立一支新的力量反对企业巨头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愿望出发，卡津（Kazin）认为民粹主义一开始就跟上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s）打击“经济保皇派”的步伐，但随着因库格兰（Coughlan）在二战中支持法西斯主义而产生不和最终以美国主义宣告结束。在冷战期间，卡津（Kazin）曾认为民粹主义者会从进步政治转变为保守政治，通过麦卡锡（MaCarthy）在国会之中的反共产主义的政治迫害，以及南方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政治角逐，民粹主义的画面最后被定格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代表的政治右翼势力身上。

就像在透镜的聚焦之下，人们常常会产生一种认为细节要比周围物体大得多的错觉的危险。观察美国政治几乎所有的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几乎在每个领域都能寻觅到民粹主义的踪影。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非常清楚的一点便是

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运动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特殊的共鸣。但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时刻、运动以及推动者，真正的民粹主义运动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要比卡津（Kazin）所说的少得多。卡津（Kazin）是通过美国政治这个透镜来看民粹主义的，但如果通过民粹主义这个透镜去看美国政治，所看到的画面和现实又稍微有些不同。

人民党和民粹主义运动

1892年在奥马哈，新成立的人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提名一位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从以地区性的乡村为基础的农民运动中建立的合作联盟以摆脱对东部金融系统和铁路当局的依赖这一背景中，可以看到一个羽翼丰满的政党已经形成。进入政党政治生活绝不是农民激进主义者进行大规模运动所能预知的结果，但这恰好表明了民粹主义者的一个清晰重大的变化。他们创建的政党未能取得成功，原因在于这一政党无法打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垄断地位。但人民党及19世纪美国民粹主义者的历史是从总体上理解民粹主义的关键所在。在奥马哈，人民党正式确定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候选人，在政纲的序言中，依据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 Donnelly）的富于激情的演讲，我们看到了一篇关于民粹主义理论的经典论述：我们的国家正处于道德的、政治的和物质的衰败的边缘，腐败控制了选举、立法和国会，甚至触及到了司法。人们道德败坏，报纸主要依靠资助或者保持缄默，公共舆论也默不作声，商业

不景气，家里遍布抵押品，劳动力枯竭，土地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辛勤劳动的果实被史无前例的少数资本家所攫取并用来作为增进他们巨额财富的资本，而且那些资本所有者转而鄙视共和，危及自由。从政府的不公平这一肥沃多产的源生地中，我们培育出了两大阶级——流浪汉和百万富翁。

一个反人类的巨大阴谋已经在两大洲被策划，并迅速占据世界。如果人们不能立刻认识并推翻它，这将预示着可怕的社会动乱和文明的毁灭，或者一个极权专制政权的建立。我们已经目睹了两大政党之间为了权力和战利品而进行的长达 25 年的斗争，而这一严重的错误给那些受苦的人们以沉重的打击。我们控诉掌权的两党放任这种可怕的形势进一步发展，而未能尽力去阻止或者约束它们。

在国庆典礼集会上……我们寻求恢复共和政权，并交到平民手中，平民才是共和国的创始者。我们坚持在目标上与国家宪法保持一致；塑造一个更完美的联盟，确立公平正义，确保国内和平安宁，提供公共保护，增进大众福利，以保证我们自己及子孙后代的自由之幸事（人民党 1978，90-2）。

贯穿序言引起共鸣的是民粹主义者的主题：道德败坏、阴谋集团、普通人的善良以及阴谋、背叛。在基调和内容上，序言描述说明了民粹主义者对政治上的挫折、焦虑和期望的看法。具体来讲，在序言中提出了一些参照创始时期的思想理念而制定的主题，以及美国在面对倒退而丧失崇高理想的可能性。这正体现了美国民粹主义中美国人的真正本性。

民粹主义

19 世纪美国的民粹主义的案例常常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典范，有关它的历史专著和译作是很多的。关于人民党和民粹主义的历史一方面常被描绘成反动的、本土主义的（霍夫施塔特 Hofstadter, 1995），或者相反，它被作为美国进步政治的首次激情上演，一次伟大的民主展望运动（古德温 Goodwyn 1976）。不管以何种方式评论它，人民党的历史在美国政治历史上代表的是一段非常时期。

美国内战（1861—1865）的结果留下了一幅可作为美国政治永久基础的关于地区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冲突的网络图形。民粹主义者就是从这种独特的政治模式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理解民粹主义运动产生的背景是很重要的，这会使我们想起内战及它的后遗症。

战争以南方的失败而告终，南北裂痕成了这场冲突永久的提醒者。代表都市化的北方与以农业为主的南方的分歧表现在许多方面。这场战争主要起源于南方依赖奴隶制来维持经济发展，但是南北分裂所包括的一系列分歧往往体现在奴隶制上。这种差别还在于北方地处城市，是政治、金融权力的中心；而南方则依靠棉花作为它的主要产品，仍是一个固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农业社会。民粹主义运动最初是一场南方农民的运动，但它的命运是和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西部地区。

第二个分歧是货币。内战对货币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争期间，国会创立了国家银行体系，并引进以美钞的形式作为纸币。战后，政府不得不处理围绕货币而进行的争议，这

第三章 美国的政治运动和民粹主义政治

些争议起源于应该让货币代表别的东西，而不只是价值本身，美国经济的各个部门为这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也成了争议的诱因。关键问题在于货币是否应当成为黄金储备的象征或者让它仍然像战时那样仅仅被看做纸币。政府政策将致力于寻求经济增长，以弥补战时所规定的纸币的价值与黄金的储备的价值之间的差别。这一举措使农民陷入了可怕的境地，因为他们不得不生产和卖出更多的产品才能获得同等的收入（古德温 Goodwyn 1976, 13 - 14）。南方农民战败，目前面临着经济破产。

第三个分歧存在于土地和工业之间。虽然这一点可以部分地归咎于南北分裂，但是以电报通信和铁路形式出现的工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城市工业劳动力与农业工人及农民之间的差别，以及金融家和银行家权力的增长都是致使 19 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民粹主义者努力使劳工们团结一致，有时这会促成联盟的产生，比如在伊利诺斯州，但这只是例外，通常情况下联盟往往极不稳定，也极易夭折。

最终的分歧聚焦在政党系统方面。以林肯为代表的北方共和党与保卫南方、捍卫奴隶制度和州权的较为保守的民主党之间进行政治角逐。这些党派只是地方性力量，还未得到它们总部的批准。这些党派还从不同的立场围绕货币进行斗争（里特 Ritter 1997, 34 - 37）。共和党直接转向金融保守主义（维持标准），民主党所面临的分裂主要是地区性问题，但随着党的东部派系的形成以及东部银行系统的建立，由于金融保守主义，党的西部和西北部派系趋于倡导较为激进的货币政策。在面对

民粹主义

将白银作为黄金和美钞的折中物、使其自由流通这一方案时，不同的地方政府达成了并不稳定的妥协。到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第二次任民主党总统时，党的各个不同派别之间的这一不稳定妥协最终崩溃。1893年出现了由金融、投资和农业危机所导致的大萧条，白银遭到谴责。克利夫兰（Cleveland）退回到原来的立场，决定维持黄金价格水平。这在党内突然爆发了争执，因此到1896年选举时，克利夫兰（Cleveland）被抛在了一边，党内由一位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silverites）已经被准备提为总统候选人的人来领导。

政党体制在战前和内战中出现了冲突的裂痕和轨迹。到19世纪90年代，关于政治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分歧已不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而在于这些党派与民粹主义的情结、运动，甚至民主党内的反垄断派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两党制和当时的政治生活不太协调。^① 因此，民粹主义者有对这一政党体制进行重组的潜力。

对民粹主义者来说，主要的战略上的困境是他们对民主党的态度问题。南方党派或者是民粹主义者的一个潜在伙伴，抑或是一种最根本的威胁。作为金融保守主义者，他们是敌人，但作为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人（silverites），他们却是潜在的同盟者。最后，在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后，民粹主义者对合作伙伴作出了决定性的选择，但人民党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具有现实

^① 这种剥夺南方黑人公民权意味着美国政治的另一个错误路线，黑人种族一直处于无权地位直到他们被赋予正式和有效的选举权。

的可能性。

民粹主义运动及人民党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动员。它代表着一种特殊的以地域为基础的，捍卫土地所有制的激进主义反对北方的经济、政治强权和政党系统失败的新生力量。人民党不是战后第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了一些强大的具有连续性的独立政治力量。美钞派（Greenback Party）从 1876 年到 1884 年持续存在，而且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它在 1878 年赢得了全国 13.8% 的选票，为政党创造了高水平的记录。但它真正的重要性在于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反垄断者这个平台。他们倡导把纸币作为流通手段以跟上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同步发展。另外，他们不顾自己的利益，确立了银行体制，这个政党的激进的思想、观点和选民成了后来民粹主义动员的根基。

民粹主义运动依靠自己的能力以农民联盟作为动员的开始，这个全国性的运动以 1877 年成立的得克萨斯联盟（Texas Alliance）作为它的发源地，这场运动试图让农民摆脱由南方诸州所控制的信用贷款留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独立，以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生产。这种留置制度是农民平时甚至困难时期能够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一种方式。这种制度的代价是农民被迫按照储蓄所的要求生产棉花，储蓄所以下一年收成的期望值给他们信用贷款。

联盟创建了一种意在使农民走向相互合作和增强自主性的体制。发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农场主运动建立了一种与只收现金的合作式商店相似的体制（古德温 Goodwyn, 1976, 45）。

民粹主义

但这种体制失败了，因为农民常常没有现金。因此联盟系统努力把农民们联合起来，对他们自己的贸易商店和集体性地出售他们的棉花进行统一的安排。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联盟的发言人走遍了得克萨斯州，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分支联盟，联盟在农民中培养了一种思想意识的能力，鼓励他们对政治发表评论，从而切合实际地为在个人和团体中形成新生的民粹主义力量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1884年，得克萨斯联盟（Texas Alliance）还在积极讨论这种联盟是否应该更具有政治性。但是在联盟所实施的改革措施中它已经从一种联合、合作性的运动转变为了一种政治运动，这种转变极大地打击了金融和财政系统、铁路和外国投资者，同时要求认可贸易联盟和合作商店，而且还提出了关于“美钞”（Greenback）的思想，它追求与“劳工骑士”（Knights of Labor）建立一种政治同盟，以代表工人阶级。

这一运动从得克萨斯州扩展到了南方和西部的其他城市。联盟的农民代言人发动了一场招聘和教育的运动，他们对如何建立一个本地区的民主组织以及如何建立高度集中的、合作性的买卖同盟体系提出了建议。1887年，这一联盟开始成为一个国家机构，它开始作为一个集体机构购买棉花然后将棉花出口给国外买家，因此忽视了已经加强了农民对棉花的依赖的留置权系统。

对农民来说，这种运动的扩展清楚地说明了铁路和金融当局位于这个系统的中心，而这个系统似乎在欺骗农民，并控制他们，以使农民为他们创造比其自身更大的利益。农民有理由

让铁路当局提供一个机会让其出售农产品，然而铁路的高成本也意味着对农民们不会因为这样的机会而发家致富。在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时候，通过把美元和黄金挂钩，意味着农民必须增加生产来维持相同的地位（古德温 Goodwyn 1976, 115）。联盟运动提出了一个减轻这些农民压力问题的方法，但是它助长了这样一种允许集体的，完全政治性的对条款进行评论的思想，而这正是产生如此多的问题的根源。

1889年，联盟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查尔斯·麦丘恩（Charles Macune）提出了国库的分库计划（sub-treasury plan）。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激进方案，它允许所有的农民根据当地的标准进行合作，以便通过联盟的交易体制使他们能够得到来年生活所需的信用贷款，并为他们的棉花获得一个较有保证的市场（古德温 Goodwyn 1976, 127）。在建立国库的分库计划（sub-treasury plan）的基础上，在面对银行拒绝借钱给联盟这种情况时，麦丘恩（Macune）被迫提议建立一个发行一种能够有效用作货币的国库券的系统。在这场运动中加强了美钞的观念，因为它再次向农民证明了金融体制是和他们的利益相竞争的。直到1889年，由于无法与那些由银行支持的农民的合作努力的竞争，得克萨斯交易所倒闭（Goodwyn 1976, 145-6）。

得克萨斯联盟（Texas Alliance）虽然是最重要的，但也只是多数中的一个，农民的激进主义比它更普遍。在伊利诺斯州、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和堪萨斯州，农民们创立了合作联盟。1890年，堪萨斯州人已经在自己的州里建立了人民党，并达到了成功选举的标准（纽金特 Nugent 1963, 91）。南方各

民粹主义

联盟的情况则不同，1890年，南方联盟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卡拉集会仔细商议关于第三党挑战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可能性，但是联盟中的南方成员与民主党之间的牢固关系排除了这一想法。直至1892年，联盟在圣·路易斯（St Louis）集会时，还未达成一致意见。人民党成立时，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 Donnelly）富于激情的演讲成了人民党党纲序言的根基，人民党在1892年的独立日在奥马哈举行了首次总统提名大会，并把一些有价值的文件作为著名的奥马哈宣言。

奥马哈宣言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试金石。序言引领出宣言的三项政纲条款——货币、交通和土地。就货币政策而言，宣言要求由国家管理货币，摆脱银行系统，政府管制的邮政银行可以保证人们的收入安全储蓄，它还提倡金银铸币应该不受约束和限制，这标志着他们从把货币和储蓄连在一起的关系中脱离出来，限制税收，以及一个进步的切实可行的所得税政策也是宣言的呼声。对于交通，宣言主张政府拥有铁路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最后，宣言要求土地作为财富的源泉和人类的遗产，应该不受投机买卖和外商投资的影响。那些被铁路系统或者其他公司企业所占用的超过他们实际用途的所有土地应归还给政府及居民居住之用。这三项条款也包括一些决议，虽然境况不同，但也为政党思想提供了一个敏锐的视角。这些决议包括秘密投票、税制改革、移民限制、自主权和全民公决方法、总统和副总统资格条件以及参议院直接选举（人民党 People's Party 1978，90-6）。

奥马哈联盟的重要性在于它企图建立第三党以挑战现行的

两党体制，但这一重要性被正在发起的这场运动的本性给弱化了。运动的坎坷意味着政党不得不忙于大量的与州进行协商谈判的各种会议，因为地方领导在企图建立一个包括一切的大范围的选区以维持它的民族的远大志向。因此，政党的领导权反映了不同州的政党纷繁复杂的个性特征，但它也并不总是它的根基——联盟的代表（古德温 Goodwyn 1976, 312）。在接下来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中，政党选举了一位前任联盟将军。

詹姆斯·韦弗（James Weaver）将军作为候选人，在 1892 年的选举中获得了一百多万张选票，但是民主党候选人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却被选举为总统。民粹主义的动力在于新生党派，而不是对党具有重要作用的合伙企业，因此重要的是政党，但它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贷款渠道的匮乏，因此使党的命运变得对运动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打破现行国家体制，使国库的分库计划（sub - treasury plan）变成现实的唯一出路。许多人民党候选人施压于议会，但是他们人数少，不能打破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国家政治的垄断。

政党不仅要面对内部的组织问题，而且还要面临由于民主党倾向于白银的自由流通的政策而引起的政治背景的变化。威廉姆·詹尼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一位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人（silverite），在 1896 年的选举中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同时，在人民党里爆发了那些希望和民主党及共和党里的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人（silverite）建立联盟的人们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看起来缩减政纲里关于白银的政策，可以使它免去一些奥马哈宣言里规定的义务，因此是必要的。但这

民粹主义

项举措遭到了那些热心维护农业的党内激进主义者的长期而强有力的反对。一旦民主党任命了布赖恩（Bryan）作为候选人，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人（silverite）就会迫使政党宣布布赖恩（Bryan）为人民党的被提名人。他们于 1896 年在圣·路易斯举行的大会上获胜，布赖恩（Bryan）为被提名为候选人。布赖恩（Bryan）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接受了人民党的提名。

布赖恩（Bryan）为接受提名还颇费周折，最终他依据民主党党纲来处理此事，一位金融家和一位前任银行家成了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布赖恩（Bryan）在总统选举中败北，人民党瓦解。在接受布莱恩（Bryan）作为民粹主义者的候选人时，人民党已经偏离了奥马哈宣言里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它在货币问题上转向单方面妥协，与民主党形成了一个不平衡的联盟。但这个联盟却挽救了民主党，而置人民党于死地。布赖恩（Bryan）在竞选中的失败已经为人民党和在美国政治上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民粹主义敲响了丧钟。

人民党的经历表明了许多关键的民粹主义的主题。政党和运动的失败绝不意味着民粹主义思想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终结。它们继续渗入语言、语调、甚至后来的一些运动及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人民党在 19 世纪末的命运给我们指明了民粹主义的循环往复的特性。在成为政治制度化的一部分时的矛盾心理，就像对民主党人布赖恩（Bryan）的支持上所极其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它造成了动员运动前行道路上的一个致命缺陷。与当权派的联合有利于集中力量解决在组织一个破裂的、分散的和多元主义运动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但它是牺牲大

多数独立力量的独立性为代价而进行的。

人民党是在面对内战所造成的严重分裂的情况下创建的，一方面这也成了运动的推动力量。民粹主义运动及人民党的存在恰好证明了来自普通乡村的美国公民所关注的政党的错误联盟。他们疏远了一般意义上的政党体制和政治。另一方面，给自己定位，开展大规模的运动是非常困难的。人民党及其运动的历史将成为地区性的、意识形态上的、局部冲突的一部分。由于国内分裂而濒于破产，政治根基也飘摇不定，人民党最终失败。保持与美国乡村真正的中心地区及选区居民的简单的共同意识之间的联系对于那些正在进入政党政治、进行妥协的运动来说变得极其困难，并最终进入政治的默默无闻状态。

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与历史上其他重大的民粹主义运动相比，非常清晰的一点是民粹主义运动的闪光点并没有和某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个性化的特定个人领导连接在一起。有许多具有非凡感召力的领导者，但是他们丰富多彩的经历和这场大规模的运动是截然分离的。里查德·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伯林以及其他有关的人，1968，143）指出美国的民粹主义没有伟大的理论家作指导，劳伦斯·古德温（Lawrence Goodwyn）（1976，310）则把民粹主义者的失败部分归因于社会理论的缺乏，而这一社会理论是应该建立在经济合作的理想之上的。这场运动的总的特性是和趋向制度化时意识形态上的困难混合在一起的。对重大事件来讲，地区性运动和国家性运动的差别决定了民粹主义者的历史只能是政治上的一种妥协，而不是狂热意识形态的体现。分裂的中心把南方民粹

民粹主义

主义者的责任推给了南方党派，而由堪萨斯州民粹主义者领导的西部民主党的民粹主义者则肩负了创建一支真正的第三党派的重任，这个党派把农民从他们的历史上的忠诚中被驱逐出来。

民粹主义者的挑战起源于农民中对经济危机的一种真实的感觉。这场危机使得他们不能依靠土地维持生存。农民联盟试图通过直接的方法找到一条克服危机的道路，但有许多因素，包括一些金融机构不愿延长信用给那些羽翼未丰的合资企业，使得这种想法成了泡影。导致的结果就是金融危机泛滥成灾，货币危机严重影响了银行家、铁路管理局和土地投机商，这些全都成了农民无休止的恶梦。内战后的政治重建是这场危机的导火线，因为政党系统没能就南方和西部的农民激进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提出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面对这些挑战，民粹主义者退回到美国乡村，重新接受中心地区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印证了农民作为富有成效的尽职尽责的公民和堪称美国革命思想源泉的宝库，以及创建一个农民自治的共和政体的形象。民粹主义者灌输给人们的信仰并不仅仅是抽象的思想。麦丘恩（Macune）的国库分库计划使农民联结成一个信用和相互合作的网络，这个合作项目表明了中心地区在现实的政治行动中的功效，这使得合作运动比政党政治更容易成功。

由于以农民联盟为基础，一些对现有体制的反感也经过了慎重的选择，因此使得这一时期的民粹主义运动在社会大背景里显得非同寻常。然而民粹主义者拒绝了财政机构和当地的经

济组织，他们试图建立自己的一整套复杂的选择机制。这套体制本身也并非不存在问题，但对民粹主义者来说，创建复杂的制度构架已是不同凡响了。

人民党的遗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作为两党制体系之外的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试图建立民粹主义政党，并几近成功，这确实是后来的两党制重组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伯纳姆 Burnham 1970），而政党继续存留，它们的名称也继续存在，这改变了美国政治的整个议程，在罗斯福新政（Roosevelt's New Deal）中利用政党来代表支持者的全新联盟和意识形态上的立场的做法达到了顶点。民粹主义者是即将到来的变化的警示者。

人民党的第二大遗产便是建立了一种与当前流行的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政治氛围。民粹主义中日渐减弱的激进主义，为支持激进变革而对革命的让步都成功地迎合了美国政治的内容。在美国，作为几乎所有政治演讲的基石——美国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允许、甚至鼓励改良主义者使用民粹主义者的政治模式。

休伊·朗（Huey Long）

和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

路易斯安那最有知名度的政坛红人休伊·朗（Huey Long）1893年出生于韦恩教区，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是重要的。两年 before，韦恩教区已经派出了一名代表参加辛辛那提的集会，一些

民粹主义

农民的代言人齐聚于此，试图在两个主要政党中推行一种可供选择的政治。韦恩教区的代表随身携带了包括 1 200 个选民在内的支持签名到辛辛那提。这些选民来自一个总计拥有 1 531 名成年人口的教区（古德温 Goodwyn 1976，334）。民粹主义在韦恩教区和路易斯安那州盛行起来，它为朗（Huey Long）奠定了一些政治根基并提供了使其快速有效发展的条件。那年是美国经济普遍萧条的一年，也是民粹主义的感召力正在上升的时候。朗（Huey Long）是一位民粹主义者，但他却通过民主党来推行自己的民粹主义。

朗（Huey Long）回避了农民运动的民粹主义，以一位民主党的身份进入政坛。从他政治生涯的开始，他就极力痛斥财富的集中和由社会地位，尤其是教育的程度所导致的不平等（朗 Huey Long，1933，37 - 9）。朗（Huey Long）公开反对华尔街及一些大的公司企业，比如美孚石油公司。他领导了改善公路和学校的运动，这在一个贫穷的乡村州里不能不算是一件重要的值得考虑的事情。他要求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教科书，为精神病人提供更好的慈善机构（海尔 Hair 1991，151）。他一上任就立即通过立法为孩子们提供免费教科书，他提倡发行债券为公路和桥梁而进行投资（海尔 Hair 1991，162）。他还引入夜校机制以扫除成年文盲（海尔 Hair 1991，228）。从作为参议员的身份出发，朗发动提出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分享我们社会的财富》，以在美国实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分享我们社会的财富》建议控制多余的财富，以确保其他人最低的基本收入水平。

第三章 美国的政治运动和民粹主义政治

朗（Huey Long）是一位风度翩翩、精力充沛的男人，他执掌权力的方式可以反映出这一点。他哄骗、威吓、作交易、煽动、威胁，甚至有时使用他纯粹个性化的力量去成就与他的目标相适应的立法。对于种族这一关键性问题来说，朗（Huey Long）持观望态度。他尽力维持三 K 党支持者的对他的支持率，这些支持者提出了除他们的种族主义的主张之外，还提出了反对天主教的主张。同时，他努力工作，以不至于疏远那些反对三 K 党的真正的天主教徒（海尔 Hair 1991，128 - 35）。他签署了加强南方种族隔离的议案（海尔 Hair 1991，165）。他害怕别人看见他与黑人共谋国事，但却没有避免因为与黑人有联系而被牵扯进羞辱政治对手的这一极端行动中去（海尔 Hair 1991，223）。就他对穷人的关注来说，他并没有为他们州的黑人做出什么大的贡献，甚至到他离任时，黑人和白人在教育地位上的不平等反而加剧了（海尔 Hair 1991，228）。朗（Huey Long）并没有为适应那些他已经明知的事情而改变自己的想法。等到他的晚年（他在 1935 年被暗杀）时，他已经集路易斯安那州的大权于一身，在一定程度上，他成了一名独裁者。他对这一谴责表示不满，声称如果他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去行动的话，不可能成为一名独裁者。

纵观朗（Huey Long）的政治生涯，他给人的一种朴实友善的印象。他让选举人直呼其名（海尔 1991，201），漠视参议院的礼仪（海尔 Hair 1991，234）。他还支持一位参议员寡妇，并成功地促使卡尔温女士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使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选举为拥有完整任期的女人（海尔 Hair

民粹主义

1991, 247-8)。他的穿着像他的语言一样多彩，他所煽动的对参议员的肉体上的暴力威胁就像从少数严厉的敌手那里所引发的一样多，这一点不足为奇。他很精通《圣经》，却对经济学著作一窍不通（海尔 Hair 1991, 271）。

南方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再次出现。1963 年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在亚拉巴马州州长选举中的成功使得一位民粹主义者执掌政权，从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谈论学校、公路、监狱和税收”（卡特 Carter 1995, 109），到他在国内崭露头角时，他发现了种族问题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在一场显示出反联邦和反黑人的潜在情绪的运动之后，华莱士（George Wallace）在他就任亚拉巴马州州长的就职演说里公开宣告：“现在隔离……明天隔离……永远隔离”。他在思想观念上采取了一种支持种族隔离、反对公民权利的立场，1963 年，他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卡卢萨市大学的黑人入学问题上采取了实际行动，第一次企图阻止黑人注册。但他又被迫放弃原来的主张，最先的两个黑人学生完成了注册登记。华莱士（George Wallace）在塔斯卡卢萨市被击败，但在肯尼迪于白宫执政期间的挫败，对他这个民粹主义者的磨练是非常有益处的。

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风格是好斗的，爱唱高调的，而这种风格是适合一位前拳击运动家的。他塑造了一个普通人的形象：穿便宜的套装，把头发光滑地梳向后面，坦白承认他的偏好是乡村音乐和番茄酱（卡津 Kazin 1995, 235）。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国内崭露头角，在成为州长之前，1947 年他通过

第三章 美国的政治运动和民粹主义政治

选举成为了州立法者。他通过南方民主党来成就大业，但民主党只是成了他在东部自由派的工具，经过激烈的争夺，他成为主要的总统候选人之一。1964年，华莱士（George Wallace）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并且作为独立候选人于1968年参加总统选举，政党对于他而言只是参选的工具，但是站在增进社会安全、改善健康服务、工会权利的立场上。这意味着种族主义对联邦的公民权利议程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李普赛特和拉布，Lipset and Raab 1971, 346 - 8），他成功地获得了 13.5% 的选票，并赢得了南方 5 个州的选票。

20 世纪 60 年代华莱士的政治观点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最著名的是他支持种族隔离，因此他有明显的种族主义政治倾向。第二部分是他信任权势集团，他的敌意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当权派延伸至银行家及富有阶级。他经常情绪激昂地抨击“墨守成规的官员”、“理论家”和“伪智者”。最后一部分是他把外部的权势集团作为一种防护，这种防护意味着反对联邦政府向各州征收他们极力反对的税收政策。这也意味着华莱士倡导税制改革，以使他的南方的自然选区中的白人受益（莱舍 Leshner 1994, 476）。

要理解华莱士的政治主张，关键的是要了解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政治的背景。面对变革，华莱士（George Wallace）主要热心于保护他的那些自然选区的选民，他的关于各州权力的议题反映了他同亚拉巴马州已存在的中心地区的紧密关系（或者是亚拉巴马州乡村白人的某种政治视角）。变革威胁到了这一中心地区。总而言之，变革不仅仅来自于联邦政府，也来自于

民粹主义

民权运动和新左派的社会运动。与其说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防御性的保守的民粹主义主要归因于新社会运动的挑战，还不如说根源于那些他能维护的东西。在面对新左派的挑战时，华莱士（George Wallace）准备重整旗鼓以保卫他的中心地区。

1968年，在参加总统竞选后，华莱士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获取亚拉巴马州的统治权上来，1970年他的确做到了。一旦上任，他便开始了种族政治主张（莱舍 Lasher, 1994, 457），转而回归到民主党中，并在1972年成为竞选总统的主要候选人之一。但在马里兰州，他遭到枪击，这使得他坐到了轮椅上，不得不退出选举。尽管在遭到枪击的第二天，他获得了马里兰州的初选，但还是没有赢得民主党的提名。他继续担任亚拉巴马州州长，并赢得了该州黑人的支持，并在1976年再次参加总统选举。1982年，他为自己以前对黑人的不当行为进行了公开道歉（莱舍 lasher1994, 501）。

华莱士（George Wallace）为赢得总统选举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立场说明了美国种族政治和民粹主义的关系。正如19世纪90年代的人民党运动对种族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解释一样（霍夫施塔特 Hofstadter 1955；古德温 Goodwyn 1976），对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转变也可以作不同的理解。因为民粹主义对产生它的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它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华莱士（George Wallace）政治主张的改变也表明了民粹主义根本不需要种族主义，尽管民粹主义者可能是种族主义者，为了得到某一地区选民的支持可能会实行种族排斥政策，把某

些种族排除在外，而不是包括在内。华莱士对他的中心地区思想的维护体现在以白人为主的亚拉巴马州乡村人们虔诚的信仰中。把黑人从某个选区中排除出去的原因是和南方诸州及华莱士的民粹主义的历史分不开的，参照历史，建立一个中心地区，种族分裂便不可避免。

1968年至1982年间，美国政治内容的变化具有双重性。首先，公民权利议案一方面体现在政府的三个分支机构（立法、行政、司法）所采取的行动上，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社会性的而非分离的。另一变化就是尼克松、卡特、里根都把温和的民粹主义当做获取总统职位的战略步骤，尼克松对媒体的敌意与吉姆·卡特发起的重视自己作为局外人的地位而开展的运动不谋而合。里根强调反精英主义和形成共同意识。当民粹主义变成美国总统政治中循环往复的一部分时，华莱士（George Wallace）使他的民粹主义者抢在别人前面而获得事业成功和赞赏。

当代美国政治学中的民粹主义

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罗斯·佩罗（Ross Perot）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出现，他是德克森地区（Texan）的一位亿万富商，佩罗几乎不以反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的原型出现，但就他参选的方式及目的而言，他的出现表明了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持续存在和发展。他获得了近80年来最为成功的第三大政党参加竞选的将近1/5的选票。

佩罗对政客和政党的不满表明了他爱唱高调的风格，用简单的道德说教和朴实的语言结合在一起，佩罗通过培育公共意识以及用一种商业理念去处理政治事务，他重视国债并认为需要制定一项计划来调整它。这个问题的用途和重要性恰好说明了佩罗如何有效地使家庭成员或者他认为许多政客会故意忽略的商业环境所提出的问题来产生公共意识。他要求美国减少国际债务，同时鼓吹通过对政客进行资格限制的重要性。这种观点和作风使选民们清醒地看到了政党的现状，这些选民们开始不信任政治活动，但是佩罗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对那些在选举中被动员起来的选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古尔德 Gold 1995，763 - 4；McCann 麦卡恩等其他人 1999，25）。

佩罗宣称他不想参加竞选，但又感觉有责任去做。他最初的候选人身份仅在电视访谈中出现，随后在一次民意测验中他赢得了其组织内部成员的支持。这种对政治的不满情绪在1992年的选举运动中再次出现，1992年夏，他突然退出竞选，但很快又重新回到竞选中来。这一举动加强了他对政治不满的形象，这一民粹主义者的姿态有意识地强调了佩罗不是有目的地寻求进入政界，而是当权者的失败迫使他如此。

佩罗一开始就建立了统一的组织“我们要团结起来支持美国”（the United We Stand America），可以作为其思想的具体体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采取了笼络那些非同盟的投票者以及团结那些感觉自己被排除在选举之外的民众等典型的民粹主义者风格的措施。“我们要团结起来支持美国”（United We Stand America）中的“我们”再一次以典型的民粹主义者的方

式明确地揭示了重建中心地区的呼声。^① 佩罗自身可观的财产在选举中的使用使大规模的招募活动成为可能，这次招募活动产生了普遍热烈的反应。为了招募那些积极分子，他设立了一部免费电话，与此同时，他还花钱制作专题广告片来传播他的思想。在这项活动中，他自掏腰包花了近 6 000 万美元，并拒绝接受政府的资助。

在 1992 年的总统选举中，佩罗的投入得到了回报，他得到了将近 19% 的选票，大约有两千万选民把票投给了他。这是自 1912 年西奥多·罗斯福进步党运动以后第三党最好的表现。之后，“团结起来我们支持美国”（United We Stand America）这一联盟转变成了改革党，成为美国政治中一支微小的力量。

佩罗和他发起的运动只不过是美国众多民粹主义运动中最近的一个代表。佩罗在政治上的出名，与其说归因于美国政治文化和民粹主义者理念之中的对民粹主义者遗产的继承和使用，还不如说归因于他的个性，这样理解不至于使我们忽略他的个性魅力。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政治说明了其政治体系的功能运转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性质及解决方法可能因人而异，但民粹主义仍然是衡量代议制政治是否运行良好的一个标准。

通过真正大规模的运动，美国政治为我们展示了真正意义

^① 在另一个富裕商人 S. 贝鲁特科尼那里这种方式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在意大利特利尔地区的佛罗伦萨建立了他的民粹主义政治组织。

民粹主义

上的“自下而上”的民粹主义运动的最好例子，迅速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第三政党对占统治地位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形成了挑战，实际上，人民党代表了大众民粹主义政治。人民党曾经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它产生了大批的民粹主义者，这并不矛盾，因为民粹主义的主题一直连续地贯穿于美国的政治生活之中（卡津 Kazin 1995）。在 1896 年人民党消亡之后，虽然民粹主义在美国并没有马上表现出来，但在 20 世纪民粹主义一定会伴随不同的政治事件而再次出现。

民粹主义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的出现是建立在对经济体制或者政治体制不满的基础上的。作为独立的反对力量的民粹主义运动常常（但也有例外）是在政党体系的范围之外的运动，因为对政治体制的失望，民粹主义者试图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变革。在一个极端，人民党是建立在激进的联合运动之外的草根民主政治基础上的。而在另一个极端，以朗和华莱士为例，民粹主义通过用几乎是惟一的建立在个人吸引力基础上的领导来有效地代替运动，以此来发泄他们对体制的不满。

从人民党的最初不愿涉足政治到 1896 年最终和民主党相融合，这些运动揭示了人民党的根本性矛盾：它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不是一个自发的反对与合作的社会运动。华莱士政治生涯的黯淡以及佩罗改革党选举的困境都说明了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局限性，甚至于极大地依赖于高度个性化的领导者，亦会有局限性。

具有危机意识对美国民粹主义的重要性依然没有改变。一些特定的危机可能已经改变，但民粹主义者的回应应该持续下

去。内战之后，南部和西部农民受到重创，引发了农业经济危机，这成为那个时代民粹主义运动的诱因。美国与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的对抗在 20 世纪的冷战中达到了极点。当这种国际的问题与国内的由种族和民权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和民众骚乱相结合时，就导致了分裂，这为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民粹主义提供了一触即发的氛围，他充分利用了这次危机造成的分裂。而佩罗的民粹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引发的经济发展的忧虑。佩罗主张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初衷是为了保证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安全，而此前世界经济一直被认为只能使经济发展不安全。

在美国，从民粹主义者的语言和思想中很容易发现中心地区这一概念最为清楚的解释。富有成效而又尽职的乡村中心地区的思想对 19 世纪民粹主义者是一个极富影响力的理念。19 世纪民粹主义运动最有号召力的影响之一就是在内战后，呼吁给以惨败的南方农村以合法的权利和自由，这与来自南方，并确实是南方政客的朗和华莱士的政治根基并不一致。美国的中心地区一直是以农村诸州农民所具有的纯朴美德来反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世界主义。一旦原先支持两个主要政党的“选举重新结盟”破裂，这就为佩罗所发动的反对华盛顿特区的政治权势集团的斗争而扩大中心地区的范围提供了一个机遇。

为研究民粹主义而掌握美国民粹主义运动如此多的资料是应该的。美国政治体系最初产生于一种围绕代议制政治的理念而建立的一种民主政体的基础之上。“建国之父们”的争论和发达的政治理论已经成为对现代民主政治含义进行争论的总体

民粹主义

中的一部分。民粹主义的理念和它对代议制政治的本能的反对使它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找到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具有美国特色的民粹主义不断地提及到国家创立的思想理念和反复出现的涉及失去天真与方向的浪漫主义者的哀伤声调，这些揭示了民粹主义反复易变的特点。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被看做在在民粹主义理论中民粹主义者是对权力专注的见证更具有美国特色。在美国政治生活的不同时期，民粹主义的本质已经在许多不同的事件中得以体现，但是惟有这些事件的表现方式没有改变，并且在大部分美国公众中产生了相应的共鸣。

第四章 到人民中去！

俄国民粹主义的教训

1874年夏，俄国自发地爆发了一场男女青年从城市到农村的运动。他们满怀热情与信心，从大学校园走向农村。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著作和告诫给予这些年轻人以鼓舞和激发，使得他们具有了革命的观点并坚信国家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以改变旧的社会秩序。他们进行信仰方面的宣传和教育，但主要是促使农民起来反抗沙皇统治。尤其是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深信，只有农民才具备沿袭传统和开创未来的俄罗斯的伟大智慧。

这些大学生遵循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的告诫，到人民中去，但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个计划以失败而告终。最终，学生们对农民迅速革命的潜力丧失了信心，转向试图以恐怖活动推翻国家政权，但同时他们仍然坚信俄罗斯的未来在于人民的观点。这次运动及其观点被视为1917年达到革命高潮的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前的一个征兆。当然，民粹派的观点，众所周知，是当时众多革命思潮中吸引俄国知识分子的重

民粹主义

要部分。对于我们来说，俄国民粹主义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它是罗曼蒂克式的乡村生活方式和试图在此基础上开展运动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使得它如此显著的原因是农民被外界所推崇——即被一部分精英所推崇。民粹派，他们中的一些人，受沙皇俄国的城市精英所推动，试图在自身之外的世界中寻找一个社会的理想。

俄国民粹主义：民粹派思潮（narodnichestvo） 和民粹派（narodniki）

农民阶级发现自身深受剥削并成为俄国政治讨论中的主要对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Tsar Alexander II）尽管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已经看到必须对农奴制作一些改革。1856年他宣称“与其等农奴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倒不如自上而下地解放农奴”（西顿 - 沃森 Seton. - Watson 1967: 335）。于是，他抢先于 1861 年宣告解放农奴，使他们从地主那儿获得了自由并有权拥有自己的土地。这次改革并没有使农民真正分配到土地，因为他们必须花钱来购买土地的权利由于其贫穷的处境而无法实现，并且土地的“赎金”（Redemption Payment）对于当时靠农业仅仅维持生存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经济负担（派普斯 Pipes 1995, 165 - 8）。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的确反映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那就是，广大的俄国民众手中掌握着国家的未来，但是这种拥有土地与自由，直接对未来的掌控却是短暂的。

第四章 到人民中去！俄国民粹主义的教训

对农奴的解放尽管并不像民粹派所期望的那样使农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但对于民粹派来说，作为一个根本的鼓励的源泉，它的确加强了农民的整体力量。沙皇统治基于封建体制，而封建体制又依赖于地主的管理作用。在解放农奴运动中，取消他们的地位意味着用新的行政机器来取代他们。在当时农民阶级结构的水平上形成了“村社”（obshchina）的组织形式。村社（obshchina）已经深深扎根于俄国农村文化和传统之中。从狭义上说，村社（obshchina）作为农民召集会议作出决定的村共产组织的一部分，是指那些持有土地并相互合作的农民群体。从广义上说，村社（obshchina）是一个理想化的平等的农民共同体。（格兰特 Grant, 1967, 636 - 637）。

村社（obshchina）观念在民粹主义者的思想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将国际上广为传播的革命思潮植根于俄国的社会制度中。民粹主义者认为村社的重要方面是它们是自治的，基于农民的集体所有，并团结在强调平等的共同体的意识之下。这种大多数俄国人的结构不仅仅是组织的一个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看到了农民追求自由的潜力，并不认为农民仅仅是反动落后和保守的。

在俄国，对“民粹主义”这一术语历来有争议和爱争论的历史。引用 narod 这一术语，类似于德语中 volk（人民）这一概念，它产生于 19 世纪 60 年代，作为一种运动的象征，强调它的普及性和民主的根基（派普斯 Pipes 1964, 433）。正是在“到人民中去”的运动之后，民粹主义（narodnichestvo）及民粹主义者（narodniki）的术语才被广泛运用。再后来，这些术语

民粹主义

又被用于掩盖各种不同的观念。理查德·派普斯 (Richard Pipes 1964) 概括了它们的区别, 认为它们被用于两个相区别的意义。首先, 它用来描述群众优于受过教育的精英这一观点并由此形成民众集体行动的理论 (派普斯 Pipes 1964, 458)。在第二种意义上它用于描述坚信俄国有绕过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本来可能性的那些人。后一种理解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中被大大地限定了, 而在其他一些背景下, 前一种理解与民粹主义产生了最大的共鸣。在实践中, 要截然区分这两个不同的意思是很困难的。^①

亚历山大·赫尔岑和俄国民粹主义的根基

俄国民粹主义的主要思想是从俄国知识分子的辩论中产生的。当时, 欧洲和俄国的很多知识分子中弥漫着革命的要求并相信俄国社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而各个不同的思想家及其策略中所描绘的俄国社会所要经历的革命过程都是含混不清的。直到 1917 年 10 月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列宁观在俄国普遍盛行才得以改变。认为俄国社会制度有其特殊性, 特别是俄国农民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很有价值, 这一观点并不新颖也不仅仅局限于革命思潮中。18 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的亲斯拉夫派的

^① 文学作品中的民粹主义, 正确地说, 它十分关注观念的分类和个人。作为我们的目的, 虽然观念或个人相对于俄国民粹主义的类别来说并不是很重要, 但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俄国民粹主义来说却是十分有用的。作为一种多样化的变化的一套观念和人民, 它更普遍地适合于民粹主义。

第四章 到人民中去！俄国民粹主义的教训

运动是一次落后保守的罗曼蒂克式的运动，它强调在俄国需要培育人民意识和复兴精神、宗教革新（文图瑞 Venturi 1960, 13 - 19）。

汲取了亲斯拉夫派的某些观点并将之与一些更为西化的观点联系在一起，亚历山大·赫尔岑从 19 世纪中期的革命思潮中受到重大的影响。他离开俄国，从 1848 年革命的失败中清醒过来，1852 年定居于伦敦，但他还一直保持着对俄国革命思潮的影响力。他通过创办“自由俄国出版社”和出版期刊《钟声（Kolokol）》（The Bell），在英国广泛传播其思想。《钟声》被众多的革命者保守主义者阅读，通过它，赫尔岑将俄国革命思潮与西方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在 19 世纪后半期赫尔岑保持着作为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极其重要的特征和标准。正是在他的文章中，1861 年 11 月他提出了对知识分子的激励。那就是“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那儿有你的位置，从知识的宝座上流放自己，你将成为代表俄国人民的勇士”（引自乌拉姆 Ulam, 1981, 102）。

赫尔岑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语言的表达。通过一些基本原则，他奠定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基础（文图瑞 Venturi 1960, 35；伯林 Berlin 1978, 197 - 208），这些主题主要集中在对自由民主的不信任，对抽象的怀疑，对俄国农民的忠诚以及对需要一个为革命献身的组织的信念。探究这些主题，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是怎样促使行动主义者及其运动与俄国民粹主义联系起来的。显然，当我们将这些原则与革命活动家的经历相联系时，赫尔岑的影响常常并不必然导致与民粹主义相关的各种策略、

民粹主义

活动和观点。

赫尔岑认为政府“并非一种目的，而是一种需要”（引自文图瑞 Venturi 1960, 32）这导致了他对周围所声称的民主理想的不信任。他在欧洲的经历，无疑坚定了对西方民主观的抵触，尽管西方的民主观被议会及中心权威所验证，却甚少与人民相联系。他认为需要通过革命来解放人民，但反对通过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来实现这一目的。

对赫尔岑来说，政治行为远比政治制度要重要得多。贯穿他一生的一个主题便是政治生活并不服务于抽象的原则。意识形态上的抽象在赫尔岑那里被认为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建设意义的（伯林 Berlin 1978, 193）。民粹主义者用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理论、对意识形态、对理性主义的仇视。显然，这对于一个毕生献身于思想研究但却认为实践重于理论的人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在那个位置上赫尔岑做得再好不过了。这里，民粹主义者产生了一个明显的悖论，那就是民粹主义者本来提倡非理论化的行为，但却同时把这种观点理论化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民粹主义者所遇到的困境就是：他们在根本上不信任政客但自身却成了政客。

赫尔岑的主张更多地应归功于其特殊的背景，他认为通过农民，特别是通过将来社会组织的基础——村社，有可能实现俄国社会主义道路和有可能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他将俄国传统的农民村社视为欧洲的贪得无厌的物质享乐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乌拉姆 Ulam, 1998, 36）。俄国农民的吸引力部分地在于村社组织在实践上的有效性。但是赫尔

第四章 到人民中去！俄国民粹主义的教训

岑对农民的信任部分地在于他坚信农民并不像城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那样被现代资本主义和西方的发展所玷污。农民的纯洁性表现在他们的单纯和没有被污染上。民粹主义者常常提出这样的观点——普通人已经被外界和邪恶势力所腐化。通过这一点，很容易看出民粹派眼中的俄国农民及其价值的浪漫化。

赫尔岑在认为需要培养一批献身于人民的革命活动家的思想中表达了对政治行为的信仰。这个主题被那些到人民中去的学生所采纳，但却不仅仅如此。正是这散布于沙皇俄国革命知识阶层的思想赋予他们一个目标和一个他们在激发农民革命作用上的正当理由。

“到人民中去”

两千或三千多年轻知识分子遵循了赫尔岑与人民共存的观点于 1874 年到农村去。^① 他们勤于实践并效仿柴可夫斯基主义者 (Chaikovskists) 和 Dolgushin 及其追随者。The Chaikovskists 是一群规模虽小但是很积极的宣传者，自 1870 年起，他们试图利用宣传的方式鼓动圣彼得堡的工人起来反抗。而且，他们也效仿亚历山大 Dolgushin，此人在 1873 年曾试图使莫斯科城外的农民发动革命。Dolgushin 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寄希望于宣传，在莫斯科城外的一个小乡村出版了一份期刊。他们印刷书籍和小册子，将它们散发到农村。他们试图通过与农民共同劳作而融入

^① 赫尔岑 1870 年死时，并没有看到他的思想遗产所结出的硕果。

民粹主义

到农村社会中，并尽力激起农民对其境况的不满。但他们发现农民似乎毫无反应，甚至有敌意。Dolgushin 的团体很快被当局所觉察，终被逮捕并被判十年的劳役（文图瑞 Venturi 1960, 496 – 501；乌拉姆 Ulam, 1998, 210 – 14）。

民粹派 1874 年“到人民中去”的运动缺乏成文的计划或正式的组织。他们来源于城市知识分子圈子，对政治的运作相对缺乏经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他们散发鼓动革命的小册子，并且只要有农民经过，他们不加分析地与之交谈重新分配土地和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在“到人民中去”的运动中，他们遵循诸如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和彼得·拉弗诺夫（Peter lavrov）等革命活动家和思想家的建议，这些人正在探索一条通过最受压迫和最为广大的人民发动革命的道路。巴枯宁的追随者将农民视为需要政治化和教他们弄清楚他们是如何被压迫的一个整体。拉弗诺夫的追随者把与人民一体、与人民同甘共苦、形成集体的革命意识视为己任。在俄国拥有这样 6 000 万居民其中有 4 800 万农民的土地上（派普斯 Pipes 1995, 144），却如此贫穷，这些看起来更像是革命的策略。

“到人民中去”的运动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发性，也带有半宗教性的虔诚氛围。乌拉姆（Ulam）（1998）将之比作是一次朝圣。Dolgushin 已经看到在宣传中有必要运用宗教性的语言，因为这是打破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社会障碍的一种方式。于是，他在宣传手册里引用了耶稣福音的话语。当学生到了农村，这种口吻弥漫于他们之间。这些积极分子和同时代的人是如何将自身与那些在普通人之间传教的一小群早期基督教徒进

第四章 到人民中去！俄国民粹主义的教训

行比较是很容易识别的。宗教信仰驱动了早期的基督教徒，而对农民的信仰驱动了民粹派。

民粹派的兴奋感很快就被两个遭遇的难题所泯灭。首先，最使其不安的是农民缺乏革命的斗志。民粹派原本设想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是理想主义的具备了革命的成熟条件。但在实践中，他们发现农民是贪婪的、保守的，对学生充满了深深的怀疑。虽然民粹派深信农民被沙皇政权的压迫，但在与农民的相处中他们却发现农民对沙皇怀有深深的忠诚。^① 农民和学生之间的隔阂削弱了他们的说服力。由于过去并不常常干体力活和缺乏实践经验，民粹派发现与农民相处并非易事，要得到农民的信赖也很不容易。

民粹派所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他们所要推翻的政权也开始镇压他们，在 1873 年到 1877 年之间沙皇逮捕了 1 611 个成员，在 1877 年和 1878 年的两次审判中达到高潮（西顿 - 沃森 Seton. - Watson 1967, 422）。有时，正是农民自身将这些理想化的激进分子报告给当局，这使得当局的反应越来越猛烈。1874 年的夏天，显示了这群积极分子所能做的一切，更显示了农民所不能做的一切。

从人民到恐怖分子

民粹主义者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农民身上转移到了暴力夺取

^① 沙皇地位的问题对农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问题，而且当时所出现的一些革命理论家甚至认为不改变沙皇的地位也可能会发生革命。

民粹主义

国家政权上。如果农民不足以激发起来进行革命，那么袭击国家政权作为农民反抗压制的一种手段，就是必要的。民粹主义者试图寻找新的策略进行革命，以此来缓和对农民的失望情绪（沃特曼 Wortman 1967，189）。这种转变即从宣传转向恐怖活动。尽管在理论上，这些激进分子仍致力于对农民的教化以及与农民共同工作，但在实践上，他们更倾向于采取特别的暴力行为。

采取恐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严密的组织，这主要是由马克·纳滕森（Mark Natanson）来提供。1876年至1878年，他发展了这个组织，后来成为自称是“土地与自由”组织的第二化身并成为暴力反抗国家政权的一个工具。^①与“到人民中去”的运动相比较，“土地与自由”（*Zemlya i Volya*）更加集权和组织性更强。这一组织宣称将土地赋予人民，打碎国家机器，推翻沙皇政权，保留村社作为新社会秩序的基础（文图瑞 Venturi 1960，573-4）。甚至，在民粹主义者进行谋杀和策划爆炸的同时，他们仍试图将其行为理论化。暴力成为一种具体化的尝试并远离了抽象。不同于早期知识分子运动，而同时却与农民的性质相吻合（瓦利克 Walicki 1969，96）。

“193 审判”对“到人民中去”运动中的革命宣传进行指控，于 1878 年结束，最终仅 40 人被判为有罪，紧接着又是一次谋杀尝试，这次谋杀是由薇拉·佐苏丽琪（Vera Zasulich）进

^① 第一次“土地和自由”运动是一次大约 1 000 人参与的小规模秘密阴谋活动，它宣称给予农民土地和自由。它 1863 年失败。

第四章 到人民中去！俄国民粹主义的教训

行的，她也是“到人民中去”运动中的一位成员，去行刺圣彼得堡一位不受欢迎的官员，尽管失败了，但审判的结果却转向对这位官员进行评定。佐苏丽琪（Zasulich）被陪审团宣布无罪，尽管她在近距离射程内射中了这位政府官员。这些事件使得大量的恐怖活动的策略合法化，这好像是通过法庭对这些极端分子的审判为恐怖活动提供了一种社会支持（乌拉姆 Ulam 1998, 265, 274）。

“土地和自由”组织继续致力于恐怖斗争，以刺杀政治人物为标志。由此，紧张气氛升级。一方面是有些人为了信守民粹派的观点，认为应远离恐怖活动。而另一方面一些人则坚持继续恐怖活动并最终要行刺沙皇。因此，1879年“土地和自由”发生分裂，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People's Will”（人民意志）（Narodnaya Volya），它同样从事恐怖斗争。它作为一种更广泛的政治斗争，旨在夺取政权。它宣布了沙皇的死刑，并以此为目的进行投弹爆炸。在进行了多次的尝试之后，1881年他们成功了。这标志着这次运动的结束，因为新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继位，运动的领袖被逮捕、定罪、处死。

当时，“People's Will”（人民意志）组织刺杀了沙皇，但他们与民粹主义的联系是零碎的。在某些方面上，那些“土地与自由”组织中反对把政治策略与恐怖联系，更倾向于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更接近于赫尔岑的遗念——有权利在人民之中进行宣传却反对进入政治机构。他们团结在“Black Repartition（黑色的再分裂）”（Chernyi Peredel）的名义之下，但他们被视为是退回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失败人物，并非

民粹主义

是代表革命的力量（瓦利克 Walicki 1980, 233）。当然，“People's Will”（人民意志）的激进分子仍宣称他们是代表人民的，并以在村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但是他们坚持的策略，提出的理念，名义上与人民的联系说明了这个高度集权的恐怖分子组织已经大大偏离了俄国民粹主义的理念。民粹派的观点和经验塑造了他们，但他们在斗争中却不再坚持民粹主义的观点。

把俄国的案例从对民粹主义的思考中略去是有诱惑力的，因为作为一种精英分子运动，它与其它地方的民粹主义显得格格不入。一些学者提出了排斥的更进一步理由，他们声称将单词 narodniki（民粹派）译为 populist（民粹主义者）是根本不正确的，因此与北美土地所有权的激进主义的比较是勉强的和做作的（奥尔科克 Allcock 1971, 372）。但采取这种做法可能是不明智的。无论翻译的问题是什么，显然，在俄国的事例中，民粹主义者是在与众不同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关于 Narodniki（民粹派），因为其特殊环境和随后的历史，是有可能轻易地将其要素分离出来的，尽管这些要素与其它地方的民粹主义的另外一些背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如果仔细观察，俄国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普通要素的有力的启发者。

即使我们接受将民粹派（narodniki）纳入民粹主义者（populist）的范畴，但这并没有把我们从阐释俄国事例的所有困难中解放出来。要划清楚民粹派或民粹主义是如何构成的界限是决不可能的。我并不主要关注“到人民中去”的运动，因为我将它视为俄国民粹主义的概括（sum total）。事实上，如果

第四章 到人民中去！俄国民粹主义的教训

它是一个总结，它就构成了一个相当微弱的总量：这次运动是小范围的，短暂的，很不成功的。“到人民中去”的运动的的确标志着俄国民粹主义的最高成就，或者，正如文图瑞（Venturi）（1960，470）所说，它是一次“真正的运动的春天”。在赫尔岑的理论的主题中，以及在后来转向的恐怖主义中，我们认识它（“到人民中去”的运动）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同样”的斗争的延续，并且由于 1874 年的事件它是完全可以充分理解的，正如根据后来他们转向恐怖活动，知识分子的革命爱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样。

准确地阐释民粹主义构成的主要困难在于当时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当然，我们对沙皇俄国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被我们对 1917 年发动起义推翻了国家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的认识所调和。把二者放在一起，这意味着它至少是诱使人们将当时的俄国思潮仅仅当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先驱。在这一过程中，过分简约化丧失了俄国民粹主义的本质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重要特征。最终胜利了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只能从俄国革命思潮的基本性质中去理解。对部分民粹主义，独特的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以及对集体的价值和村社结构的强调引起了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鸣。同样，民粹主义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主义革命观的复杂体系的一部分。在俄国民粹主义不可避免地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情况下，民粹主义的一般的本性得到了验证。

广泛的世界性的政治观点与理解民粹主义绝不可能是无关的。在欧洲政治思潮的背景中，民主是推动其它地方知识分

民粹主义

子和革命的一个驱动力。与其他民主主义者一样关注推翻专制统治，但是民粹主义依然对自由选择的代议制或自由民主充满敌意。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赫尔岑的对这种民主形式的敌意被民粹派所采纳吸收，并且在民粹派那里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单纯地将它作为一种俄国的现象来理解，将它们视作是对代议制政治的反对，可能是讲不通的，因为他们并不反对代议制而是反对沙皇的专制统治。如果我们从俄国之外的观点来理解的话，那么就可以将民粹主义部分地视为它试图构建一种开放式的自由的代议制政治的思想和结构的政治。事实上，试图解释俄国后来的命运而参照来自西欧的观点，这是很奇怪的做法，包括马克思主义被改变成了俄国的形式，因此我们同样地必须更为广泛地来看待民粹主义者。^①

在对自由主义改革者的民主观的排斥中，民粹派同样也表达了在赫尔岑思想中很明显的对政治的深深的仇视。但是，民粹主义者不愿意参与政治通常意味着他们以随意的和改革者的态度来参与传统政治，民粹派的反政治对他们意味着情愿采用活生生的、教化的、煽动的方式而不是基于坚持宪法权利的政治活动的参与方式来构建一个全新的行为模式。转向恐怖活动，俄国革命者将民粹主义推向极端，否则民粹主义者就不会

^① 沃利克（1969；1980）认为如果不参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俄国民粹主义案例。这种断言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增强了民粹主义者探索俄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还是避开了资本主义的罪恶的争论作为主题。这种假设认为，俄国民粹主义，在派普斯看来，是在狭义上即依据它的政治经济情况来界定的，而不是在广义上所进行的界定。

在反政治的活动中尽力的表现出对政治的厌恶之情。

对俄国民粹主义者来说，俄国农村和农民是他们的中心。对俄国农村生活、农民的习俗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及组织形式的理想化形成了他们关于什么是构成民粹主义的中心的明确和详细的概念。在对村社的颂扬中，中心被描绘为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组织结构甚至是一种社区的精神。

正是因为民粹派自身并不是人民，所以我们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他们喜爱意识形态的目的。在另一些情况下，民粹主义运动是他们所寻求代表的人民所推动的。在人民需要从外界进行有效动员的地方是很容易辨识中心的边界的。作为俄国民粹主义是由一个知识分子阶层所掀起和推动的，根据定义，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与中心相分离。而将中心看做一个明确的概念是有可能的。在其他一些民粹主义运动或观点中，中心是模糊的。通过观察俄国民粹派，使得我们看到了最清楚地关于中心的说法。

对寻找一条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强调，可以用肯定或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两种观点都是民粹主义的。通过农民的固有智慧和潜力来实现俄国独特的社会主义路线的观点表明了对这个特殊中心的占据者的信任。它同样表明了对外部影响力的排斥。赫尔岑对西方议会制度和革命理论的仇视，这已被马克思作为例证，并且也是民粹主义者对中心以外都怀有敌意的证实。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排外能够被看做是一种对由他们自身的观点而形成的观点的排斥。

“到人民中去”的运动是短暂和不成功的。运动的失败不

民粹主义

能归因于民粹主义者对组织人民运动的困难性，况且他们也没有走那么远。他们的观点没有成为一种人民的运动，而只是作为一种只有相对少数的支持者的意识形态而保留下来。它并没有成为人民的大众性的运动，这是因为它崇尚主要来源于不能接受人民的现实性，它脱离了人民现实的根基。

俄国民粹主义的易变性使得它寻求与农民的联系，但是它很快停止了短暂的真正站在人民的一边的立场，因为这意味着这将失去民粹主义对革命的承诺。在极端的民粹主义者是屈从于人民的意愿还是倒向暴力革命上，民粹派最终选择了后者。

真正意义上民粹主义是很少赞同革命的。它倾向于倡导改革却不赞同完全取代政权。从俄国民粹派希望给俄国带来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是革命的。从他们是导致后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部分背景的意义来说，他们也是革命的。一方面，说俄国民粹主义者不是一般的革命者的这一评论我们是满意的；另一方面，是什么使得民粹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又是什么使得他们与当时其他的革命潮流截然区分开来，是他们的信念即俄国农民的经验 and 结构中存在着真正的革命潜力，这也是十分明显的。农民，对于民粹主义者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为追求革命而被动员的目标，它远远不止这些。民粹主义的革命观是一个变化的革命观，但这种变化有的是落后的。民粹主义者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政权，这个政权的社会秩序容许完全实现农民的潜力，并且这种潜力在俄国历史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来了。

俄国 narodnichestvo（民粹派思潮）的案例与其他民粹主义

第四章 到人民中去！俄国民粹主义的教训

尴尬地共存。民粹派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承诺将其他大多数民粹主义中的微弱的激进主义带到了革命的极端上。对普通农民生活的崇尚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种敬仰并不是起源于农民自身，因此不应与自利相混淆。民粹派的理想主义使得我们瞥见了理论化的民粹主义中潜在地矛盾的观点看起来像什么样。但所有理论都不能使得他们克服在动员农民的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动员民众所取得的伟大效果和能力方面使他们显得逊色多了。

第五章 拉丁美洲民粹主义 政治中的领导

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政治表明了领导的重要性，与其他地区的民粹主义相比，这可能是这一地区政治的一贯特点。民粹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是一种对拉丁美洲所经历的一系列政权和政治活动的部分描述。第二，它也常常是对那些处于政权中心的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和经历的描述。在第一个方面的含义中，拉丁美洲民粹主义导致了許多相关的民粹主义的定义（见第2章），在那里，民粹主义成了分析拉丁美洲政治的通用概念的共同因素。在第二个方面的含义中，民粹主义被个人化了，其中最重要的是阿根廷（Argentina）的胡安·庇隆（Juan Peron）。

以庇隆（Juan Peron）作为典型来考察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政治，我们就会得到一次绝好的机会来理解观察作为一种政权的民粹主义所发生的情况。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民粹主义运动的“总原则”中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体是比较罕见的，也因为民粹主义在使自身政治实践、组织和政体合法化时存在着

真正的困难。民粹主义善变的本性意味着有一些特征明显是特定背景、时间和地点的产物。20 世纪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艰难历程表明人们希望通过对领导的重视来解决社会的动荡问题。阿根廷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还远远不能解释再分配政策以及社会公正的思想。我们需要记住这些相关因素，但不应该排除拉丁美洲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理解普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方法的有用性。

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

把民粹主义视为拉丁美洲政治的一个特点通常意味着强调本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强调拉丁美洲经济的高度依赖性以及经济危机的特殊性（例子见 1965 年底特律的经济危机）。因此，对詹姆斯·梅勒（James Malloy 1977, 9）来说，民粹主义是对一个全面性危机的特定的地区性回应，这个危机出现于一个被推迟了的依附性发展运动的最终阶段。当考察“第三世界”（Third World）的民粹主义的时候，把民粹主义的出现与经济发展的本质联系起来是一件平常的事。因此，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有着追求民族经济独立、打破半封建的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公正的目标。但是，因为民粹主义倾向于依赖领导、中央集权、金钱以及报酬，它通常以扩张而不是以重塑政治的本质而告终（Malloy 1977, 11 - 15）。以这种相关背景为中心来理解民粹主义有两种相关的观点：一种认为民粹主义（特别是民粹主义者的选举成功）有时产生于特定的经济危机；

民粹主义

而另一种认为民粹主义不能提供社会基本结构变化的信息，因为它是激进的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

在分析拉丁美洲民粹主义时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在本质上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把民粹主义作为全球经济中拉丁美洲经济的特殊地位的结果方面，他们是明确的。在判断全球经济中这种结构性地位何时会产生民粹主义方面他们也是独特的。这些分析在解释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运动和政权方面可能成果累累，但他们在如何看待这些政权和运动与其他地方的民粹主义的联系方面却没有多大的用处。

当盖特利奥·瓦尔加斯（Getulio Vargas）1930年发动革命时，在20世纪20年代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地区（Rio de Janeiro）一些政治家为了追逐权力，在地方城市政治中采取了通过培养被排斥者作为新的投票者，而在地方层面上建立新的联盟，并开展整顿和改革政府运动的策略。他把很多这样的人招进了他的政府，但是，他建立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强大的独裁政权。瓦尔加斯（Vargas）在1945年被军事政变所推翻。但是，当他1950年再次竞选时，他全心全意地采用了民粹主义者的观点。他强调，他只是勉强地重返政治，因为有人需要他，同时他把自己刻画为“借助人民的力量”而回到政治的形象（杜勒斯 Dulles 1967；康尼夫 Conniff 1999，48）。这是勉强参与政治的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所惯用的声明，因为这是一种普遍地象征性地体现了民粹主义者对待政治的矛盾心态，而同时又实际参与政治的方式。瓦尔加斯（Vargas）赢得了选举，他承诺控制物价、增加工资并呼吁工人们帮助他与造成生活高费用的剥削者作斗

争（杜勒斯 Dulles 1967, 306）。一上任，他就履行诺言通过实行重工业国有化、关注福利和社会改革来实现经济计划、公平分配财富。但是，这些却被通货膨胀的失控的经济状况所击败。到 1954 年，一次军事政变导致了瓦尔加斯（Vargas）的自杀。

瓦尔加斯（Vargas）表明了民粹主义是怎样开始渗入到巴西政治中去的。他使权力集中化和个人化。作为 1930 到 1945 年期间的总统，他很少关注民主制度，并且颁布了一部新宪法以赋予他独裁的权力。到 1950 年他重返政治时，他寻求通过社会改革政策并利用民主程序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的方法来创立新的支持模式。瓦尔加斯（Vargas）缺乏的是伟大的个人魅力（莱文 Levine 1970, 13）。把新的选举联盟与社会改革政策、高度重视领导结合起来，在民粹主义成为拉丁美洲传统的过程中，瓦尔加斯（Vargas）是一位最初的民粹主义者。这种结合通过增加具有真正个人魅力的领导者的特性而显得更有威力，这是使庇隆一生在邻国阿根廷中具有名望的一个因素。

胡安·庇隆（Juan Peron） 和庇隆主义（Peronism）

20 世纪 40 年代的阿根廷濒临经济危机的边缘。当时是一个保守的政府，它产生于 1930 年的军事政变中所建立的军人政权，并通过选举骗局而维持统治。它通过扩大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成功地度过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但是，20 世纪

4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阿根廷与美国的关系危机出现了新的困难（罗克 Rock 1983，214 - 15）。1943年6月，一群包括胡安·庇隆（Juan Peron）在内的军官夺取了政府的权力。

很快就表明庇隆（Juan Peron）是一个强有力的精明的政治操作者。他在这种情形下涉足政治决不是自发的，因为在他早年时期就有了雄心和实现雄心的策略。他开始于并不起眼的军事生涯，并且在1930年的军事政变中扮演着不起眼的角色。在随后的统治中，对获得公众支持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他心里增强了。他在部队工作期间，1939年曾到过意大利。他看到了墨索里尼（Mussolini）的统治是如何证明工人运动的力量（佩奇 Page 1983，66）。到1943年他和他的同事军官们获取权力时，庇隆（Juan Peron）已经见过了许多通过武力获取权力的可能的事，并且认识到了通过积聚公众支持和寻求把劳工运动作为支持的潜在来源以维持统治的必要性。在政变之前，他已经在秘密组织他的同僚方面发挥了作用（克拉斯威勒 Crassweller 1987，98）。

庇隆（Juan Peron）与将要成为他第二个妻子的妇女——玛丽亚·伊娃·杜瓦蒂（埃维塔）（Maria Eva Duarte）一起，获得了工会和穷人的支持，使得他能够出任劳动与社会保障秘书处秘书长一职。他通过增加工资、冻结租金、承认工会的政策以获取支持。为了巩固他在政府中的地位，到1945年，他又获得了国防部长、战后委员会主任和副总统的职位。但是，这却导致他和政府中其他人的冲突。

随着对军人政权的敌对情绪的上升，庇隆军队中的同僚最终在 1945 年 10 月把他投入了监狱，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劳工抗议。这导致了 10 月 17 日民众在德梅奥广场（Plaza de Mayo）的大集会，在那里，30 万人高声呼喊要求释放庇隆，以确保他神话般的地位。当人们得知他已被释放时才满意而平静地解散了（佩奇 Page 1983, 128 - 33）。庇隆在阳台上向呼喊他名字并热烈欢呼他出现的民众的挥手致意的情景成为了他在后来的统治中作为他与人民的直接联系以及他的真正的民众的支持象征的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

第二年举行了自由选举，庇隆当选为总统。他宣布了一个工业化发展的五年计划。通过埃维塔（Evita）控制下的慈善基金对工业家施加压力，筹集资金分发给穷人，通过庇隆再分配和福利政策的庞大计划的执行，夫妇俩不仅巩固了他们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而且获得了民众的真正支持并成为文化偶像。庇隆通过创立“惟一革命党”（the Single Party of the Revolution）（后来成为庇隆党）（Peronist Party），使劳工秘书处（Secretariat Labour）成为国家集体谈判的惟一来源而巩固了他的政党基础。他通过运用在立法机关的多数派而成功地弹劾并罢免了非庇隆主义的高等法院法官而保证了最高法院不会阻挠他的政策。

庇隆利用他的政策赢得了工会的支持，但也付出了代价。代价之一是他不能容忍工会的独立，因为这会破坏劳工和他的政府之间的联系。因此，他确保只有政府承认具有合法地位的那些工会才能参与谈判，每个部门只有一个工会被认可（佩奇

民粹主义

Page 1983, 176)。另一个代价是，他几乎没有改变阿根廷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模式，尽管在庇隆统治下富人由于税收增长而使他们受到了损失，但他们可免于财产充公。

为了维护他的政治权力，1948年，庇隆开始改变宪法。这考虑到了总统（也就是庇隆）的再度选举，从而为平息异议奠定了基础。通过阻止反对者获取广播和报纸以及求助于《不敬法》而使冒犯履行公务的政府官员的尊严的行为成为非法，他从根本上压制言论自由（佩奇 Page 1983, 209）。在对待政党方面，庇隆表现出了民粹主义者式的对政党的不信任。他把他的政党变成了本质上为其服务的工具，一有机会就宣布反对党违法。

庇隆的政权围绕着三个振奋的口号：社会公正、经济自由和政治独立而变得具体化。与此同时，它们又是对他的政策的既模糊又准确的表达。庇隆开始用“justicialismo”这一概念来表述其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很明显，这个概念是在他上台三年后出现的，与其说这个概念是指导性的规则，还不如说是他一直在凭借本能表现出来的理性化的结果（克拉斯威勒 Crasswell 1987, 227）。社会公正的主张代表他试图改善城市工人阶级的境况，并给予他们权利。他把这些融进了宪法之中。Justicialismo 把重点放在团结和灵活性上，因此，这允许庇隆有很大的空间来应用这一概念（佩奇 Page 1983, 220）。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概念。

从积极意义上说，经济自由体现的是容许所有人都有一个美好生活的思想。这意味着它与工人有关，庇隆通过增加工资

和增加假日来实施这一政策。但从消极意义上说，经济自由标示着国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形式。因此，典型的民粹主义者就是那些正在被关注的人，这就意味着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常常会对他们产生依赖。

政治独立在“第三世界”（Third Position）的理论中体现出来，“第三世界”（Third Position）是庇隆过去常常用来阐述他的外交政策的概念。理论上，这意味着它是居于冷战两边之间的“第三世界”（Third Position）。实际上，它等于试图通过把庇隆主义刻画成反对共产主义的壁垒来安慰美国，与此同时，又通过谴责资本主义的无人性的行为来力求获得苏联的支持。“第三世界”（Third Position）也是 justicialismo 的提倡的灵活性和务实性所倡导的另一结果（克拉斯威勒 Grassweller 1987, 228）。再次，“第三世界”（Third Position）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所求助的一个意指它所达到的而实际上没有达到目标的一个概念。再次，典型的民粹主义者所提倡的这个核心概念——“第三世界”（Third Position）是想用它来表示他们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但实际上就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如这个概念本身所隐含的丰富。

庇隆常常思考如何通过他的三个政治主张的实施来达到他的目标。这是政治指挥者的想法。政治被看做是一个需要有人指导并与人民合作的动态过程。在指挥者的概念中，可能会看出庇隆是如何看待领导的。他从军队里获得这样的想法，这些想法强调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特殊关系。领导者的任务是安顿民众，向他们灌输各种信条，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使他成

民粹主义

为一个具有权利与义务意识的能够追随领导者的团体，因此，领导者的任务就是使民众成为顺从的被领导者。对佩奇（Page）（1983，223）来说，这一概念“揭示”了庇隆政治手段的非道德基础，成功的就是好的，成功证明了领导者所担负的重任。这一方面表明了庇隆对公众的态度（本质上是顺从的），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他对作为制度的政党和国会（他的立法机关）敌对立场，这只会扭曲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克拉斯威勒 Crassweller 1987，230）。

埃维塔（Evita）死于 1952 年。1955 年，庇隆被反对派所罢黜，并过着流放生活。但在 1973 年 3 月在他的政党成功地推举他作为总统候选人之后，1973 年 9 月他最终再次当选为总统。这标志着军人集团统治的终结，并使庇隆能够重返阿根廷并作为总统候选人。他的政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反对军人统治者（在第一次选举中）和为国家统一而奋斗的动员能力（史密斯 Smith 1983）。重回政坛之后，他又恢复了提高工资的政策，尽管工资仍处于中间水平。庇隆 1974 年死于心脏病，他重返政坛的时间是短暂的。

作为民粹主义的庇隆主义（Peronism）

庇隆主义（Peronism）是建立在卡里斯马式领导、社会改革议程、跨阶级联盟支持以及倾向于集权主义基础之上的。对于庇隆自己阐述的庇隆主义，佩奇宣称：

庇隆主义在行动上是人道主义……一种社会经济的规则，在这种规则下我们的财富……可以在那些为积累财富而做出贡献的人当中进行公平分配……人们并不能真正理解庇隆主义，甚至也不能清楚地谈论它，一些人可以体会到它，而另一些则可以否定它，因此庇隆主义是一个感觉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可以被思考的问题（引自佩奇 Quoted in Page 1983, 219）。

庇隆的统治因其意识形态而获得了民众的真正支持，但这常常要依赖于强力来维持。

庇隆的个人品质以及获得尊重的能力是他能在选举中获取成功的主要工具。同样重要的是他通过再分配政策建立跨阶级联盟以赢得城市工人阶级支持。但同样他还依赖于农村穷人的选票。他有组织地不断集中权力和利用权力。“惟一的庇隆党”、“惟一的慈善基金会”（由埃维塔 Evita 运作）的创立，他对最高法院的态度、以及独立工会对立的及时，说明他不担心利用其地位来提升个人权力和地位。庇隆的民粹主义导致了以政治弱势群体的名义和支持为基础的政治上的卡里斯马式的领导，但是，强烈的集权主义趋势常常加强了这种“人民”统治。

庇隆在阿根廷的统治时期使我们可以一观作为一种政体的实践中心民粹主义政治。领导的角色和作用在选举庇隆执掌政权时把他的个性深深地嵌入了民粹主义者的政体观念之中。领导也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来避开维持真正大规模民粹主义

抗议现政权的运动的困难，这造成了它自身的紧张。庇隆的吸引力部分基于他作为人民的化身，他建立选举联盟的实践正是这种能力的见证。那种紧张来源于他的独裁倾向，正如他作为领导者的自我神话般的地位是因为这与他作为一个民主领导者的地位不相符。庇隆的经历说明，民粹主义求助于卡里斯马式的领导作为民主制度运行的一种方式，而同时又对一般意义上的代表实践怀有根本的不安。

求助于危机感是庇隆得以平步青云的关键，这也加强了领导的重要性。在动荡的时代，当他创制政策以求稳定时，便利用经济和政治危机来证明其政策的正当性。危机也证明了他作为政权核心的个人地位的正当性。正如在他的偶像中，正是他的个人品质为人民提供了统一和稳定的惟一希望。

在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政策通常是改革，而非革命。他们倾向于改善现实的状况。在创建选举基础方面，庇隆和瓦尔加斯（Vargas）寻求劳工的支持以扩展他们现有的支持范围。在集中他们所控制的政府权力方面，他们把政治体系现存的集权原则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以庇隆的情况来看，justicialismo（正义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是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条中间路线的审慎选择。从民粹主义的支持者而不是领导者的前景来看，重视领导，特别是个人化的卡里斯马式的领导，正说明他们期望改变，而不是革命。这一体系对民族主义者来说不需要作根本性的改变，但它所需要的一切，特别是在严重危机之时，就是能够体现人民智慧的伟大领袖。因此，领导就成为了革命的替代品。

第六章 宣扬民粹主义：加拿大的“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

19 世纪美国民粹主义中的农民激进主义在 20 世纪 30 年代加拿大的艾伯塔省（Alberta）引起了极大反响。由于政党系统内部的分裂以及广为蔓延的不满情绪而导致的激进的反对现行的经济准则的农民运动为“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动力，这使艾伯塔省（Alberta）成为有影响力的地方，并对该时期的加拿大国家政治产生了微弱的影响。与人民党不同，“社会信用党”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强有力的领导。庇隆在战后的阿根廷的领导的作用就是通过这种途径产生影响的。在思想来源上，它是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一个回应，因为这一思想来自外部，并用于试图动员和使群众运动合法化。在“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的历史中，在艾伯塔省（Alberta）曾经有过“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执掌政府权力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但实际上在它的思想中却除去了民粹主义。

“社会信用党” (Social Credit) 的兴起

“社会信用”哲学是一套改善以个人权利伦理哲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滞胀的影响的经济和伦理理论体系。这一理论首先由苏格兰工程师克利福德·道格拉斯 (Clifford Douglas) 在 20 世纪初提出的，他解释了机器时代在金融系统的影响下大量存在的贫困现象。^① 尽管不是反资本主义的，但这一理论认为，只要国家控制金融系统，实行企业国有化就是可行的。国家要确定公平的物价，将财富分配给全国的每个人，这要基于对国家财富的确切调查了解，并且为国民提供基本的需求 (欧文 Irving 1959, 5-6)。

道格拉斯 (Clifford Douglas) 的理论指控现存的民主政党体系是一个“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关于方法的无益的争论”的机制 (Douglas quoted in Macpherson 1962, 127)，因而偏离了经济系统目标的真正选择。这涉及到一种政治理论，因为“社会信用”的履行应该就政策的广泛界限求教于人民，专家应该设计执行政策的机制 (麦克弗森 Macpherson 1962, 128)。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不是民粹主义者明确地把权力赋予精英、受过教育的精英，而实际上却正是民粹主义者，并忽略了政治家。因此，当政治家进行选举并制定加拿大社会信用议程时，道格

^① 对道格拉斯理论的完整解释，参见麦克弗森 Macpherson (1962)，特别是第 4、5、7 章。

第六章 宣扬民粹主义：加拿大的“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

拉斯（Clifford Douglas）的理论就产生了特别的困难。

在曾经当过教师和传教士的威廉·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的领导下，社会信用哲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在加拿大艾伯塔省（Alberta）实行。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借助广播进行演讲，他相当强的演讲能力，传播了大量“社会信用”的信息，并从 1933 年开始，在卡尔加里（Calgary）组建研究团体和公众集会（欧文 Irving 1959, 51 - 2, 58）。他的宗教演说与对萧条的评论相结合，使他鼓吹的社会信用受到了真正的欢迎。他利用大众化的工具传递社会信用的信息。比如，广播“火星人”来探寻艾伯塔省（Alberta）的情况，并由于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的观点而受到启迪。在他的演讲中，他设计了一种可见的朴实风格，他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以此象征当选的政治家处理危机的努力（欧文 Irving 1959, 339）。

当世俗的领导者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当分配的方针在那些把社会信用当做要求联合行动的人和那些认为社会信用在艾伯塔省（Alberta）可行的人之间推行时，冲突在运动内部增加了。倡导在艾伯塔省（Alberta）作为社会信用的讲坛的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社会信用”运动的领袖，被短暂地篡夺了权力。新的领导人试图通过道格拉斯（Clifford Douglas）到艾伯塔（Alberta）地区演讲达到羞辱和闲置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的目的。道格拉斯对社会信用应当尽可能地在更广的范围内得以实现满腔热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道格拉斯（Clifford Douglas）自身的后果却反而增强了阿伯哈特

民粹主义

(William Aberhart) 在运动中的重要性，而道格拉斯 (Clifford Douglas) 却像一个呆笨的或有点像一个为别人呐喊的演说者。两人进行了一场辩论。后来，新领导者辞职了，阿伯哈特 (William Aberhart) 在公众的呼吁下，重新获得了运动的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结果，阿伯哈特 (William Aberhart) 在艾伯塔 (Alberta) 地区对于道格拉斯 (Clifford Douglas) 的社会信用思想比道格拉斯 (Clifford Douglas) 自己具有更大的权威。

阿伯哈特 (William Aberhart) 于 1934 年发起了这次运动，但本质上却作为一个压力运动而持续存在。他得益于占支配地位的政党环境对这一运动的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信用”运动时期的占支配地位的政党是艾伯塔农民联盟 (the United Farmers of Alberta) (UFA)，这一政党自从 1921 年以来以反对现行的政党体制而在艾伯塔 (Alberta) 地区日益强大起来。由于这时卷入丑闻，它在支持者中的地位降低，这意味着“社会信用党” (Social Credit) 可在与艾伯塔农民联盟 (the United Farmers of Alberta) 的对比中获胜。“社会信用”是一种土地所有权现象，因此，代表农民的主要论坛的瓦解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更直接地进入政治，阿伯哈特 (William Aberhart) 在广播中指出，有很多诚实的人没有参与政治，是因为政治被看做被政治机器所控制。他呼吁听众写匿名信，告诉他在他们地区有多少诚实的人，他们的人品的详细情况。结果收集了 400 人的情况，但没有公布，其中有许多人是下一次选举的候选人

第六章 宣扬民粹主义：加拿大的“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

（欧文 Irvinag 1995，112）。从那以后，1935 年 1 月，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试图说服艾伯塔农民联盟（the United Farmers of Alberta）采纳社会信用作为他们省方案的一部分，但没有成功。

在 1935 年选举中，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领导的运动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进入了政治。他期望运动不要变为一个政党，因为他想让它作为一个十字军运动，不被政党中普遍存在的腐败和背叛所玷污。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转换，他发起了一场民意调查和召开一系列会议（欧文 Ivring 1959，123 - 9）。尽管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明显地控制了运动的命运，但是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期望看到运动自然转变为一个由于来自下面的压力而形成的选举力量。有人指责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是一个独裁者。他回答说：“我受基督精神的控制，我只追求使饥饿的人有衣穿、有饭吃、有屋住。如果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独裁的话，那么我就是”（欧文 Ivring 1959，136）。

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的领导成果是壮观的。在 1935 年的选举中，社会信用党获得了 63 个席位中的 56 个，而艾伯塔农民联盟（the United Farmers of Alberta）则一个也没有。一旦上台执政，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就遇到了很大困难，他明显不愿推行社会信用计划以及采取强力控制金融状况。他绕过立法机关，利用广播直接吸引公众以代替他自己运动中的成员的支持。由于他的运动抗议的压力，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并有效地获得了巨大权

民粹主义

力，立法机关和“社会信用”运动被有效地排斥在决策之外。随着二战的爆发，环境改变了，“社会信用”运动被宽恕没有从联邦政府中有效地脱离出来（麦克弗森 Macpherson 1962, 202）。1943 年，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去世了。战后，“社会信用”把注意力转向了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到 1948 年，“社会信用委员会”被撤消了。“社会信用”直到 1971 年在艾伯塔省还在执政，而一旦掌权，它就迅速从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首先提倡的民粹主义的政策中偏离开去。

作为民粹主义的“社会信用党”

20 世纪 30 年代艾伯塔地区的“社会信用”运动包含了民粹主义的主要成分：它剔除反对者，倡导激进改革（仅次于革命的），支持国家干预，尊重领导。由于反对金融和财政精英，它形成了一套社会和经济改革、把平等主义和国家的强力作用结合起来的哲学。“社会信用”运动建立在主要依靠强有力的个性化的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领导的基础上。在早期，它也实行了有力的教育战略，这一战略使人回想起在美国早期民粹主义运动舞台上联盟演说者所扮演的角色。有点奇怪的是，寻求从人民中吸取智慧的民粹主义经常把大量努力放在启迪这些人的智慧上。然而，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对于学习小组的培养对建立他的政治运动的基础起了作用。运动的成功和执政在权力和制宪方面给“社会信用”带来了麻烦。作为一个反对党，它的要求很强烈，但是，一旦阿伯哈特

第六章 宣扬民粹主义：加拿大的“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

（William Aberhart）控制了艾伯塔省以后，却限制了它维持自身发展的程度。

作为一个与其他民粹主义运动相比较的事例，“社会信用”运动在思想来源方面是不寻常的。民粹主义，因为它寻求在中心地区以及它的自然的支持者的人民中扎根，因而倾向于与从外部产生的思想形成敌对立场。本土化工的思想和被民粹主义者具体化的思想两者的重要性在俄国民粹主义的案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决不仅限于这些。有点奇怪的是，道格拉斯的观点，即一个苏格兰人的思想主导了这一时期艾伯塔省的运动和政治。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的领导。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作为一个领导者的作用近似于社会信用思想的解释者。作为一个运动力量的道格拉斯的消失说明，正是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倡导道格拉斯（Clifford Douglas）的思想才给予了“社会信用”运动的支持者以思想本身一样的巨大效力。

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在“社会信用”运动中的地位以及他作为运动的发起核心，正如阿根廷的庇隆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洞察在民粹主义运动中另一种领导类型的机会。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领导艺术的很明显的一点是，他阐明了在民粹主义运动中可能出现的半宗教的特性。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宗教教育的背景对于他运用宗教发动运动的技巧来说决不是偶然的。他自己转向“社会信用”的思想正像一个宗教的转变一样也具有教育意义，这在于它来得很突然，并且改变了生活。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随后所倡导的

民粹主义

“社会信用”运动的语调、语言和理念与宗教信仰产生了共鸣。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的追随者把他当做“社会信用”运动思想的惟一的洞察者，当做有办法进入神秘知识殿堂的人。他担任了教师和思想的解释者的重任。强有力的半宗教性的暗示说明了民粹主义者竟然会提倡用非政治的思想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危机的。

作为创立一个委员会来推行其政策的典型，“社会信用”运动的思想与一般的政治是敌对的，并明显排斥代议制政治。发明一种技术方法来解决社会公正和经济问题的愿望揭示了政治理论的一个内在本质。那就是，假定自己与人民的利益根本一致，在当前的政治失败中反映这种一致。代议制政治的一个政治理论前提是，它假定政治的目的是解决冲突，因此利益的根本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社会信用”运动所做的那样，倡导通过技术人员解决冲突的方法就是排斥代议政治本身存在的理由。

“社会信用”是一次极其成功的社会运动。在政府内部，它的经历更加令人难以理解。在持续地、系统地把社会信用思想移植到政府实践方面，它肯定是失败了。但在狭义的民粹主义者的内涵上，作为一个通过在不满的公民中建立新的联盟代替现有的精英来说，并不能说完全失败。

“社会信用”运动是民粹主义的一个例外，因为它允许我们把民粹主义当做一个运动、作为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的领导艺术、一套明晰的思想（社会信用）以及所有这些作为一个政体（正如阿伯哈特 William Aberhart 的社会信用运动政

第六章 宣扬民粹主义：加拿大的“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

府）的命运的特例。这样，“社会信用”是一个作为社会运动的民粹主义的成功例证，但也是民粹主义者思想实施的局限所在。

第七章 新民粹主义

在 20 世纪后期，新民粹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欧但并不仅限于西欧，它是民粹主义在当代的表现形式。新民粹主义是一种被许多极右翼政党所提倡并用来反对在政府的占支配地位的政党体制和某些特定的重要议题，并且新民粹主义常常与一些特殊的政治领导者相联系。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政治”政党和左翼运动中学习，新民粹主义把它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批判与采用能体现其政党批评的结构性形式结合起来。

不像前面章节中我们所分析过的民粹主义案例，新民粹主义不是一个单独的政党或者运动，而是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出现的具有一些相同主题特征的一系列不同的政党。这种相似性和同时性并非巧合。

对我们的目的而言，新民粹主义从总体上最清楚地表明了其反对制度化政治的民粹主义主张，它攻击政党、政党体制和政党议题，新民粹主义在同一时期出现在不同的国家，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同一时代的国家政党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

西欧的新民粹主义

二战之后，人们都一致认为在大部分西欧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奉行混合经济、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和福利国家理论。新民粹主义不仅扩展到了社会民主党，而且还扩展到了基督教民主党、保守党和自由党。再加之新的政党和新的议题，社会民主主义发展了一个新的政党形式，如依靠平民成员所建立的平民党。

人们一致认为战后第一个大挑战来自于发生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形式。这些社会运动倡导保护环境、女权主义、学生权力、反对核武器和战争，建立自己的政党，以表达自己的“新的主张”。这些是最初的新兴政党，并且是融合了传统左派的平均主义的奉行自由主义的“新左派”，他们反对国家和权力扩张。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这些政党常常能够首先进入政党体系。他们不仅挑战主要政党的相同看法，也宣称对“中左派”，对社会民主党和劳工党进行根本性的挑战。这些新兴政党与“中左派”政党争夺选民并攻击他们的议题。他们也攻击获胜政党的模式。

新兴政党对政治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政治的风格和新政治的议题相连的。作为体现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化的国家的一种方法，因此也是非常严格的、官僚化的、等级制的政党，许多年轻的政党建立的组织化方式是用“发言人”代替领导，轻视领导的作用。在这些立场中，他们一致努力以保证它们之间

民粹主义

的平衡，并且作为一种他们奉行的平等性的新政治议题的一种体现，其领导的方式常常是集体化的。为了进一步努力避免政治的个人化，他们把轮换制作为一个原则，这样，关键性职位就不会长期掌握在政党中的极个别人手里。

继来自于政党系统中的左派新政党的浪潮之后，在政坛中的另一极端的政党又掀起了新的浪潮并获得了成功。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掀起了支持极端右翼意识形态政党的高潮。在一定程度上，这等于复苏了法西斯主义和可能重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因此，他们认为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看例子，切勒斯等其他人 Cheles et al . 1995）。真正发生的就是这种新法西斯主义，它已经成为战后政党系统一个长期存在的极端边缘化的特点，并与民粹主义的新浪潮同时发生。^① 新民粹主义，就像一种新的政治主张，反对高度官僚化的提高福利的国家以及现行政党中所存在的腐败和勾结。新民粹主义就像新政治主张，它拒绝对战后所签订的正式协议的一致看法，但它又不完全像一种新的政治主张，它寻求围绕着税收、移民、民

① 对这个新浪潮的说明，有一大堆术语和定义。我把它称为新民粹主义 (New Populism) (塔格特 1995, 1996)，而伊梅福尔 (Immerfall) (1998) 与此相似，把它叫做“新民粹主义” (Neo-populism)。贝茨 (Betz) 把它称为“激进右翼民粹主义者”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ts”)。伊格纳茨 (Ignazi) (1992) 把它说成是“新右翼政党” (New right wing Parties)。基奇切尔特 (Kitschelt) (1995)、默克尔 (Merkel) 和温伯格 (Weinberg 1993) 在著作和论文中把它叫做“当代激进右翼主义” (Contemporary radical right)。另外的人喜欢使用概括性的术语来包括所有极右翼观点的范围，如“极端右翼主义” (extreme right) (海恩斯·沃思 Hains worth 1992; 哈里斯 Harris 1990)，而其他人则特别关注那些代表法西斯主义复活的政党，因此集中注意“新法西斯主义” (neo-fascism) (切莱斯等人 Cheles et al 1995)。

族主义或地方分权主义等问题重建政治。新民粹主义者依靠政党的国内背景来强调这些问题。新民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股真正的政治和选举上的冲击力，这使得一些极右翼政党在侵入西欧政治体系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新民粹主义代表了一种来源于民粹主义者反对政治议程、制度化和混合式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的合法性的当代民粹主义的形式。新民粹主义利用新的政治主张拒绝战后所达成的共同协议，同时努力构建一种新的作为自己的政党形式来表现其反对当前政治模式，特别是反对占主导地位的政党。

新民粹主义政党通过对照现有的政党方式来组建自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民粹主义与生俱来的对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政治的普遍不信任。因此，新民粹主义者在构建自己的政党时，把与占支配地位的政党的构建模式的相似性减至最小程度。这意味着，在实际上，这是对加入政党的成员在行动方向上具有很强的煽动性的承诺。与此同时，重要的个人化的领导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在组织方面，他们使自己不同于其他政党，以使新民粹主义者具有在吸引选民方面增强他们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功能。从其它政党对政治变革要求的含蓄性回应的信息中可以明确地看出：要求远离相互勾结和腐败是主要政党的一致看法。在意识形态上把它们自己置身于现实政党体系的中心之外，新民粹主义强调他们与民众的共同意识，并把它看做是与那些原来建立的政治形式的积极方面有着特殊的联系。

民粹主义

要对新民粹主义的支持者有一个准确的了解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产生于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社会里。但无论如何，这些支持者似乎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他们倾向于对年轻人制定不同的比例，在私人部门中，多雇佣城市居民（塔格特 Taggart 1995，43）。第二个特征是投票者可能会动摇不定，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可能会被政治中的各种党派所吸引，如果他们以前参加过选举，他们也很可能不会忠诚于所认识的政党，所以，他们也不可能会坚持与新民粹主义政党患难与共。在这种意义上，选民们对“反对政党”的党的反应就是他们被吸引出来投票。

总的说来，新民粹主义表现出了一种民粹主义的反制度因素的当代的形式。民粹主义反复无常的特性意味着它常常采用其环境中的特别突出的问题来表达与推动其反制度化。更广泛地来说，新民粹主义抓住一定范围内的一些国家的代议制政治，尤其是这些国家的政党体制来告诉我们一些问题。新民粹主义不仅仅局限于西欧，而是表现在整个西欧的各种各样的变化范围之内，这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源。新民粹主义反对当代自由民主政治体系中特定的政党类型和倾向。在这些政治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政党的议题和被嵌入在这些政治体系中的代议制形式中，新民粹主义找到了进行小规模动员，但在抗议数量上并非微不足道的沃土。

西欧的新民粹主义政党

总体而言，新民粹主义如同民粹主义，是环境的各个不同

方面的展现，并在其中发现自己。所有的新民粹主义在官僚化福利国家中找到了自己，并提出对环境的批评。因为政党和政治体系具有不同的国家背景，不同的“按钮”被用来尝试和打击处于系统对立面的意见。在高福利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新民粹主义强调高赋税的重负和自由移民政策。在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区和民族分化的国家，如比利时、意大利、瑞士，新民粹主义倾向于关注区域性的民族认同问题。对一些移民政策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如法国、奥地利和德国，新移民团体成为替罪羊，新民粹主义提出了不同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议题，仔细看看这每一个群体，新民粹主义的特殊的经历使我们能够追循其连续性的踪迹去探索民粹主义更宏大的概念。

法国新民粹主义的经历体现在“民族阵线”？（the Front National）的成功上，这已成为了欧洲极右势力的一般标志。政党的建立者和领导者是让-玛利·勒庞（Jean - Marie Le Pen），勒庞（Le Pen）的过去把我们带到法国民粹主义者的早期。勒庞（Le Pen）在 1956 年被选为 The Union de Defense des Commer-cants et Artians（UDCA）的代理人（副职），这就是皮尔·鲍杰德（Pierr poujade）政党。

鲍杰德主义（Poujadism）是 1953 年由一些零售商建立的地方行动组织发展而成的，结合普通的民粹主义者反对税收和政府权威的检验标准，许多地方的零售商运用技术根据侦察者的通报在税收监管员经常光顾的商店外面聚集起来，以阻止税收监管员的自由进出。这是一种他们表达对许多小店主的失望的方式。到 1954 年 11 月，the Union de Defense des Commerçants

民粹主义

et Artians (UDCA) 已经成为了全国性的运动。

皮尔·鲍杰德 (Pierr poujade) 逐渐成为运动的领导者。他体现了运动的志向，在动员民众支持方面他的个性和品质成了主要的工具 (霍夫曼 Hoffman, 1956, 32 - 3)。鲍杰德运用大众化的简单而直接的语言，塑造了一个他所代表的阶级的形象 (伊特维尔 Eatwell 1982, 75)。一般说来，这个运动反对税收、巴黎的统治者、官僚主义和政客。到 1955 年，鲍杰德建立了自己的政党——the Union et Fraternite Francaise (UFF) 政党，在 1956 年大选中获得 11.6% 的选票和 52 个议席 (包括勒庞自己的选择)。

1956 年是显示鲍杰德主义高水平的一年，但在随后的选举中政党所获得的选票戏剧性地下降了。它的衰退主要是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所导致的内部冲突和政治环境的改变。当 1972 年勒庞建立“民族阵线” (the Front National) 时，他有效地恢复了鲍杰德民粹主义的合法性，但却与激进的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反移民主张相联系，这在一些法国的选民中开始找到了真正的支持者。到 1984 年，该政党获得了激进右翼的民粹主义的名声，在欧洲议会的选举中它获得了 11% 的选票，并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到 1997 年，该政党已经把自己建立成为了法国政党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在总统和议会的选举中获取了 15% 的选票。

勒庞的个性、领导和风格是该政党成功的关键。勒庞集大权于一身，用高度独裁的方式领导政党。由于选举的成功，他的爱唱高调和与众不同的形象确保了其支持者对其政党的顺从

性。勒庞对党的控制由于其助手布鲁诺·梅格鲁特（Bruno Megret）的政变而遭到削弱，并且由此导致了政党的一分为二。虽然在法国不会再有极右翼的领导者，但勒庞的形象在“民族阵线”（the Front National）的兴起中显得极其重要，并由此使得极右势力在欧洲更加普遍。在政党的选举记录中，它是西欧极右翼党派中最好的之一，这主要归因于新民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结合，这同时证明了极右翼政党在政党体系之内建立的可能性。

另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欧洲极右翼人物是奥地利的约克·海德尔（Jörg Haider），他由于发表声明支持希特勒的政策而臭名昭著。但是他成功的秘密在于他把保持对奥地利政治体制的批评与强烈的恐外症特性结合起来。1986年海德尔成为奥地利自由党（the Austrian Freedom Party）（FPÖ）的领导，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代表了奥地利社会自由和民族主义的政党（卢瑟 Luther 1992，47）。到1994年，自由党获得了22.5%的国民选票，这是它用一个新的非常不同的议题来获得的。

战后一段时间，奥地利的政坛由社会民主主义党（SPÖ）和保守党（ÖVP）所控制。两个政党作为一个“大联盟”（Grand Coalition）共同执政，当没有联合执政时，才有效地轮流执政，这就使得自由党被其他政党说成是卡特尔，排斥其他党派参与政权。海德尔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自由党开始用经济自由议题、私有化、重视传统家庭的价值观，强烈反对移民等主张来表现它的反叛特性（里德斯培格 Riedlsperger 1998，31 - 4）。联合具有强大的力量，它使自由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并

民粹主义

在 1999 年的国家选举中成为奥地利议会中的第二大党。2000 年 2 月，自由党与保守党联合组织政府，但它们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对抗。海德尔的民粹主义不仅表现在自由党的议题中，而且也体现在他大力支持并企图激活民族直接民主的自主性的政党议程之中。1992 年，他企图发动全民公决来解决棘手的移民法律问题。1994 年，他发动全民公决来反对奥地利成为欧盟成员，在这两次运动中，他发现自己和他的政党处在失败的边缘，但是全民公决这种直接民主的工具是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海德尔的新民粹主义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对新民粹主义者来说，政党是腐败的组织，并且对新民粹主义者的动员工作来说也是不够的，因此它自然寻求能够获得支持的各种方法。

任何关注欧洲极右势力的人都会去考虑德国的情况。纳粹遗产意味着观察者、政客和居民都对德国国内和国外的极右势力的活动特别敏感。事实上，在德国没有发生大量的新民粹主义运动。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没有获得成功。在 1990 年的国家选举中共和党（Republikaner）最好也只获得了 2.1% 的选票，尽管有很多地区上的差异，并且在角逐欧洲议会的选举时，他们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共和党（Republikaner）与弗朗兹·舍恩哈伯（Franz Schönhuber）的领导紧密相联。他在 1985 年到 1994 年领导共和党（Republikaner）。在他的任期内，该党提出了引人注目的受到置疑的移民政策、对犯罪进行批评、重视家庭、低税收和“健康的爱国主义”（温克勒和舒曼 Winkler and Schumann 1998，

103)。鉴于法国宪法要求所有政党都要坚决支持民主体制的规定，政党们都很小心，以免行为被认为违宪。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统的占优势的社会民主政党就意味着国家福利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发达。这样的好处是当经济增长快的时候，可以促进社会形成共识的氛围。但当经济困难而又遭遇与高福利相连的高税收时，这很可能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斯堪的纳维亚，税收政策成为新民粹主义政党努力从社会民主党以及从与“中一右”（centre-left）社会福利政治主张相连的政治与社会共识那里争取选民的手段。

丹麦进步党（the Progress Party）的兴起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在摩根斯·格里斯托普（Mogens Glistrup）的领导下，在1973年，进步党以废除所得税、精简官僚机构和撤销管制的政纲登上了政治舞台（Svåsand 1998, 82）这些主张使得进步党在那场选举中获得了历史上最高的选票（15.9%）。从那以后，虽然格里斯托普（Glistrup）在1990年离开了进步党，由皮尔·凯杰斯格德（Pia Kjaersgaard）取代了他的领导地位，但在丹麦政党连续的选举历史记录中，这个政党一直保持着规模虽小但却十分重要的地位（安德森 Andersen 1992）。这个政党从一开始就严重依赖于格里斯托普的议题和风格，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进步党采取反移民的立场才改变。

格里斯托普在丹麦获得成功的同时，安德斯·兰格（Anders Lange）在挪威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虽然一开始它并不像丹麦的进步党那样引人注目，但它后来也成了进步党，在安德

民粹主义

斯·兰格 (Anders Lange) 1974 年死后，这个政党由卡尔·哈根 (Carl Hagen) 领导。像丹麦的进步党一样，进步党在挪威的政党体系中成为了一个资深的政党，在 1997 年的大选中赢得了 15.2% 的选票，它提倡削减公共部门的规模，反对挪威加入欧洲联盟，呼吁减少移民的数量 (Svåsand 1998, 83 - 4)。

1991 年一个新的政党在瑞典成立了，它是由两个有趣而非同寻常、光彩照人的公众人物建立的，一个是商人伊恩·沃特梅斯特 (Ian Wachtmeister)，另一个是喜剧作家柏特·卡尔森 (Bert Karlsson)，一个露天游乐场的老板。这个政党被称为新民主党，它为减税、减少移民和放松对酒类限制的法律而斗争 (塔格特 Taggart 1996, 6 - 7)，这个政党故意地将它的风格表现为玩世不恭，“笑脸”是这个政党的标识)，煽动性的语言既生动有趣又夸夸其谈，自鸣得意于目标的坚定性和资深的政治阶层的不称职。领导者对一个政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民主党是有意识地组建起来的，它把其官僚机构缩减到最少，而把领导的自由度扩展到最大化。这个政党夸夸其谈地强调普通党员对党的政策的影响性 (塔格特 Taggart 1996, 121 - 9)。

新民主党的选举成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 1991 年的选举中它获得了 6.7% 的选票，但 1994 年获得的选票却急剧地下降到只有 1.8%。党内斗争和沃特梅斯特 (Wachtmeister) 的死亡，削弱了党的地位。加之在 1991 年之后党对政府的支持使得它难以维持自我的形象和作为瑞典政党体系中常有惊人之举而又令人发笑的角色吸引力。1994 年之后它彻底消失

了。虽然没有最终成功，但新民主党的短暂的政治生涯却真正地折射出了瑞典的新民粹主义的光辉。

看一看新民粹主义在西欧其他国家出现的方式，它们主要是以地区性的、民族性的和种族认同的方式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在一些存在着严重地区分化的国家中似乎就是这种情况。在意大利长期形成的明显的南北之间的差异使得新民粹主义可以利用北方人的据说他们的利益被给了经济相对贫困的南方而产生的不满。

北方人的这种认同和主张在北方联盟的要求中变得清晰和具体化（莱格·诺德 Lega Nord），北方联盟认为意大利北部地区是一个整体的有着真正文化和经济认同的区域，因此要求从罗马脱离出去。像其他的民粹主义政党一样，承认这种主张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那些传统上被作为处于下层社会对待的人通过某种方式一跃而到了上层社会，这样绝大多数人就被置于一种招人怨恨的境地，这是很重要的。新民粹主义者看到了那些原来被认为处于上层社会而目前实际上却处于下层社会的人的这种情况进行调整以达到平衡的必要性。

这个（北方联盟）政党由乌姆贝托·博斯（Umberto Bossi）领导，他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建立了这个由一些地区性联盟所组成的政党。到1992年，北方联盟在选举中赢得了8.7%的选票。博斯（Umberto Bossi）强调反对资深的政治精英，强调不信任政治网络，这似乎把政治利益与主要政党的支持者连结了起来，强调应该把意大利北部地区作为一个可能的经济上成功并能长期维持的地区的必要性。这种观念具有肥沃的土

民粹主义

壤，因为这一时期腐败似乎正在威胁和吞没意大利的政治体系。

由于意大利政党体系中的一场有效的革命，北方联盟的发展被打断，在 1994 年，基督教民主党统治在一股全新的力量的攻击下崩溃了。与北方联盟并存的一股强大的新势力在传媒巨头西维尔·贝鲁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和佛萨·伊特拉（Forza Italia）的领导下形成了。西维尔·贝鲁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代表的是一种与新民粹主义相似的力量，这让博斯（Umberto Bossi）陷入了困境。这个组织仿效足球俱乐部的形式而非政党的形式。它完全依靠领袖和西维尔·贝鲁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提供的基金。佛萨·伊特拉（Forza Italia）发动了一场整顿意大利政坛的运动使外来者如西维尔·贝鲁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能进入政坛，使政治与普通公民紧密相连，与“娇生惯养”的政治阶级层相决裂（McCarthy 1996, 43 - 6; Seisselberg 1996, 727 - 30）。

在 1994 年的选举中佛萨·伊特拉（Forza Italia）赢得了最多的选票，这使他得以执掌政权。在很短的时间内（重要的几个月）佛萨·伊特拉（Forza Italia）迅速地成长起来，并对先前的政治体系进行了改革，使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这个功绩十分显著。在这种情况下，博斯不得不考虑是否要和贝鲁斯科尼结为同盟。这突显了新民粹主义者的困境，因为他们的感召力部分地建立在抗议的基础上，并正变成现行政治系统的一部分，这个政治系统给他们权力，但却剥夺其选民对他们的支持。一般来说，选民的忠诚首先是在对政治观点的支持

上。另外，博斯也不得不面对与其他政党建立联盟的战略上的困境，这在根本上要把相同的意识形态和选举的特征粘结在一起。

第二个问题是右翼势力的复活，意大利社会运动党（the Italian Social Movement）（MSI）为意大利政党系统内的极右翼政党注入了新的生命。这个政党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传统的继承人。1994年在贾福兰科·菲尼（Gianfranco Fini）的领导下，这个政党朝着一个新的、更受欢迎的方向发展。在把它的身份改变为民族联盟之后，它赢得了13.5%的选票和一个在联合政府中的位置（伊格纳兹 Ignazi 1996, 703-4），这样一个政党在政府中的出现，意味着博斯一方面要对付其新民粹主义宝座上的觊觎者西维尔（Silvio），同时又要与新法西斯主义政党相联系。尽管有些困难，但博斯还是加入了联盟。

1996年北方联盟破裂了，它的左翼加入了一个新的政治联盟并进入了政府。贝鲁斯科尼被指控卷入了他曾经所反对的腐败之中。联盟中的这些冲突上使其陷入了混乱，最终北方联盟在使政府下台上起了最终的决定性的作用（纽厄尔和布尔 Newell and Bull 1997, 98）。贝鲁斯科尼与博斯之间的冲突反映的通常是局限于新民粹主义政党内部生活的冲突。对比这两个新民粹主义政党，就可能看出新民粹主义显示出来的一个不同的普遍特征，即它常常倾向于领导内部的冲突和严重的宗派主义。

在比利时，新民粹主义在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种族和语言分裂中起着重要作用。佛兰芒语集团（Flemish Bloc）成立于1978

民粹主义

年，它像避雷针似的保护着佛兰芒语民族主义。佛兰芒语集团得到了那些认同于其四个重要主张的投票者的支持。这四个主张是：反对移民，反对现行政党及其“腐败”和要求佛兰德斯独立（法兰德斯为比利时西部及法国北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斯温吉道 Swyngedouw 1998，62—3）。最初的焦点是佛兰德斯的独立问题，然后转到了反移民的问题上（赫斯本兹 Husbands 1992，137—8）。反移民问题与佛兰芒语民族主义的结合使该党于 1995 年在佛兰德斯地区获得了 12.5% 的选票。

像其他的新民粹主义政党一样，佛兰芒语集团没有一个卡里斯玛式的领导者来控制，直到 1996 年由卡雷尔·迪勒（Karel Dillen）来领导，他的影响力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和别的政党一样，它也朝着高度集权化的结构发展，这确保了政党的统一和上层的强有力的指导（斯温吉道 Swyngedouw 1998，61—2）。

瑞士是另一个有名的分裂的社会，在州与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和语言的差异，这使得由这些政治力量所组成的新民粹主义自身被金泰尔（Gentile）和克里斯（Kriesi）（1998）戏称为一个“分裂的家庭”。在瑞士讲意大利语的那部分地区，1991 年成立了 Lega Dei Ticinesi 组织，Lega 把自己建设成为反对党，并在它的州内运行良好，在选举中获得了 23% 的选票。它由弗兰维尔·马斯波里（Flavio Maspoli）和格莱诺·比格纳斯卡（Giuliano Bignasca）所领导，他们两人都受大众喜爱并颇具魅力。它的重要性由于瑞士的两个极端右翼的政党的同时兴起而加强了。一方面，有 1985 年成立的汽车党作为一个反社会

主义者和生态党而成功的政党，它是一个反移民民族主义和反对国家干涉经济或环境问题的混合物，它获得了 1.5% 的全民选票。另一方面，有创建于 1969 年的瑞士民主党（前身为民族行动党），它提出限制瑞士的外国工人数量的计划，成为强烈反对移民的政党。

新民粹主义的议程并非仅限于西欧。在其他各地区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政治和政党的一致性问题上都具有新民粹主义的特征。对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政治家来说，部分右翼选民的敌视政党、政党体制和政治议程的现象是能获得支持并取得硕果累累的道路。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新民粹主义

1996 年，在澳大利亚有一个烤鱼及炸马铃薯条商店的前任老板波琳·汉森（Pauline Hanson）被她所在的自由党开除了，因为她直言不讳地抨击了土著居民的权利，抨击多元文化论和亚洲移民现象。1996 年她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联邦选举，由于她发表的评论而使她在媒体上一举成名，在 1997 年她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一个民族”（One Nation）（约翰逊 Johnson 1998）。

汉森所要做的事情（即议程）包括三个重要的主题。在经济政策上，她主张贸易保护主义，以抵御全球化和保持稳定的就业。在文化上，她支持澳大利亚的英裔凯尔特人（Anglo-Celtic Australians）（祖籍非西班牙的美国白人和凯尔特人）的

民粹主义

权利，认为多元文化论对那些处于多数派的人不利，并且少数民族已经被同化了。这意味着攻击了土著居民的原有权利，同时还意味着她反移民的主张，从亚洲大量涌入的移民正改变着澳大利亚的社会。汉森所支持的最后一点主张是反对精英主义。她认为见多识广的精英会为了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出卖原则。通常民粹主义者所反复批评的政客、官僚和知识分子也正是她所愤怒抨击的对象。汉森说：

我可能只是一个烤鱼和炸马铃薯条商店的老板娘，但是某些经济学家需要把他们的头从教科书中移开，在现实世界中找一份工作。我甚至不会让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管理我的商店。”（引自汉森 quoted Johnson 1998, 217）

汉森的新民粹主义是比较适合反移民群体的新民粹主义。移民的意义和多元文化论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重要性意味着汉森的这种目标选择是与她的政治环境相适应的。

当 20 世纪 30 年代在艾伯塔地区（Alberta）的“社会信用党”兴起并执掌政权时，加拿大的政治在 20 世纪被一个地区性的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政党所动摇（看第 6 章）。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种模式又重复了。1987 年，“改革党”成立，由普雷斯顿·曼宁（Preston Manning）领导，人民党的活动又回到了一些原来“社会信用党”的主题上，并在选举中获得了稳固的基础。“社会信用党”和改革党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局限于意

识形态上。因为普雷斯頓·曼宁 (Preston Manning) 是欧内斯特·曼宁 (Ernest Manning) 的儿子，欧内斯特·曼宁在 1943 年作为阿伯哈特 (Aberhart) 的“社会信用党”而成功地成为艾伯塔地区 (Alberta) 的行政首长。到 1993 年底，改革党在国家立法机关中赢得了 52 个席位，以两票之差而与执政无缘，在全国大选中获得了 19% 的选票，在西部省份它做得更好，获得了 52% 的选票 (勒迪克 LeDuc 1994, 167)。到 1997 年，改革党克服困难，获得了 60 个席位。

改革党的感召力建立在对加拿大政党体制和政治精英的批评上，认为加拿大的政治精英们互相勾结，建立了一个排斥普通民众的政治系统。与“社会信用党”不同，改革党没有把金融财政体制妖魔化，而是认为政府的扩张是不必要的障碍，它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它的敌人是特殊利益集团和守旧的政治阶层，他们利用特权控制了政府 (莱科克 Laycock 1994, 217)。

改革党的建议包括采用全民公决作为民主的一项附加功能和作为体现政党致力于直接民主的实现 (莱科克 Laycock 1994, 240-3)。看到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弥漫于党内的观点是认为加拿大的代议制民主，已经过多地代表了 (倾斜于) 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由于过量的要求，它正濒临摇摇欲坠的边缘 (莱科克 Laycock 1994, 218)。

改革党对政治的批评反映了一种对官僚化福利国家危机的反应。在这种意义上，它不仅和它的前辈——社会信用党类似，而且与西欧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极右翼反对党更为相

似。改革党被看做是新民粹主义浪潮的一部分。

另一个兴起于对政党系统进行批判的当代民粹主义政党的例子是美国的另一个改革党，它由罗斯·佩罗特（Ross Perot）领导。在第二章里，我已经描述过罗斯（Ross）这个人，我把他作为美国最新出现的民粹主义者，并用这些术语对他进行了解释，但在更为广阔背景下把佩罗特（Perot）作为新民粹主义的一部分也是可能的。佩罗特（Perot）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最初的吸引力是建立在现行政党体制即民主党和共和党轮流执政体制的失败基础之上。他提出以特殊的和高利率的方法来解决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问题和美国的政治权力斗争问题。

新民粹主义政党在非欧洲背景中的特定议题的内容与西欧的不同，但一直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政党在其国家中都是建立在对其政党体制进行根本性批判基础之上的。当西欧的新民粹主义者明确地指出自由民主党在发达福利国家体制中所面临的真正困境时，它们具有共同的主张并同时兴起。在美国和加拿大，民粹主义政党可以利用民粹主义者的遗产，因此能把特定的民粹主义传统看做是最近的新民粹主义的化身，这不应遮蔽在不同地区当代政治中的新民粹主义的根本共性。

在“新民粹主义”中，我用“新”来强调左翼自由主义者用“新政治”政党来进行抗议的共同基础。把这些政党统一起来的是他们的组织方式，他们普遍地反制度化的思想和他们极端右倾的思想范畴。产生这些党派的不同背景是它们所处的国家都是具有稳定的政党体制的自由民主发达的福利国家。因此，一般来说，新民粹主义的“新”代表了民粹主义的多变性

格。

新民粹主义采取不同的形式主要是与他们所利用的动员支持的方法的种类不同有关。这就解释了这些党派在它们所提出的共同的多方面的议题中为什么会采用如此众多的不同方法的原因。移民、地方分权主义和税收等问题在不同的国家中被重视的程度是不同的。这正是我们所期盼的民粹主义者，因为就是这一方面使得他们多变，表现得丰富多彩，并且可以根据他们的政治争论来判断其民族社会和政治背景的特征。

在本质上，新民粹主义是对政党特性的一种攻击，因此在新民粹主义所兴起的国家一般都采取代议制政治的形式。在它们所采用的形式和采取的立场中，新民粹主义表现了对现行政党的彻底批判。在组织形式上他们有意识地用与现行政党不同的方式来建构自己。新民粹主义常常利用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作为“铁撬棍”来使自己远离那些被他们看做处于政党系统中心的秘密交易行为，借此使自己的政党能被那些感到被政治系统疏远的选民所辨识并获得最大限度的支持。

把新民粹主义政党结合在一起的是其对政党体制的一种极端反应，它们正是在这种政党体制里发现自我并采用了政党的形式。这在政治议程中汇合成为一体。在西欧，这种汇合是围绕战后协议及其瓦解进行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格局和政治体制的变化是对那种协议瓦解的回应。这种议程的趋同性关闭了那些支持已建立的“中—左”或“中—右”的平民党派的政党系统，但同时也开放了这些政党机构腐败的可能性以及对腐败指控的必然性（海沃德 Hayward 1996；海因 Hine 1996；梅

民粹主义

尼 Mény 1998)。民粹主义者的磨炼对其成长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新民粹主义者是不会错过利用精英腐败问题的任何一个机会来维持他们的支持的。

民粹主义的自我局限性在新民粹主义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在它的目标中它基本上是反制度的，它对民粹主义的制度困境很敏感，这是合情合理的。它的一个清晰可见的特点是新民粹主义的命运在于党内生活。宗派主义特别是领导之间的冲突在这些政党中几乎是很普遍的。领导者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导致卡里斯玛式的领导代替更为官僚化的平民政党模式的代表制度。德国的共和党在舍恩哈伯（Schönhuber）的领导时就发生了冲突并遭受了损失。在丹麦，摩根斯·格利斯托普（Mogens Glistrup）就亲眼看着自己在凯杰斯格德（Kjærsgaard）的领导下被开除出党。在瑞典，由于沃特梅斯特（Wachtmeister）和卡尔森的领导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两个宗派，其自身最终由于沃特梅斯特（Wachtmeister）的离职而导致党的衰落。在法国，即使佩勒（Le Pen）牢牢控制着“法国民族阵线”（French Front National），但也经历了分裂和毁灭的挑战，因为在1998年和1999年党内的梅格雷特（Megret）企图建立自己的极右势力领导地位。一些新民粹主义政党似乎能够通过建立高度个人化的领导结构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似乎是一个所有的新民粹主义政党都不得不努力解决的问题。

哪里的新民粹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的回答是：意大利。在意大利，博斯和贝鲁斯科尼之间的内讧在削弱彼此在政府中的地位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对民粹

主义者来说要取得政权是非常困难的。他们要取得政权必须依靠其作为局外人和政治家的反对者的吸引力，为此，他们必须不断努力以获得支持，同时还要使自己成为政府官员和专业的政治家。

新民粹主义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民粹主义反制度的倾向。分析了这么多广泛的、多方面的、存在分歧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民粹主义显而易见是拒绝政党和政党形式的。新民粹主义者还告诉我们代议制政治的代理人是政党，而这些政党在很多自由民主的社会中陷入了困境。政党正朝着脱离平民政党模式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事实表明在许多自由民主社会中公民对政治越来越疏远和冷漠。民粹主义的困境在于民粹主义者拒绝政党，因此就忽视了政治沟通联系的重要性，放弃了代议制政治。这就使民粹主义产生了许多问题，除了鼓吹抛弃代议制政治之外，却提不出解决代议制政治问题的办法。新民粹主义指出了政党所存在的问题，但它自身所固有的对政党和困难的矛盾性使得新民粹主义在实际中采用而在意识形态上又拒绝政党形式，这意味着新民粹主义者不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第二部分：

民粹主义的特征

第八章 民粹主义，人民和中心地区

民粹主义者颂扬“人民”，尤其是就人民的价值与那些精英的价值相比较来说。有的人把献身于“人民”作为民粹主义的特征。当然，民粹主义的一大共性就是它宣称是为人民服务的，正是从这一点得出了民粹主义反精英的结论。然而，我们必须自问，献身于“人民”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揭示出，民粹主义献身于“人民”的这一言辞的确涵盖了民粹主义思想中的一些关键性因素，但是，“人民”这一概念如此复杂，而且它至少部分地来源于民粹主义者对其他一些概念的认同。

有的评论员对民粹主义者的言论至信至诚，并且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代表人民的运动。另一些人则持有更为独到的见解，将民粹主义与特定的社会阶层联系起来进行界定（例如，迪·特拉 1965；康韦 1978。Le. g. Di Tella 1965；Convey, 1978），在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案例中，显然，城市工人阶级投身于工人运动是他们获得选举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一

旦我们脱离了民粹主义的社会背景，我们也就脱离了它所利用的特定阶级：俄国农民，北美农民及农业工人，阿根廷城市工人阶级或受雇于私人部门的西欧城市工人阶级。显然，各种民粹主义派别都有其特定的阶级基础，但就民粹主义本身而言，它是没有阶级基础的（拉克劳 Laclau 1977，145）。倘若将民粹主义视为有阶级基础的，那就得将其与它所宣称的任何一个社会背景联系起来。

为什么“人民”在民粹主义者那里显得如此重要呢？简单的回答便是“人民”是一种信念，它正如民粹主义者所需要的那样，易于拓展或富有灵活性。民粹主义需要一个易于变通的手段，而人民正是满足这一要求的工具。但是，说人民是一种观念由于它的灵活性而被采用，并不意味着它毫无意义。不同的民粹主义运动采用了相同的修辞手法，但它们并不一致。民粹主义者求助于人民，是有一个核心或中心的。但是我们得将它从民粹主义所开展的各种实践活动的扩展方式中分离出来。

为避免民粹主义与人民产生混淆，一个有用的起点就是去探究：人民作为一种观念的内涵，是什么使得它如此吸引民粹主义者。哪些是人民，哪些不是人民，怎样成其为人民，有多少人民，人民由此而成为民粹主义者的对象。

“人民”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的数量。使用这一术语就意味着人民数量众多并占绝大多数，这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其数量众多，因此，一旦亮明身份，他们就被赋予更大的合法性，并且为之提供了一批潜在的支持者，一旦获胜，他们就可以压倒一切反对势力。人民的数量众多对于民粹主义者尤为

重要，但是不应当将其与相对多数和多样性相混合。民粹主义者的“人民”概念是作为一个基本的统一体，“人民”被描述为一个整体，他们被视为一个缺乏基本分化的单一实体，是统一的、团结一致的。“人民”在民粹主义者的思维中已经完全定型并且是自觉的。正是这一特点使得人民成其为一个非常简单的主体，于是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人民”的认知并被简单化地理解。

我们也明白民粹主义者以“人民”的名义来说话，因为他们自认为他们就是人民。在这个案例中，民粹主义从人民中获得吸引力，因为，正如玛格丽特·卡农范（Margaret Canovan）（1999，5）所说，“这对人民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我们的亲友，”“人民”被颂扬，因为它的确有一定的美德。看看“人民”在民粹主义者的言辞中是如何被援用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人民”包含了一定的特性是有道理的。

“沉默的大多数”近来成为北美民粹主义者言论中的一个主题，并且被作为其他地方民粹主义者的一个有效的指南，以此来宣称他们是为人民说话的。“沉默的大多数”这一观点认为，人民的属性应当赋予他们胜过那些叫嚷吵闹的少数派而被倾听的权利，包括他们有权沉默。这暗示着沉默与美德是一致的。之所以称他们为“沉默的大多数”，是因为他们工作、赋税、生活井然有序且安安静静。这就是说，他们文明、工作富有成效但在政治上却是被动的，他们在本质上并不像少数派（精英）那样对政治有狂热的追求。正是这些广大的民众代表了全体人民的中心，他们或许是国家的真正灵魂。在美国的术

民粹主义

语中，它正是通过详细描述这些人所生活的一个想像的地理位置来暗示“中间美国”（Middle America）这种典型的。政客们一旦获得“中间美国”（Middle America）的选民支持，他们就有权代表他们继续进行政治活动。而一旦这种联系被打破，“沉默的大多数”就得采取行动，再次申明他们的立场。

“沉默的大多数”与其代表之间的联系，在民粹主义者的言论中被两个相关联的问题所打破。第一是，政治腐败有可能导致政治家的腐败，并且如果这一过程被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腐败和道德沦丧的背景之中，那么它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家的命运。右翼民粹主义者经常会强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更可能会导致他们把道德沦丧和社会腐败的原因归结为抛弃了他们所喜爱的传统智慧中所固有的价值和抛弃了稳定与秩序的源泉。

打破政治家与“沉默的大多数”之间联系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政治过程已经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左翼民粹主义者认为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通常是像大企业那样的经济巨人。在美国民粹主义运动中，银行家、实业家、铁路运输公司形成了享有特权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右翼民粹主义者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很可能是那些要求特殊权利的少数派，这些集团可能是移民、失业者、环境保护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无论是哪个少数集团，他们都被排斥在主流政治之外。

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动员意味着“沉默的大多数”对政治的抵触，只有意识到社会危机和崩溃的极端状况时，他们的抵触才会动摇。但是，一旦这群先前不太愿意参与政治的市民

活动起来，民粹主义者认为他们对权力的要求将比其他任何人都强烈，这源于他们的本性。而且一旦真的发生，由于他们缺乏政治野心而使他们的参政显得更有分量。他们多年的沉默，公民的认可，也给予了他们更大的分量。沉默了如此之久终于使他们获得一个被倾听的机会，正是在沉默中显示出了他们对国家的一片忠心。

哪些是人民，哪些不是人民，在实践中民粹主义者更容易确定后者。对社会集团的妖魔化，特别是对精英的憎恶使民粹主义者树立了政敌，但这也正是其构建自身的一个重要部分。显然，新民粹主义者努力构造自身以区别于那些无组织的成分混杂的民众，它通过区别于一些特殊的社会集团，如移民、失业者、反地区性成员或种族团体，根据哪些人被排除在外来的新民粹主义者的构成。这种做法并不新奇。更为重要的是，民粹主义者有这样的倾向，他们通常站在自己所排斥、厌恶的社会集团的对立面上来描述自身。民粹主义者的言语中充满了对头脑敏锐的知识分子、官僚、雇佣文人、财主、强盗头领、披头士和财阀的诋毁。

民粹主义者对社会集团的妖魔化有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它使那些对社会集团有怨恨之辞的人民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换句话说，它使民粹主义的信仰者获得更大的支持。其次，它加强了那些痛恨这些社会集团的人民之间（甚至是产生）的团结。由于在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中缺乏联系，后者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这两个影响结合在一起在产生敌对的同时也产生了团结。

民粹主义

我们应当尽量小心避免将“人民”描绘成一个完全没有建设性意义的观念。对民粹主义者来说，“人民”的确包含了一些可以认同的品质。正如怀尔斯（Wiles）所界定的那样，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美德只存在于普通人身上，他们是占绝对优势的大多数，美德也只存在于集体的传统中”。正因为他们的平凡和正派，“人民”才有权居于优势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品质常常被用来与精英的腐败和愚蠢进行比较。民粹主义者认为智慧存在于普通人身上，认为凡人所发现的常识比僵化的书本知识要强得多。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理解民粹主义者所提倡的“人民”的含义。那就是通过理解“人民”在哪里来认识它。至此，我们已经用民粹主义者自己的语言来思考它，观察了他们激发想像力、挑衅对手所运用的语言和概念。寻找民粹主义者前后所使用的语言，有可能在不同的“人民”的要求中找到它们连续性的轨迹。这种连续性在于对“人民”处于中心地区的地位（heartland）的定位。

政治的中心地区（The politics of heartland）

民粹主义者运用人民的语言并非因为它表达了根深蒂固的主权在民的民主信念，而是因为“人民”居于中心地位。中心地区（heartland），这正是民粹主义为何提倡它的缘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人民”含义深刻，但作为民粹主义的一个指导原则，这一概念有很大的不同。民粹主义到处引用人民这

一修辞手法，因为它是深深地嵌于中心这一概念的派生词。在民粹主义者的想像中，中心地区这一含蓄的概念是指称那些道德高尚、团结一致的人们。

中心地区是一片想像中的区域。只有发生危机时，民粹主义往往才会明确地求助于中心地区，这样就产生出一个没有焦点但对那些值得捍卫的生命和品质又很有号召力的观念，以此来激励民粹主义者采取政治行动。中心地区，是一个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积极因素的地方。

意识形态中有理想社会。理想社会常常是世界各国思想家超前思想的投影，他们认为只要具备了他们所认同的主要价值，那么这个理想社会是可以构建的。有时，理想世界可能会成为乌托邦（Levitas 莱维塔斯 1990；Kumar 库马 1991）。中心地区不同于理想社会或乌托邦，因为它认为民粹主义者将他们的富有想像力的眼光投回到重建当前已经失去了的一切企图中去。而理想社会甚至是乌托邦的心智和头脑（mind and head）的建设，中心将它们的力量源泉归因于心灵（heart）、情感（sentiments）的唤起，这种情感唤起可能并不必然是理性化的或能够理性化的。

求助于中心地区说明了对民粹主义的另一个常见的评论。尽管实践上试图支持特定的阶级，但在理论上民粹主义却常常被当做是超阶级甚至否认阶级性的。强调“人民”意味着认为这些人是一群无差异的大众，正是他们的集体性赋予了他们以智慧。中心地区的单一性也反映了人口的单一性，因此作为想像中一片单一的领域，中心地区要求单一的人群。中心地区的

民粹主义

想像中的居民具有的同一性和同质性解释了为何民粹主义者常常将人民视为是一类的。

中心地区的构建不仅参考了以往的认识，还通过对边缘的界定来构建。对中心地区的进一步的简单化被作为一个排斥异己的依据。因为涵盖的范围是很模糊的，因而民粹主义者往往对排斥的界限比较清楚。民粹主义者对特定的集团不在真正的人民范围内的明确倾向性在中心地区这一概念中得到强有力的回应。中心地区这一概念部分地指它是国家实体（或许是其他潜在类型实体）的一部分，但是很纯粹的那一部分。中心这一观念的核心是它的向心性。中心地区处于在社会共同体的核心并排除了边缘或极端。民粹主义者认为他们自身处在事物的中心地区或是事物的非常核心的部分。

中心地区的重要性说明了民粹主义的内向性特征。国际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视民粹主义者为死对头，因为民粹主义者对所选择的人民边界之外的相关的人的态度是胆怯的。孤立主义和隔离主义自然倾向于民粹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常常与种族民族主义（在新民粹主义的案例中）和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主义（如美国 20 世纪的民粹主义案例中）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对民粹主义者来说，只要是超出了中心地区的边界，无论什么思想和重要事物都是次要的，即使他们非常感兴趣。这对加强中心地区的一致性倒是个很好的作用，因为它巩固了这片想像领域的边界。

我们从民族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试图描述民粹主义者的中心地区的封闭性，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楚，它们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并且与其中任何一个相联系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民粹主义将一些民族之外的人排斥在外，它并不包括所有民族的成员。中心地区，就其所指向的一个民族来说，它是一个有限制性条件的民族主义，它明确地将一些社会集团排斥在外。它基于一种具有天然的一致性的有机组织的观念之上，因而它比那些包含于民族范围内的各种团体受到更多的限制。当民族主义表达一个中心地区的价值时，民粹主义会将其与自身等同起来，但是，很明显，对民族的认同来源于中心地区，而不是相反。

我们如何认识民粹主义政治的中心地区呢？一种方法就是通过认识人民被求助的方式和民粹主义者所赋予它们的特性。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仅仅是间接地来认识民粹主义的中心地区。有时，可以在民粹主义者的言辞中直接观察到。在美国，“中间美国”（Middle America）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中心地区的明确的求助对象。同样，这种方法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也得到了运用，引用“中间英国”（Middle England）来指称那些想像中的英国主流中心的温和派的支持者。“中间美国”（Middle America），这个字眼常使人们联想起浪漫的普通人，他们是核心政治层在“常识”上所需求助的支持者。

俄国民粹主义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地区概念。他们将其所看到的俄国农村生活及其农民视为中心地区，并且，显而易见，将之视为一种值得肯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转型模式。农民，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生活和政治活动的组织都成为俄国民粹主义崇拜的偶像。在对村社社区的颂扬中，民粹主义对中心

民粹主义

地区这一概念进行了比其他概念更多的详尽的描述。

我们已经清楚，为什么民粹主义不时地以人民的名义在政治上不断地求助和动员自身。人民的平凡和对制度的不信任在民粹主义的动员和支持的方式中是可以看得到的。坦诚、朴实、明晰是民粹主义响亮的号角。民粹主义大力提倡易于理解的方式和常识性的解决方案。

家庭生活的方式在民粹主义者的言语和风格中得到了共鸣。这些象征性力量正好被民粹主义者用来颂扬“人民”的平凡和美德。作为一种获得支持的方式，来唤起选民的支持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在实际上，民粹主义者所仰赖的人民的一些美德在政治活动中并不常常是活跃的。因此，民粹主义者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动员选民。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教育人民行动起来。但这有个困难，当民粹主义者进行动员时，就会产生紧张状态。因为在对人民进行领导、教育、动员时必须具有主动性，这就意味着，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民的意愿并非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地表达出来的。

民粹主义与人民的关系是一个潜在的死结，因为它实在是太宽泛了，以至于不能告诉我们关于任何民粹主义的支持者的本质，但对民粹主义者来说这种关系是带有重要标志性的共鸣的强有力的手段。它对于民粹主义者整合那些不同的分散化的利益是很有用的。同时，不断地提及“人民”就使得民粹主义者不断强化他们的民主资格，从而使他们拒绝特定的代议制民主政治。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思想，因为它在人民主权和多数暴政的可能性之间制造了民主的张力。

第八章 民粹主义，人民和中心地区

中心地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弄清楚民粹主义者求助于人民的意图的工具。民粹主义者宣称是以他们的支持者的名义来说话的，这并非空谈，这对民粹主义者来说也是有一定意义的。不幸的是，占支配地位的民主观念和人民主权的重要性表明“人民”这一术语被如此广泛地运用，含义千差万别，以至于被有效地剥夺了其真实的含义而被民粹主义者分离出特定的意义来加以利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认为，在每一个民粹主义的事例中设想出一个中心地区，是十分有用的。通过这一工具使我们能够明白民粹主义者所颂扬的“人民”的概念以及其民粹主义者献身于“人民”的原因。中心地区这一概念使得我们透过民粹主义的不同的表白看到其共性，同时允许每一种具体的民粹主义构建自身独特的关于中心地区的观点。

第九章 民粹主义的制度困境

民粹主义的拥护者对于民粹主义本能的、几乎是根本的要求给了民粹主义运动以巨大的动力、能量以及某些特定的品质。这在民粹主义运动存在的早期是合乎事实的。这些东西的代价要在更长的时期才会被感觉到。对于任何维持一段时间的政治运动来说（我们必须假设它想这样做，因为它总是要花时间去达成它的目标），它必须致力于解决自身的组织化、制度化问题。以自发性为特征的民粹主义运动使得这个过程变得十分困难，因为要同时维持自发性和制度化是有问题的。

在政治表达中，民粹主义常常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这是因为民粹主义对制度的态度使它产生了一系列困境并限制了自己。民粹主义在自己的内部含有对自身成长的限制。这些限制是民粹主义与各种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所造成的。

在代议制政治过程中，政党是重要的政治机构，因此，对民粹主义者来说，政党既是一个被批判的目标，又是一个动员支持民粹主义者的方法。这会造成一些特殊的问题，这也说明了民粹主义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制度困境。民粹主义对代议制

政治制度的反对对它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然而，由于这种力量会走向分散化，因此民粹主义自己总是不得不运用那些制度。政党是代议制政治固有的一个部分，因此民粹主义预先倾向于不信任它们，但总是被迫利用它们。

我们对民粹主义的对党派的厌恶不必看得太重。19世纪30年代，在加拿大的艾伯塔省（Alberta）的社会信用党（the Social Credit Party）流星般地出现，应归因于对现存党派的忠诚的崩溃，也正如它的领导者，威廉·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对福音教的热诚的崩溃一样。尽管它是一个党派，但它渴望在他的自我描述中尽量避免使用党派的术语，而更喜欢用简单的术语“社会信用”（Social Credit）或者“社会信用联盟”（Social Credit League）。19世纪民粹主义在美国出现，这是因为政党体系不能反映政治的分化现象，但即使这样，在它准备采取赞同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和参加竞选的战略之前，联盟经历了一段痛苦漫长的时期。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在1968年作为一个独立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的意义是重大的，他指责现存的政党是难以区分的两个事物。新民粹主义由于拒绝作为既能体现又能改进政治的政党形式而遭受的挫折使它具有了新的特征和获得了根本性的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所有新民粹主义政党都体现了把它们政党系统作为脱离真正的人民和作为腐败的非代议制的联盟。

对于民粹主义的政党能造成的困境始于一个事实，即大部分民粹主义的最初要求都是基于一个对占统治地位的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批判。当民粹主义者获得支持和动力时，他们通过强

民粹主义

调他们的不同来努力增强这种支持，然而，在他们的运作中，代议制政治的制度逻辑迫使他们采取其所批判的政党形式。如果成功，民粹主义者就被迫变成他们所不喜欢的形式。从长远看，结果会使民粹主义或者变得更缺少民粹主义（就社会信誉党的案例而言），要么由于内部冲突而分裂（新民粹主义 new populism），或者只是崩溃（人民党 the People's Party）。这些结果中的任何一种都意味着民粹主义注定是具有自我局限性的。

民粹主义者， 个人魅力型的和权威性的领导艺术

对于民粹主义制度困境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强调领导者的作用。在他们对领导的强调中，民粹主义者在他们的领导者体现出来的美德中寻找庇护，而不是明确找出这些美德是什么。正如，任何人都有智慧，所以，在政治活动中，正确的行动成为正确的领导者的选择。在领导层面上，个性与原则的融合相当于在运动或者人民的层面上，从居于中心的居民那里获得的美德。民粹主义缺乏实质和核心的价值观意味着它特别倾向于个人政治。

很多民粹主义的领导者都可以被看做是个人魅力型的领导。从阿根廷的胡安·庇隆（Juan Peron），到加拿大艾伯塔省（Alberta）的威廉·阿伯哈特（William Aberhart），到法国的让-马利·勒庞（Jean - Marie Le Pen），民粹主义者有可能不仅依靠个性化的领导，而且依靠要求一种特殊个性类型的领导：即个

人魅力型领导。韦伯（Weber 1968, 241 – 5）极好地从传统型和法理型权威中区分出了个人魅力型权威。他认为法理型权威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形式呈上升趋势，在这种形式中，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制度以及在民主制度中通过对统治者的认同来找到领导者的合法性。个人魅力型权威不像传统型权威那样其合法性来自于久远的传统，它既不来源于制度结构，也不来源于历史，而是来源于特定的领导者的个人品格，以及他们的追随者赋予他们的品质（韦伯 Weber 1968, 244；威尔纳 Willner 1984, 202 – 3）。

在个人魅力型权威和民粹主义两个概念之间有许多相同点。个人魅力型领导与宗教领导有很强的相似性。“charismatic”来源于“grace”一词，并且个人魅力型领导者倾向于从他们的追随者中激发出一种忠诚，这像是献身，而且基于信仰。正如威尔纳（Willner 1984, 7）所描述的，个人魅力型领导者的追随者“对他们的领导的回应是献身、敬畏、崇敬和盲目信仰，简而言之，带着接近宗教崇拜的感情”。领导者本身被认为是具有超乎常人的力量，这与他们的追随者的平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民粹主义有很多宗教运动的回应，因此，很可能会运用一种有宗教回音的权威形式。民粹主义思想中道德的原教旨主义和实践中民粹主义运动经常带有的半宗教性质，意味着民粹主义很可能朝着个人魅力型领导的方向发展。

个人魅力型领导的本质是用个人魅力型领导者的意志代替制度和规则。它对民粹主义者产生了很多影响。这意味着民粹主义者不必构建制度层面的东西。正是他们对代议制政治中固

民粹主义

有的制度化的抵制导致了民粹主义者喜欢动员这种方式，因此，如果他们能够以一种避免复杂制度结构的方式来做这件事，那么这就适合他们。这种个人魅力型领导方式的简单性恰好迎合了民粹主义者对政治和制度的简单性和直接性的意向。

个人魅力型权威可以出现在危难或艰苦的时期。正如我所强调指出的，民粹主义出现在它的追随者被危机感和道德崩溃感压倒的时候。在这种意义上，民粹主义和个人魅力型领导被证明仅能作为权宜之计，而不适合一般情况。或者换一种说法，非常时期要求非常的措施或行动。在危急时刻，带有特殊个性品质的个人的出现很可能被他们潜在的追随者看做是巨大的安慰，因为他们为即将来临的灾难提供了一个及时的解决方法。

个人魅力型领导和民粹主义最后一个相似性是它们都是短暂的和不稳定的。个人魅力型领导将倾向于把自己转换成其他的权威形式，或者随着与它相联系的个人的死亡而消亡。后者是非常可能的，因为个性化领导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是极其困难的（非常明显，因为他们不是同样的人）。在民粹主义依赖个人魅力型领导的地方，它要长期维持自己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在民粹主义不依靠个人魅力型领导的地方，它维持自身依然有困难，因为它对政治制度化天生的厌恶，然而，制度化是任何政治运动生存的先决条件之一。

民粹主义倾向于个人魅力型领导。但一般来说，这表明了对强权领导的偏好。个人魅力型领导的形式仅仅只是表现了民粹主义对它的选民的平凡和领导者的卓越同时的赞美。这就为

民粹主义制造了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的解决有时有利于个人魅力型领导，但它也会在有利于权威主义或者半威权主义领导者的情况下得以解决。

民粹主义运动和党派的结构常常是高度集权的。在某种程度上，我所指的新民粹主义者的整个政党架构，是以他们与官僚政府模式政党相对照的结构为特征的，因此，它倾向于依靠中央集权和个性化领导。如果我们更广泛地看，庇隆（Peron）、佩罗（Perot）、阿伯哈特（Aberhart）、华莱士（Wallace）、朗（Long）、格里斯特普（Glistrup）、博辛（Bossi）、贝鲁斯科尼（Berlusconi）……和勒庞（Le Pen）的民粹主义，他们倾向于围绕自己建立党派，并把他们自己放在组织和象征性的词语的正中心。在某些极端行动上，民粹主义的领导者甚至不能容忍任何异议。庇隆（Peron）苛刻地对待那些反对他的领导的人就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对不同意见的不宽容和民粹主义者对这种不宽容的容忍是民粹主义者抵制政治的另一种表现。民粹主义更喜欢在复杂政治过程之上的领导自身以简单方式来处理各种问题。

民粹主义对领导的预言反映出了他们希望减少制度复杂性的愿望和民粹主义者的信仰在领导者身上的具体化。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但却导致了相同的最终结果，并且有助于产生同样的困境。对民粹主义来说，领导的困境是一个普通民众的运动依赖于一个最为非凡的个人化的领导。在这一极端上，这些领导者将依靠个人魅力作为他们权威的基础。在领导不是个人魅力型的地方，它倾向于独裁主义，或者，至少是高度集权

民粹主义

的。这些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民粹主义者对于制度的厌恶导致了他们试图构建简单的组织形式，并且这种简单性意味着对领导的监督制约的减少，结果使得把巨大权力交给了任何能够驾驭这一组织的个人。因此，民粹主义被拖向一种领导形式，这种形式事实上很难长久维持的，并明显地与把“人民”作为它的推动力的赞美是不一致的。

直接民主

避免或者解决民粹主义制度困境的一种方法是提倡直接民主，因为直接民主是一种既可以直接与大众接触，同时又无需政党的方法。民粹主义有时被描述成几乎与直接民主是同义的。虽然民粹主义与直接民主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把两者看成几乎是同义的是不重视直接民主理论的广度，而且是仅仅只关注民粹主义的某个部分。在提倡一种运用直接民主工具作为规范的政治形式的意义上，民粹主义能够与直接民主联系起来。当各种民粹主义运动发现，对于吸引他们目标的注意和建立对他们运动的支持来说，直接民主机制是有用的避雷针的时候，民粹主义也能够与直接民主联系起来。

民粹主义者把直接民主作为一个对代议制民主缺乏参与的批判（阿伯拉斯特 Arblaster 1994），而且也把它作为一个增加代议制民主的参与性的制度机制（巴奇 Budge 1996）。在实践中，直接民主机制用得最广泛的是瑞士和美国的一些州。在这两种情况下，直接民主机制都是作为代议制民主制度的附属

物。

在美国，直接民主制度进入到代议制政治中的发展常常被看做是民粹主义的一种形式。创制权、公民投票和罢免制度被不同地引进到州的设置中，这是为了支持或者补充代议制政治的代表性因素。

在美国各州创制权运用的经验说明了它可以成为民粹主义的工具。在戴维·马格勒比（David Magleby）（1994，238）关于美国 1978 年至 1992 年期间的 399 个创制权的内容的研究中，他发现 76% 的创制可分为四种类型：政府或者政治改革、公共道德、财政、税收或者债券、以及商业和劳动的规则。这些类型是有指导意义的，因为它们包括了伟大的民粹主义者关于公共道德和对于制度和税收的不信任的一系列陈旧的思想观念。最著名的创制权是 1978 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第 13 条提议，这个提议是关于财产税的，它在其他各州引发了反抗同样税制的浪潮（彼得斯 Peters 1991，182 - 4），这场为了第 13 号提议的运动是由霍华德·杰维斯（Howard Jervis）领导的，它具有很多民粹主义者的因素。杰维斯（Jervis）被媒体描述成一个人民英雄，他的运动抨击了政治家和官僚，并且当相当于 2/3 的财产税被削减时，他的运动捍卫了第 13 号议案（西尔斯和西特林 Sears and Citrin 1982，26 - 31）。这个事件以运用创制权这种直接民主工具而闻名，但是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由这个创制权引发的政治活动的类型。依附性的领导、反精英统治论者以及赞成削减税收的运动清楚地表明是民粹主义者，而不仅仅只是它运用的机制。

民粹主义

直接民主制度的运用并不意味着直接民主已经建立，因为有时它们是被用于补充代议制政治的制度。它们的运用并不必然与民粹主义有任何关系。公民投票被政治家偶尔运用并不意味着政治家们的权力被取消。公民投票常被给予了协商机制的地位，以留给政治精英执行或者忽略人民投票的结果的可能性。就直接民主制度的宪法化而言，他们可能包含着民粹主义者的冲动。正是在美国创制权运用的这个事例中，创制权不仅仅是一个咨询的地位，而且代表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民粹主义张力的真正体现。

阴谋理论

对不能提供像直接民主一样的实际解决民粹主义的制度困境的另外一个办法是倾向于求助阴谋理论。民粹主义者使精英妖魔化，并且了解其周围环境的危险性，这导致了他们特别容易受这种理论的影响。作为阴谋的一部分，把诸如银行家、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工业巨头等各种精英集团集合到一起是向着宣称他们是同谋迈出了一小步。这种理论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动员功能。发现与大众不满意部分的共振点，阴谋理论使人们对与实际生活迥然不同的其他方法有所了解，并且这样做，对个人加入到挫败任何曾经打败过他们的阴谋的斗争中去提供了刺激。

阴谋理论设想那些卷入到阴谋中的人在一起积极地谋划增加他们的利益，并且都是秘密进行的。很多政治科学理论主张

精英统治以及有一种持续的各界精英参与这个统治体系的方法模式。这些论点表明了民主精英者理论家的特征，他们批判自由式民主，认为这种民主使权力过分集中于某些社会团体（例如米尔斯 Mills 1956），这些论点还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和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理論的特征，他们把社会看做是为某一阶级的利益而运行的（米利班德 Miliband 1969）。在他们的简化形式中，精英主义者和阶级分析理论可能会以阴谋理论的形式出现，但他们不是阴谋理论。这些理论与阴谋理论的不同在于统治体系是系统的和制度化的，而不是一小群人代理或者蓄意谋划的结果。对于精英或者阶级分析理论的能力来说，阴谋作为一种审慎的活动并不存在。阴谋理论的循环性是阴谋不能被察觉，因此如果我们不能看见一个阴谋，那么这就是这里有一个阴谋的证据。根据定义，这就意味着阴谋理论不能通过经验式的查询而被消除。对一个阴谋理论家来说，一项关于一个阴谋是否存在的学术调查很可能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无效的，在最不好的情况下是对阴谋作出结论。这就意味着民粹主义者还有另一个理由来消除过于理论化和学术化的影响因素。

阴谋是中心地区的对立面。正像中心地区是一个本质上模糊和晦涩的、但具有很大共鸣性的概念一样，阴谋理论也是对中心地区模糊性冲击的重复，但它是真实和深奥的。在围绕精英统治的实现及为民粹主义的动员提供法律依据方面，阴谋理论起到了增加神秘色彩的作用。

阴谋理论为民粹主义者保持自身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党派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解释。他们提供的解释非常符合民粹主义的

民粹主义

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是从反对占统治地位的精英走向反对控制政治的秘密精英的一步。面对制度困境，阴谋理论是一个有用的有关认识的庇护所，但不是有用的动员工具，因为他们强调民粹主义支持者的相对无权，这些支持者是普通的民众。

作为一个政治现象，民粹主义的阵发性更多地应归因于它与制度的高度矛盾的关系。这使得它必定是短暂的。民粹主义与制度存在着冲突问题。在最好的时期，民粹主义者以厌恶的态度来看待制度，但在危机时期，他们把制度看做是致命的。进入政治领域之后，民粹主义者仍与制度有着各种不同的问题。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或者政治运动，制度化的必要性把民粹主义的动员规范化推向个人化领导或者集权化领导，或者把它推向分裂和解体。如果民粹主义者走向领导或者制度化，那么他们就剥夺自身部分的最初要求，或者，至少剥夺了他们的一致性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它们成为了挑战自身的东西。

作为一种活动，民粹主义对于制度的态度也可归因于其对政治的某些根本性的矛盾。民粹主义者的意向看起来似乎赞成由其他人来开展政治活动。民粹主义者赞成在政治过程中政府统治的结果。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民粹主义者才把自身变成政治运动或者政党。审视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把民粹主义者看做是反政治的。另一个方法是把这种反政治的论调看做是根源于他们与制度的矛盾问题。民粹主义者对政治的厌恶部分地源于一种与制度的交锋，特别是与代议制政治制度的交锋，这种交锋隐含的感觉对民粹主义者来说只能是不好的结局。

民粹主义者对制度的这种矛盾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

什么以完全成熟的政治运动或者政治力量形式出现的民粹主义是相当少的。这种矛盾性导致了民粹主义的自我局限性。在另一个极端，民粹主义者对制度的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作为一种风格或者作为一种修辞手法的民粹主义是普遍存在的。民粹主义是表示对政治制度或者短暂的或者本能的不满的一种便利工具。在某些时候，一些政治计划或行动将面临挫折。对于那些想表达对政治制度不满的人来说，民粹主义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参照点。在长期的行动计划中，这种挫折可能是一个短暂的时期，或者是在危机时刻的原始的政治直觉的一种表达。因此，如果真诚地来说民粹主义是半成形的，它为这些观点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辩解和一个历史的谱系。一方面，民粹主义的对制度的矛盾情感解释了少数发展成熟的民粹主义的现象，而另一方面，这种矛盾也解释了为什么所有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家常常求助于民粹主义，把它作为其尚未成形的思想的依托，亦或只是一种基调，一种风格。

第十章 民粹主义和代议制政治

民主是我们时代的主流政治思想。现在断言“我们都是民主主义者”是容易的（或者几乎可以确切的这样说）。至于这是指民主思想还是指民主制度，这是不同的。现代民主观念的风行归功于一些极不相同的民主概念。换句话说，在民主的美德方面之所以达成如此明显的广泛的一致是因为如此众多不同的意思都是依附于这个术语的。遮蔽在民主的主要价值和解释社会如何运转的领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民主在那个领域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一些主要的政治概念的基本属性在本质上是具有争议的，我们希望对它们的内涵进行质疑和讨论。在这方面，民主就是一个典型的极富争议的概念（盖勒 Gallie 1962）。

在民主政治制度中——换句话说，在把民主观念付诸实践的方式上——存在着更大的一致性。如果我们尝试着列出一份与民主相关的制度和实践的名单，把民主的特征看成是选民有权在两个竞争性的政党中进行选择来组成立法机构和委员会，这可能会取得广泛的一致（这种情况是真实的）。对一些人来

说，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而对其他人来说，它们被看成是民主本身的构成要素。无论他们的地位如何，毫无疑问的是人们所接受的制度是民主的代议制模式。实际上，现代民主政治几乎都是代议制民主政治。

选举、集会、结社等可轻易确认的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了衡量民主的标准。这些形式已经成为民主的“工具箱”，虽然这些工具有不同的用途，但是很明显，众多不同的政治家、社会运动和政权试图通过对它们的运用而取得合法性。领导者们为了取得合法性而围绕它们建立政党。一个政权通过选举而取得的统治的合法性。像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运用代议制政治的制度设置，作为取得成员身份的先决条件。

代议制民主制度的盛行与自由主义的命运有着紧密的联系。公民权利的观念、有限政府的观念、法治观念都普遍地渗透到现代政治之中。把这些观念与代议制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可能会看到自由主义观念几乎拥有支配地位。一些人对此满怀热情地作出了著名的宣告：“历史将以自由主义的胜利而终结”，而其他人则把这种发展描述为邪恶的和“自由市场”的烟幕，并且认为这将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

作为对代议制政治回应的民粹主义

作为一个专门术语，“代议制政治”指的是随着自由民主体制出现的一种政治类型。当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代议制政治

民粹主义

形式，由于各国或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不同的政治系统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不同的政治规范及其价值，但这对我们辨识一种围绕代表制而进行民主设计的政治类型仍然是有帮助的。

代议制政治是由一系列的程序所构成的完整体系。它由以下一系列相互作用和相互独立的程序所构成，包括定期选举、政党政治、公开辩论和公共政策制定。通过这些环节和程序，一些观点和概念被明确地表达出来，被反复地论说，并把一些人的观点与其他人的观点进行比较，以选择那些可行的建议，并以公共政策的形式加以施行。

用一种非常抽象的方式来说，这可能会把被统治者反对统治者的基本政治反应体现作为民粹主义的特征。之所以非常抽象是因为这种现象里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程序，是因为民粹主义只可能在一套系统性的思想中找到与自身相关联的东西。代议制政治的程序包括提出和宣传政治纲领的一套系统化的步骤，由此形成民粹主义者的思想。要使民粹主义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必须通过代议制政治的程序有组织地进行。

在第一部分所探讨过的民粹主义的事例阐明了它是对代议制政治的反应。俄国民粹主义者的部分特性与他们对俄国革命道路的信念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革命的思想，实际上这是对所盛行的民主的观点的拒绝。他们对俄国农民组织的维护是对与代议制政治相关联的制度的明确拒绝。随着“社会信用”民粹主义者思想在艾伯塔（Alberta）地区的兴起，建立一个旨在调控经济职能和社会公平分配的技术专家委员会是对代议制

政治的根本否定。这种制度剥夺人民的权力（或者他们选出的代表的权力），并且试图回避任何形式的政治类型或者回避任何可能与公共政策制定有关的政治过程。它试图把政策制定置于政治之外，然而代议制政治的逻辑是把政治建立在政策制定之上的。

在庇隆主义的事例中，我已经强调了领导的重要性，庇隆被认为是有超凡能力或者有个人魅力的领导。领导艺术和代议制政治之间的关系由于领导与追随者的观点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变得相当复杂。我们可以认为有个人魅力或者超凡能力的领导是与代议制政治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这颠倒了人民与其代表之间的关系。追随者们追随领导者是因为其有超凡魅力，然而，在代议制政治中，领导者是基于他们所代表的立场而被选举出来的。

新民粹主义至少反映出了一种对代议制政治的矛盾心理。新民粹主义政党是反对党。部分新民粹主义者批评当代政治过分关注少数人的利益，认为国家由于集团化利益或者自由主义精英的一致性要求而负债累累。新民粹主义批评当代代议制政治存在着功能障碍。新民粹主义不但抨击代议制政治的运行机制，而且表现出对政治的普遍而强烈的不满。

正如我所认为的，如果民粹主义是根源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反抗，那么它至少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这种民粹主义，从根本上说，还未成型并处于分散化状态。这种观点表明了民粹主义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就像一种模糊的感觉被转化成政治行为或者政治理念（或者两者都是），它将会提供

民粹主义

各种不同的业已掌握的设想和一些根本性的不同的背景，因此结果看起来会很不相同。代议政治的不同体系的结构性影响会因此而产生不同的民粹主义的变种。

第二层含义是民粹主义不是一种反对现代性的反应。这与许多人对民粹主义的理解是不相符的，他们把民粹主义看成是从根本上反对现代化的（例如李普赛特所提供的例子 Lipset 1963）。民粹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比简单的联系复杂得多。现代性给予民粹主义系统化的环境，因此得以在民粹主义运动中显现出来。同时，现代性加剧了民粹主义者通过创造复杂的政治形式和制度结构来反对被统治的挫折感。这些成为民粹主义者忧虑的对象。

现代社会的规模是促成民粹主义出现的另一个因素。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潜在的距离随之拉大，更重要的是，这助长了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抽象化的趋势。把封建领主看做压迫是一回事，而当把封建领主普遍地看成是所有个体所聚集而成的一个阶级时又是另一回事。当“他”变成“他们”时，民粹主义出现了。与此相对应的，当人民被看做是与个人一样处于同样的环境和困境中的一个普遍化的实体时，“我”就变成了“我们”。

当代的政治背景增加了代表的范围、规模和复杂性。像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已经拓展了新的政治领域，与此同时，也拓展了潜在的个人所代表的范围。在现代政治中，简单的投票行为不再是单一的行为，因为投票和代表在许多地方、国家和国际领域同时发生。代议制政治的范围和复杂性的增加为代表提

供了更大的范围，同时也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资源。

民粹主义及其对代议制政治的影响

民粹主义与代议制政治的关系不是单向的。探讨民粹主义运动对代议制政治体系的一些影响是可能的。民粹主义运动对代议制政治体系有特殊的影响。民粹主义者对“人民”一词的痴迷（虽然人民是一个特殊的概念，正如我们在第8章已经分析过的）意味着它利用了代议制民主中的这一主要标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代议制政治的大多数运动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宣称代表人民。然而，在使人民公开反对精英方面，民粹主义可能会把一个相当温和的群众集会的口号变成一种威力巨大的政治武器。

民粹主义在代议制政治体系内的真实存在创造了一种改变政治家和人民的关系的环境。希尔斯（Shils）认为民粹主义嵌入了一个“颠倒的平等主义”观点，因为“它受人民与跟统治者不完全平等；他们实际上比其统治者更好”的观点的影响（Shils 1956, 101）。这改变了其他公共代表机构能够凭借其声称的合法性和有权制定公共政策的基础。民粹主义对具有结构性的组织政治辩论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影响：简单化的政治、大众主权和二分法。

民粹主义的目标是创建一种简单化政治。政治应该体现普通人民的智慧，因此它自身应该是直接的和简单的。通过恰当

地表达这种要求，它已经取得部分的成功。在面对民粹主义者的要求和效仿民粹主义简单化模式的压力下，其他政党或运动被迫重新确立他们的立场。因此，民粹主义的存在对使复杂化或者技术性政策失去合法性和主动性方面具有一些影响。

民粹主义喜欢界定政治辩论的词汇。这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民主作为一种思想的广泛传播。考虑到民粹主义总是声称以人民的名义发表演说（中心人群），这些主张与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应当体现人民主权的民主要求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政治的合法性。这意味着虽然民粹主义虽然要献身于人民，但这种承诺最多只是一种模糊的主张，然而它对民粹主义者主张的合法化具有一定的影响。

民粹主义对政治辩论的最后一个影响是它对问题的二分法，这迫使他们不是使用支持就是使用反对的言辞。民粹主义固有的政治倾向是二分法。部分的原因在于它试图建立允许直接代表的简单化政治的结果，但这也是民粹主义某些深层次的症状（symptomatic）。二分法是另一种从整体上理解精英与大众两极分化的方法。两者都被描述成相对自成一体的单个个体，就像民粹主义不愿意看到精英之间的分裂一样，因为如此细微的区分会遮蔽作为精英整体的目的与利益的根本一致性（unity），所以他们不愿意割裂和对“人民”进行划分。人们获得了大量的关于精英和人民的一些基本的特性，但对那些类型内部的细节却明显地缺乏了解。

用民粹主义二元论者的术语来说，政治世界的架构往往把许多问题与利益分配相结合。就像政治世界被划分为两种对抗

性的力量一样，使用相同的措辞来解读这些政治问题就变得合乎情理。就像任何游戏都有玩家和游戏规则一样，如运动员与比赛的关系，政治同样具有二重性。这导致了简单化政治的好或坏、对或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粹主义者能够如此轻易地摆脱世俗的约束，走向道德原教旨主义和准宗教偶像。

人们不得不接受社会和决策的复杂性部分是出于民主政治的理性化。代议制民主的特殊作用就是这种表现。通过代表来作决策的最直觉的原因不是否定人民自己不应该作决策（事实上，所有的民主人士都从观念上同意人民应该由自己决策）而是必须有一些个人专门地致力于决策。需要代表意味着政治的需求和行为之间的不协调性，这从另一方面凸显了我们作决策的价值。作为“人民”意味着我们必须从事基本的活动——工作的、家庭的——因此不能够专心地致力于政治活动。

代议制政治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表达政治观点。实际上，它以观点的多元性为前提以及通过对这些观点的优缺点的争论，把它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机制。民粹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的情形有点不同，这些思想从根本上是针对那些制度本身而不是在制度内进行辩论。民粹主义深深地扎根于代议制政治的程序和实践之中，但却只是偶尔见到系统的理论。

对民粹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导致制度困境的系统提供了用代表和获得的支持来解决困境的系统化的方法。同时，民粹主义与非民主政治系统可能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只有当有机组织把民粹主义的情绪传播到政治运动或政党中时，民粹主义才形成自己的运动或政党。然而，部分民粹主义的否定因

民粹主义

素来源于这种情绪，这种情绪正是代议制政治系统所欠缺的。

以最“极端”的方式来说，民粹主义可能会陷入独裁主义和背离民主的危险。因此民粹主义成了代议制政治的宽容性的考验标准。我们可以在庇隆主义的实践中和一些新民粹主义政党的结构中发现这种危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书中涉及的所有的民粹主义的例子，全都根据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不管用什么方法来界定），除了俄国民粹主义（Russian narodniki）外，其他的民粹主义都参与竞选并组建自己的政党。

第十一章 结 论

我们正确地理解民粹主义是很重要的。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术语被如此广泛地和以如此频繁随便的方式被应用，因此把问题集中于此很重要，以便我们能够了解它的真正含义或者至少使围绕它的讨论能够取得有价值的结果。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它超越了概念的精确性和争议性在思维上的细微差异。因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代政治现象，所以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它被应用得如此广泛。无可否认，民粹主义只是偶然地被转化为重要的政治运动或者政党，但作为一种始终存在的潜在力量，它渗透到代议制政治的方方面面。意识到民粹主义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将使我们当代议制政治有更多的深刻了解。

我们必须了解民粹主义政治，因为这样做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那些把自己依附在民粹主义之上的思想体系。内核空洞的民粹主义总是运用其他思想体系的价值观念来补救自己。为了了解那些思想体系的内容，我们必须把民粹主义当做它们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理解。

我谨慎地尽力避免把民粹主义写成是好的或者坏的。把民

民粹主义

粹主义者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看成是不现实的或极其危险的而不屑一顾是容易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立即解散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是一张晴雨表，透过它，我们可以诊断代议制政治体系的健康状况。作为天生的政治厌恶者，哪里有民粹主义者，以运动或政党的方式来进行动员，哪里就有充分的理由对代议制政治的功能进行检视，哪里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的某些环节可能出了故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接受民粹主义者的解决方案，而是意味着我们对民粹主义的出现应该敏感。在社会科学中，不完整的和缺乏概念化的民粹主义在这方面不能帮助我们。

代议制政治及其制度上的统治地位反映了自由主义观念的力量。当一系列保护公民免遭国家侵害的思想和国家契约理论产生时，自由主义就出现了。如果我们考察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理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就能够清晰地看到民粹主义是一种对自由主义的反动。自由主义被公认为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理论。而民粹主义主张集体主义，赞颂人民，并把人民当做一个有机的整体。自由主义甚至把个人权利当做免遭国家非法侵犯其自由的一种手段。民粹主义敌视权利学说，因为根据定义，权力是少数人掌握的工具；而民粹主义认为权力应该由多数人来掌握，指责过分顺从少数人所要求的权利是不公正的。自由主义本能地更喜欢把市场作为一种高于国家的经济运行形式。民粹主义没有国家干预经济的疑虑，甚至，有一种赞成独裁专制政权并因此成为潜在的过度干预者的倾向。

民粹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间歇性的周期性回应。同样地它

也是多元之中的一元。当一系列观念在左右相连的连续统一体中传播时，如果我们准备超出一个政治概念的简单而有时限的范围时，那么其他的对自由主义的反对的思想将会得到彻底的解除。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对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形成了深远而持久的挑战。这些意识形态与民粹主义的区别在于它们拥有稳定的支持者。事实上，它们的兴起源于对国家和种族群体的强烈认同或者源于信仰。民粹主义出于对代议制政治的反对而提出了要把自身构建成为一个实体的任务。这种练习的原始材料就是“人民”，“人民”这个概念由于对代议制政治的虚夸的言辞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这对民粹主义来说是一个巧合。

自由主义政治体现在代议制政治的实践、程序和结构之中。而民粹主义又是在代议制政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粹主义只有在代议制政治系统的条件下，才有能力维持自身并以系统化的政治运动形式而存在，但是推动民粹主义发展的动力却来自于对代议制政治的不满。

除了几乎处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观念，当代政治经历了一些主要的变化。现代政治经历了重大政治制度的建构，而这些制度不再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像欧盟这样的结构和政治实体，虽然具有明显的类似国家的特征，但却被当做民族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替代品，从而违背了传统的分类方法。这些机构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代议制政治被篡夺或者过时了。而是意味着代议制政治的范围和复杂性增加了。这增加了民粹主义对作为新式代议制政治的反应的可能性。

民粹主义

作为代议制政治的连接机制，政党的形式和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把政党作为政治联系的机构，它通过核心的积极分子，联系着作为代表的领导人和作为被代表人的选举人，它的权力平衡已经改变了。随着核心骨干成员的衰退和减少，政党已变得空心化。利用大众媒体和财富手段，单独的个体就能够相对容易和相当迅速有效地组建政党。当代民粹主义者，像帕罗特（Perot）和贝鲁斯科尼（Berlusconi）已经充分利用了这种变化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

如果我们回到我在第一章中所确定的一些主题，那么，十分清楚的是，当代政治环境的变化已经扩展了民粹主义的范围。试图把现行的在国家层面上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引入到超国家的层面上，这意味着民粹主义者，就像反对代议制政治一样，会有更多潜在的引发不满的理由。随着全球化和与之相关联的身份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构建（想像的或真实的）一个“全球共同体”的愿望，对那些想在想像中的中心地区中排除寻求庇护所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推动力。就那些被排斥在新的全球共同体之外的人所感受到的危机感的增加而言，这可能会成为现实。在细微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有些团体把对种族和民族特性的意识当做是一道反对真实的或想像的全球化力量的防护墙。与日俱增的政治规模意味着在公共想像力空间更多的具体的思想上的控制会逐渐放松，因此民粹主义可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找到可以融合思想的伙伴。它的善变的特性意味着民粹主义可以表明代议制政治至今仍有很大的问题，在每一种情况下，它将会对其政治环境产生强烈的认可。

正确地理解民粹主义意味着我们更加可能确定和理解它的自我局限性的本性。如果我们支持民粹主义运动，那么我们需要提出新的方法以摆脱它在制度上的困境。如果我们反对民粹主义运动，那么我们可能会从这种除旧布新的思想、知识体系中获得乐趣，但更为深刻的窘境是这种创造性的新方法是很难获得的。不管支持还是反对，对我们来说，理解民粹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理解我们身边颇为盛行的代议制政治的一种途径。

参考书目

Allcock, J. B. (1971) "populism": a brief biography, *Sociology*, 5:371 – 87.

Andersen, J. G. (1992) Denmark: The Progress Party – populist neo – liberal – ism and welfare state chauvinism, in P. Hainsworth (ed.) *The Extreme Right in Europe and the USA*. London: Pinter.

Anderson, K., Berman, R. A., Luke, T., Piccone, P. and Taves, M. (1991) *The Empire Strikes Out: a roundtable on populist politics*, *Telos*, 87:3 – 70.

Arblaster, A. (1994) *Democracy*, 2nd ed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ell, D. (ed.) (1963) *The Radical Right*. New York: Anchor.
Berlin, I. (1978) *Russian Thinkers*. London: Hogarth Press. Berlin, I., Hofstadter, R., MacRae, D. et al. (1968) To define populism,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137 – 79.

Betz, H. – G. (1994) *Radical Right – 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Betz, H. – G. (1998) Introduction, in H. – G. Betz and S. Immerfall(eds)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 – 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Budge, I. (1996) *The New challenge Of Direct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Burnham. W. D. (1970) *Critical Elections and the mainsprings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 W .W . Norton.

Canovan, M. (1981) *Populism*. London: Junction. Canovan. M. (1982) 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 *Political Sfudies*, 30: 544 – 52. Canovan, M. (1984) “people”. politicians and populism,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19:312 – 27.

Canovan , M. (1999)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47:2 – 16.

Carter, D.T. (1995) *The Politics of Rage : George Wallace , the Origins of the New conservatism ,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

Cheles, L, Ferguson, R. and Vaughan, M. (eds) (1995) *The Far Right in Western and Europe*, 2nd edn . Harlow : Longman.

Conniff, M. L. (1999) *Brazil’s populist republic and beyond*, in M. L.

Conniff(ed.)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Conway, J. F. (1978) *Popu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Canada: Explaining the roots of Canada’s third parties*, *Canadian Jour-*

民粹主义

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99 – 124.

Crasweller, R. D. (1987) *Peron and the Enigmas of Argentina*. New York: W. W. Norton.

Di Tella, T. S. (1965) *Populism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in C. Veliz (ed.) *Obstacles to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i Tella, T. S. (1997) *Populism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2: 187 – 200.

Dulles, J. F. W. (1967) *Vargas of Brazil: A Political Biograph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Eatwell, R. (1982) *Poujadism and neo – Poujadism: from revolt to reconciliation*, in P. Cerny (ed.)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in France*. London: Frances Pinter.

Gallie, W. B. (1962)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in M. Black (ed.) *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entile, P. and Kriesi, H. (1998) *Contemporary radical – right parties in Switzerland: history of a divided family*, in H. – G. Betz and S. Immer – fall (eds)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 – 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Germani, G. (1978) *Authoritarianism, Fascism, and National Popul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Gold, H. J. (1995) *Third party voting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 study of Perot, Anderson and Wallac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8. 751 – 74.

Goodwyn, L. (1976) *Democratic Promise: The Populist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ant, s. A (1976) *Ob-schina and mir*, *Slavic Review*, 35: 636 – 51. Hair, W. I. (1991) *The Kingfish and his Realm: The Life and Times of Huey P. Long*.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Hainsworth, P. (ed.) (1992) *The Extreme Right in Europe and the USA*. London: Pinter.

Harris, G. (1990) *The Dark Side of Eur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Hayward. J (1996) *The populist challenge to elitist democracy in Europe*, in J. Hayward. (ed.) *Elitism, populism, and European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Hicks, J. D. (1961) *The Populist Revolt: A History of the Farmers Alliance and the People's Part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Hine, D. (1996)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public accountability of leaders*, in J. Hayward (ed.) *Elitism, populism and European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Hoffman, S. (1956) *Le Mouvement Poujade*. Paris: Librarie Armand Colin.

Hofstadter, R. (1955) *The Age of Refor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Husbands, C. T. (1992) *Belgium: Flemish legions on the march*, in P.

Hainsworth (ed.) *The Extreme Right in Europe and the USA*. Lon-

民粹主义

don : Pinter .

Ignazi, P. (1992) The silent counter – revolution: hypotheses on the emergence of extreme right – wing parties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2:3 – 34.

Ignazi, P. (1996)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SI into the A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9:693 – 714.

Immerfall, S. (1998) The neo – populist agenda, in H. – G. Betz and S. Immer – fall(eds)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 – 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 – 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Ionescu, G. and Geillier, E. (eds) (1969a) *Populism: Its Meaning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Ionescu, G. and Gellner, E. (1969b) Introduction, in G. Ionescu and E. Gellner(eds) *Populism: 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Irving, J. A. (1959) *The Social Credit Movement in Albert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Johnson, C. (1998) Pauline Hanson and One Nation, in H. G. Betz and S.

Immerfall(eds)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 – 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Basingstoke : Macmillan.

Kazin, M. (1995)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A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参考书目

Kitching, G. (1989)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opulism, Nationalism and Industrialization*, rev. edn.

London: Routledge Kitschelt, H.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J. McGann) (1995) *The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Kornhauser, W. (1959)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umar, K. (1991) *Utopian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Laclau, E.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 London: Verso.

TLasch, C. (1991)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Laycock, D. (1994) *Reforming Canadian democracy? Institutions and ideology in the Reform Party project*,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7: 213 - 47.

LeDuc, L. (1994) *The Canadian federal election of 1993*, *Electoral Studies*. 13: 163 - 8.

Leshner, S. (1994) *George Wallace: American Populist*. Reading, MA: Addison - Wesley.

Levine, R. M. (1970) *The Vargas Regime: The Critical Years, 1934—193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vitas, R. (1990) *The Concept of Utopia*. New York: Philip Allan. Lipset, S. M. (1963)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support*.

民粹主义

New York: Anchor.

Lipset, S. M. and Raab, E. (1971)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Right – Wing Extremism in America, 1790 – 1970*. London: Heinemann.

Long, H. (1933) *Every Man a King: The Autobiography of Huey P. Long*. New Orleans: National Book Co.

Luther, K. R. (1992) Consociationalism, parties and the party system,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5: 45 – 98.

McCann, J. A., Rapoport, R. B. and Stone, W. J. (1999) Heeding the call: an assessment of mobilization into H. Ross Perot's 1992 presidential campaig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 1 – 28.

McCarthy, P. (1996) *Forza: the overwhelming success and the consequent problems of a virtual party*, in R. S. Katz and P. Ignazi (eds) *Italian Politics: The Year of the Tycoon*. Boulder, CO: Westview.

McGuigan J. (1992) *Cultural Populism*. London: Routledge.

Macpherson, C. B. (1962) *Democracy in Alberta: Social Credit and the Parry. System*, 2nd ed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Magleby, D. B. (1994) Direct legislation in the American States, in D. Butler and A. Ranney (eds) *Referendums Around The World: The Growing Use of Direct Democracy*. Basingstoke: Macmillan.

Malloy, J. M. (1977) Authoritaria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 the modal pattern, in J. M. Malloy (ed.) *Authoritaria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Meny, Y. (1998) *The People, the Elites and the Populist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Jean Monnet Chair papers. Florenc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Merkel, P. H. and Weinberg, L. (eds) (1993) *Encounters with the Contemporary Radical Right*. Boulder, CO: Westview.

Mills, C. W. (1956) *The Power Eli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iband, R. (1969)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Mouzelis, N. (1985) On the concept of populism: populist and clientlist modes of incorporation in semi – peripheral politics. *Politics & Society*, 14: 329 – 48.

Newell, J. L. and Bull, M. (1997) Party organisations and alliances in Italy in the 1990s: a revolution of sort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 81 – 109.

Nugent, W. T. K. (1963) *the Tolerant Populists: Kansas Populism and Nativ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ge, J. A. (1983) *Peron: A Bi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People's party (1978) *The Omaha Platform, July 1892*, in G. B. Tindall (ed.) *A Populist Reader: 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American Populist Leaders*.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Peters, B. G. (1991)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Black well.

Piccone, P. (1991)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民粹主义

federalpopulism, *Telos*, 89: 7 – 44.

Piccone, P. (1995) Postmodern populism, *Telos*, 103: 45 – 86.

Pipes, R. (1964) Narodnichestvo : a semantic inquiry, *Slavic Review*, 23: 441 – 58.

Pipes, R. (1995)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2nd edn. London: Penguin.

Richards, J. (1981) Populism: a qualism: a qualified defence,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5: 5 – 27.

Riedlsperger, M. (1998) The Freedom Party of Austria: from protest to radical right populism, in H. Betz and S. Immer fall (eds)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 – Populies parties and Movernents in Estab – lished Democraci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Ritter, G. (1997) *Goldbugs and Greenbacks: The Antimonopoly Trad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Finance in America, 1865—1896*. Cambridge: Cam –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ck, D. (1986) *Argentina 1516 – 1982: From Spanish Colonization to the Falklands War*. London: Tauris.

Rogin, M. P. (1967) *The Intellectuals and McCarthy: The Radical Specter*. Cambridge, MA: . MIT Press.

Sears, D. O. and Citrin, J. (1982) *Tax Revolt: Something for Nothing in Coli – forn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isselberg, J (1996) Forza Italia: a “media – mediated personality – party”, *West Europeam Politics*. 19: 715 – 43. Seton – Watson, H. (1967)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Oxford: Claren – don Press.

Shils, E. (1956) *The Torment of Secrecy: The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Security Policies*. Glencoe, IL: Free Press.

Shils, E. (1962)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tates*, in J. H. Kautsky (ed.) *Political change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New York: Wiley. Smith, W. S. (1983) *The return of peronism*, in F. C. Turner and J. E. Miguens (eds) *Juan Peron and the Reshaping of Argentin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Svasand, L. (1998) *Scandinavian right – Wing radicalism*, in H. – G. Betz and S. Immerfall (eds)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 – 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Swyngedouw, M. (1998) *The extreme right in Belgium: Of a non – existent Front National and an Omnipresent Vlaams Blok*, in H. – G. Betz and S. Immerfall (eds)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 – 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Taggart, P. (1995) *New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8: 34 – 51.

Taggart, P. (1996) *The New Populism and the New Politics: New Protest Parties in Swede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singstoke: Macmillan.

Taguieff, P. – A. (1995) *Political science confronts Populism* *Telos*, 103: 9 – 43.

民粹主义

Telos(1991)Populism vs the new class: the second Elizabethtown Telos conference. Telos, 88:2 – 155.

Telos(1991—92)Special Section on the Leagues in Italy, Telos, 903 – 88.

Telos(1995a)Special Issue on Populism ITelos, 103.

Telos(1995b)Special Issue on Populism II, telos, 104.

Ulam, A. B. (1981) Russian's Failed Revolutions: From the Decembrists to the Dissident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Ulam, A. B. (1998) Prophets and Conspirators in Prerevolutionary Russia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Venturi, E. (1960)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 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 Century Russi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Walicki, A. (1969)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Oxford: Clarendon. Walicki, A. (1980) 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Marxism – Ox ford: Clarendon.

Weber, M. (1968) Economy and Sociefy, Vol. 1, edited by G. Roth and C. Wittich.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Westlind, D. (1996) The Politics of Popular Identity: Understanding Recent PopuliSt Movements in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und: Lund University Press.

Wiles, P. (1969) A syndrome, not a doctrine: some elementary theses on populism, in G. Ionescu and E. Gellner (eds) Populism: 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Willner, A. R. (1984) *The Spellbinders: Charismatic Political Leadership*.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Winkler, J. R. and Schumann, S. (1998) Radical right – wing parties in contemporary Germany, in H. – G. Betz and S. Immerfall (eds)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 – populist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Worsley, P. (1969) The concept of populism. in G. Ionescu and E. Gellner (eds) *Populism: Its Meanings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Wortman, R. (1967) *The Crisis of Russian Popu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译者后记

学术著作的翻译是一件艰苦而严肃的事情,既要忠实于作者的思想,也要展示作者的表达方式,但由于英语与汉语的表达方式的极大差异,使得要达致“信、达、雅”境界非常困难,虽然译者的水平有限,但始终牢记这样的要求不断去努力,实际上能否达到这样的目标,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敢稍有疏忽,力求尽量把著者的思想真实地呈现于读者的面前。

袁明旭

2005年3月于江岸小区游园

